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
方正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1.6.

方正文史资料第四辑

出生入死话当年

方正地区反满抗日斗争史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
方 正 县 委 员 会 文 史 资 料 委 员 会

1991.6

献　　给

中国共产党诞生七十周年

主　编：**马维义**

副主编：**谢文霞**

　　　　施家和

　　　　赵青林

校　对：**于文才**

　　　　艾新闻

目　录

继承革命传统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马维义

方正县是重要的抗日根据地之一。在这块土地上，方正儿女曾与日本侵略者进行过殊死的搏斗。在帝国主义侵华史上，日本帝国主义是最凶残的侵略者。他们在中国实行“杀光、抢光、烧光”政策。在他们控制区内搞“归乡并屯”、“保甲联坐”，对我根据地，则实行步步为营的“篦梳”战略。在这样“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险恶环境里，方正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出生入死，浴血奋战，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谱写出一曲曲壮丽凯歌，最后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桶子沟、猪蹄河、肖田地、沙河子、方正等战役，已堂堂正正地走进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史册，赵尚志、李福林、李秋岳、刘兴亚、郑万昌等光辉的名字，已成了众所仰慕的英雄。方正人民因为有这样的历史而感到光荣，方正人民因为有这样的同胞而感到自豪。

《出生入死话当年》这部史料，征集工作始于1985年，迄今历时七载。征编这部史料的目的，在于再现方正地区的英雄儿女与日本帝国主义者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历史画卷，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从这部史料中，我们可以听见中共延方特支书记李秋岳烈士远离自已的祖国（朝鲜）到方正来，与中国同志并肩战斗，发出“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呐喊，我们可以看到气贯斗牛、敌人闻风丧胆的赵尚志将军的光辉形象；我们可以听见中共延方特支第二任书记刘世武同志临刑不惧，痛斥侵略者的演讲，我们可以看到执法如山、机智果敢的李福林将军的高大身影；我们可以听到英雄团长郑万昌同志塞肠拒敌扫向敌人子弹的呼啸，可以看到中共方正县委书记刘兴亚同志，在敌人监狱里忍受惨刑从容不迫的神态。从这部史料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抗联战士转战山林、吃草根吃树皮，露宿雪野的艰苦生活；也可以了解到抗日群众支援部队同舟共济的鱼水深情。这些英雄儿女“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壮举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主义是人类最高尚的情操。古老的中华民族所以能够生存繁衍，就是因为有了爱国主义这个伟大力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将士沙场，马革裹尸，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从南宋抗击金国入侵，到“九一八”捍卫我大好河山，中国人民这个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九一八”已与我们相距六十年了，人世沧桑，血与火的年代虽然过去了，可是爱国主义精神仍在世代伸延。当前，方正人民正沿着县人民政府制定的“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的轨道前进。我们继承革命传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方正兴亡，匹夫有责，为振兴方正献出我们的一切才能和智慧。

流尽最后一滴血

李秋岳　遗作

李　川　配曲

B 2/4

55 0 | 6 6 | 5 6 6 | 5 3· | 22 0 |

别了！风光绮丽的祖国。别了！

别了！风光绮丽的祖国。别了！

1 2 | 3 3 3 | 25 5 | 3 i | i i i |

碧波荡漾的鸭绿江。别了亲爱的

碧波荡漾的鸭绿江。别了亲爱的

76 56 | 3 ∨ 23 | 6 — | 5 5 3 | 6 53 |

母亲和朋友，别了祖国被压迫的

母亲和朋友，别了祖国被压迫的

23 1 | 5 — | 5 — | 6 56 | 5 3∨3 |

人民。你们同我一样是

人民。如今我怀着满腔的

22 222 1 2 | 33 33 | 6 5 6 — |

一群失去了祖国受压迫的奴隶，你

热血远涉重洋投奔他乡异国，他

2 — | 0 2 2 2 | 1 2 V 2 | 3 3 3 3 3 | 2 5 6 5 |

们　　　同我们一　样是　一群无辜的可　怜

们　　　一样是被　双重　压　迫　的民

2 — | 2 0 | 6 — | 6 · 5 | 1 · 2 | 6 — |

虫。　　　长　期　的　奴　役

族。　　　他　们　　一　样　是

2 2.2 | 1 2.2 | 3 6 | 5 — | 2 — |

唤　醒了　我们的　觉　醒，　我

(222)

被帝国主义　侵略的　国　度，　那

2. 1 | 2 5 | 3 3 | 3 3.2 | 3 5 5 |

们　要　光　复　故　国，我们要　摆　脱这

里　有　正　义和　真　理，那里有　为　民族

6 6 6 6 6 | 5 3 | 5.5 6 5 | 3 3 0 |

无　尽的　苦　刑。我　们　要求　翻身，

解放　而战的　朋　友。我　们　将和　他们，

5.5 6 5 | 2 2 0 | 5 5 5 | 5 5 5 | 6 5 3 |

我们要求　解放！　我们要　挣　脱这　无　情的

一道战斗　流血！　为争得　被　压迫　民　族的

56 5 | 5 i· | 6 6· | 5 3 11 | 25 3 |

锁 链，起 来！ 祖 国 被压迫的 奴隶们，
独 立，起 来！ 祖 国 被压迫的 奴隶们，

555 66 | 55 33 | 555 55 | 31 22 |

我们的 热情 如海 潮 我们的 力量 似钢 铁
为 换取 祖国 光复 为 劳苦 大众 解放，

5.5 65 | 12 3 | 2.1 25 | 5 — | 6·6 |

我 们 团结 一 致 握 紧 拳 头， 打 倒
情 愿 拚 掉 头 颅， 流 尽

5 33 | 5·5 | 6 5 || {i/1 — | i/1 0 |

万 恶的 日 本 侵 略 者。
最 后 一 滴 血。

李秋岳烈士简介

李秋岳，女，原名金锦珠，别名张志一，1901年生于朝鲜平安南道中乐郡。1924年到中国广州参加革命活动，1925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到珠河中心县委工作，先后任县委委员、妇女部长、铁北区委书记等职。1935年秋任中共延方特支书记，1936年2月到通河县组织反日会组织。1936年8月在通河县北六方为敌人逮捕，9月3日被杀害于通河镇西门外，时年三十五岁。

编者附记

这首歌曲是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李敏同志推荐的。

李敏同志对我县文史工作非常重视。她为我们查找史料征集线索，为我们组稿提供方便。这是对我们工作的鞭策与鼓舞。我们除了致以衷心感谢之外，只能用出色工作，回答她无私地关怀。

抗联，我成长的摇篮

邢德范

作者简介：邢德范，女，又名张素贞，1918年1月13日生于山东省莱阳。1935年2月于方正县伊汉通乡得莫利村参加反日大同盟，10月参加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在牡丹江军区任副指导员，1956年转业任北京水电学校人事科长，1958年任黑龙江省农业机械厅党委副书记，1970年起任黑龙江省石油化学工业厅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1982年离休。

干姨把我引上革命路

我出生在登州府莱阳县西鲍村。1922年随父母讨荒来东北，在方正县伊汉通乡得莫利村落脚。在那里度日艰难，父亲久病不愈，为治病抬了很多钱，天天债主逼门。父母为了还债，于1930年狠心把年仅12岁的我，卖给了李家做童养媳。

卖了我也没还清债主的债，父母不得不逃往他乡，以后再也没见到他们，于是我成了孤儿。同村有个田姨，是我母亲的干妹妹，她时常关照我，是我身边唯一的亲人，后来成为我革命的引路人。

在李家吃不饱穿不暖，天天起早贪黑。长工们起早进山拉木头，我就要半夜起来做饭。那时，我岁数小，个子矮，刷锅得上锅台。有一次，我困的实在厉害，靠在锅台边睡了，锅烧干了，我被大伯嫂打醒，她把我打的死去活来。

大伯嫂平时也常打我，她的孩子也经常欺负我，我非常恨他们，想过长大以后要报复他们。老太太对我很严厉，但从不打我，有时还给我改旧衣服穿。我想念亲人，经常从梦中哭醒。倒是干姨她经常来看我，我有什么苦和委曲都向她倒。

有次，干姨来了，接我回娘家。大伯嫂不同意，干姨说："过去她是丫头，不让回家可以，现在是你们家媳妇了，我是她姨，接她回娘家住几天，怎么不行呢？"大伯嫂无可奈何只好叫我跟干姨走了。从那以后，每年种完地，挂锄，打完场，过春节，我都可以回"娘"家了。

干姨家经常有人来往，坐在一起象闲说话。时间长了，我也认识他们了，不知叫什么名字，只是叔叔伯伯，大婶大姐地叫。有时，他们问我是怎么到李家来的，我告诉他们是抵债来的，他们又说："你起早贪黑干活，还吃不饱穿不暖，他们不干活还吃的好，穿的好，你知道这为什么？"我说："人家命好，老辈留下的呗。"于是他们就给我讲地主是怎样剥削老百姓的。他们又问我，李家是怎样打我，骂我，不拿我当人看的。我不敢说，怕李家人知道后打我。我干姨问我什么，我就跟干姨说什么，后来那些人也知道李家是怎样对我的。但李家什么也不知道，这样，我的胆子也大啦，也信任他们了，什么都敢说了。

我家的邻居是"十家长"，他们开什么会，办什么事，都谁去了，只要我知道我就告诉干姨。

有一次干姨来找我，说百家长刘艺堂要开"十家长"会，叫我弄清开会时间和开会的地点。我想这可怎么办呢？明着问人家能告诉你吗？暗中又去问谁？后来我想出了一个道道。我跟大伯嫂说，我要去大姑姐家，学做活，她没有理由不叫去。在路上我慢慢走，这时，刘艺堂家的大师傅去买

菜，正好与我碰上，我问他："张大爷，这么早就去买菜呀"？张大爷说："今天晚上十家长都来开会。"我一听又问："那么多人，有地方吗？"张大爷说："人少在老爷书房，人多就到后面那个大房子里呀。"张大爷又问我去哪，我告诉他去大姑姐姐家。分手后，一溜小跑去了干姨家，给干姨送了信。

第二天，干姨告诉我，正当他们开会时，游击队来了，抓走了两个罪大恶极的"十家长"，用他们换了粮、盐还有武器。并且从这两个十家长口中知道了他们开会的内容。原来他们正研究抓共产党。干姨表扬了我，说我救了好多人的性命。

干姨时常给我讲地主是怎样压迫和剥削穷人的，日本人又怎样侵占中国和屠杀中国人民的。在我的心灵中，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我逐渐明白了一些革命道理。我们穷苦老百姓要自己救自己，推翻压迫自己的封建社会，赶走日本鬼子，穷人才能过上好日子。

有个叫苏云的女同志，是当时地下党的负责人，她也给我讲过好多革命道理，比干姨讲的深刻动听。她告诉我，游击队里有女的，我不信，她说这些女的连男人都敢比，我听后真想见见他们。有一次，我在干姨家住，干姨说："我领你上山采野菜去。"干姨说完就领我上山了，她带我一会到这，一会到那儿，根本不是采野菜。不知走多远，忽然看见有一个窝棚，有一大群人，干姨说是游击队。我人小好奇往他们中间钻。他们对我们可热情了，给我们唱歌、跳舞。在游击队里可真有不少女的。都是朝鲜族人，汉语说得很生硬。

我和干姨回来后，我问干姨："他们没有家吗？"干姨

说："有，人家是出来闹革命的。"我又问："什么叫革命？"干姨说："就是把压在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推翻，自己解放自己，男女平等。"还有好多好多名词，我都不大懂。干姨说："慢慢就会懂的。"从那以后，苏云同志也常给我讲道理，我也越来越开窍啦！也觉得自己长大了许多。

有一次，干姨突然来找我，让我把一封信交给大排队的关班长。后来才知道关班长是地下工作者。有两个特务发现了他的活动，要对他下毒手，组织决定他马上撤离，晚了就会有危险。我当时很为难，因为我没去过大排队，干姨见我为难，启发我说："你大姑姐夫不是在大排队吗？能不能在他身上想点办法？"我一想，可也对，便来到大姑姐家。那天中午大姑姐吃鱼，我灵机一动，对正怀孕的大姑姐说："姐夫喜欢吃鱼，我给他送点好吗？"大姑姐听我一说，就让我送去。我一溜小跑到大排队，找到大姑姐夫刘福。我对他说："姐夫吃完饭，帮我写一封家信吧，我托人捎回去，还有刚进门时，有人叫我捎一包东西给关班长。这位关班长我也不认识呀！"刘福领我一边往屋里走，一边冲外面喊："老关！来一下！"应声走出一个魁梧的汉子，我连忙上前使个眼色，接着把纸团塞在他手中。第二天，关班长请假去县里看病，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回来。

经过组织上的长期教育和考验，一九三五年二月，苏云同志找我谈话，正式加入反日大同盟。我的工作是搞情报，具体任务是设法弄到大排队和村里头目开会的内容。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与"十家长"卓佳芦的二儿媳妇拜干姐妹。卓家是个老户，地面熟，房子多，院子大，还有几个护院的家丁，厨子作菜又好吃，所以每次"十家长"和"百家长"开会，大都在她家。因为我和他儿媳妇的关系，就经常出入

他家。

卓家开始还死心塌地和抗联作对，经常出坏主意。游击队乘他孙子到江边玩的时候，把他孙子抓去了。孙子是他心头肉，可把他急坏了，他们家就这一个男孩，唯恐断了香烟。他费了好大劲，出了不少粮食、布、盐和药品才把孙子换回来。他虽然很纳闷，孙子上江边游击队怎么会知道，可他怎么也猜不到是我给干姨送的信。

我经常利用上山采野菜，拾柴的机会去山边看林子的老张头那玩，老张头那儿是一个联络点。抗联取给养，或者休息都在那儿。我经常听他们讲时势，看女战士唱歌跳舞，我很喜欢他们、佩服他们。我也想参加抗联游击队，于是多次找苏云和干姨，他们都以工作需要和我年龄太小为理由不同意我参军。

1935年秋天，游击队要广泛开展地方工作，召开了一个大会。在那次会上我见到了赵尚志同志。赵尚志同志个子不高，但很结实，眼睛不太好，给人的印象非常干练。那次会上，赵尚志同志给我们讲了国内外的形势、讲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我听着感到新鲜，抗联有女兵，红军里也有女兵，女兵也能干出惊天动地的事情。我暗暗下定决心，当一名女兵。

那时候地方情况非常紧张，组织上经常告诫我，一定要坚强，要勇敢，更要不怕死，就是让敌人抓去，认死不能出卖同志，不能承认自己是抗日分子，决不能出卖组织，也不能被敌人的花言巧语所欺骗。我常常想：如果不是参加革命工作，让老李家打死也是白死，如果为革命工作而死，我也心甘情愿。

黑夜沉沉投抗联

一九三六年七月的一天，我正在地里干活，组织上派人来通知我，说敌人已经注意我了，为减少损失决定让我参加抗联游击队。并约定当晚三更在大关道上派人接我，规定以三击掌为暗号，接头后不许多问话，到地方他会告诉我的。当我接到通知后，心也不知是怎么了，跳得十分厉害，活也干不下去了，就假装解手，走一趟再回来，回来一趟再走。漫长的白天总算过去了，到了晚上，我就准备东西，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几件衣服一双鞋，还有一把黄烟和火柴，把它放一起包了一个小包袱，偷偷塞进草垛里。说也真倒霉，我那个上县里办事的男人偏偏从县里回来了。他母亲叫他到我屋里住，这可把我急坏了，真不知怎么办才好。我就说肚子疼，一会上一趟厕所。正在这时，他哥哥来叫他，说是日本人进村了，让他去参加欢迎。他不去，我就说："你不去，哥哥又生气了。"他哥哥见他不去又来叫他，他扭不过哥哥，只得走了。不过我不能再等三更天了，如果他回来，我就走不成了，于是他前脚走，我后脚就走了。从此我永远地离开了李家。

我是从一片乱葬岗子走过，当时也不知道啥叫害怕，只想赶快离开。到了预定地点没有人来接我，我想可能是我来得太早了。我大着胆子趴在高粮地里，一直趴到三更天。按规定暗号击了三掌，听听没有回音。我站起来走了几趟，一面击掌一面侧耳倾听，还是一点声音没有。这可怎么办呢？我既然飞出来又怎么能回去呢？（后来我才知道，游击队派来接我的交通员途中被敌人打死了。）于是我向我记忆中那

个地窝棚走去。我走到地窝棚已是下半夜了，把看地窝棚的两个老头吓了一跳。张大爷问我："三更半夜的你怎么来了？"我就对他说山里叫我上队。他听后一拍大腿说："你真糊涂，今天日本人进村，你怎么能走呢！"我说："没有办法了，定的是今天晚上呀！他又回来了（指我那个丈夫）今天不走，我就再也走不了了。"两位老人一商量，决定送我到山上呆着，然后再想办法，与队伍联系。张大爷说："老赵你送她上山去吧，时间晚了，天亮前你回不来就不好办了。"张大爷给我带上一些大饼子和咸菜。张大爷说："这是给游击队准备的。"赵大爷领我进山了。我也不知到了什么地方，赵大爷说："如果有人问，你就说采蘑菇迷了路，你先在这吧，过两天我再来找你。"又嘱咐我，走动时要注意安全，晚上到大树上边去。赵大爷走了，我又累又饿，就吃了一点大饼子，然后爬上一棵大树。这时我真想大哭一场，可又不敢哭，只是盼着赵大爷能早点来找我。天亮了，我也没敢下来，在树上呆了整整一天。傍黑时，我下了大树，解了手，又采了一些野葡萄吃。吃完赶紧爬到大树上过夜。这一夜，我是在各种各样野兽的吼叫声度过的，特别是狼嚎声，可瘆人了，我简直吓坏了，一点困意也没有，两只眼睛瞪着熬到天亮。天亮了我想从树上下来，谁知全身麻木，刚动一下子就从树上掉下来了。过了好长时间才慢慢地站起来。站起来活动活动腿脚，还幸运骨头没折。我来回走动了一会儿，来到一片葡萄架下，吃了一些葡萄之后，靠着葡萄架边坐下，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忽然有人将我推醒，睁眼一看，好多人站在我的身边，穿什么样衣服的都有，还有穿日本鬼子军装的，我不知道是什么队伍，所以什么都不敢讲。他们是一些朝鲜族人，说的是什么我也不明白，便把我带

走了。

他们把我带到靠山跟前的一个小村子。告诉我他们是抗联游击队的留守部队，但我不相信，一是语言不通，二是有穿鬼子军装的。所以我不能告诉他们我的真实身份。我只说上山采蘑菇迷了路，他们又问我是谁家的，因为我梳着疙瘩鬏，便告诉他们我是李家媳妇。他们再也没说什么，就让我暂时住在一个老乡家里。过了几天，我弄明白了，他们确实是抗联的队伍，便去找他们向他们说明情况，告诉他们我是组织上让我参加抗日联军的。可是他们看我又瘦又小，根本就不信任我，而且派人通知了老李家。第二天我的那个大姑姐夫刘福来了。他们把我交给刘福，让他把我带回去。

刘福拖着我走，我又哭又闹。我对刘福说："我在李家的情况你是知道的，你把我领回去，是让我去死呀！要不我现在就死，逼急了，我就告李家通匪。"刘福看我态度坚决，就同我分手了。我急急地往回跑，一看部队都走了，这下可坑了我了。我上哪去，只好往大森林里走。第三天，我饿的实在走不动了，肚子饥肠如鼓，采了树上的蘑菇吃了，吃完就睡着了。

我醒后，发现自己躺在一间小草房里，后来才知道这是地下联络站。屋里有个女人领个小男孩，那女人见我醒了，走过来告诉我："你已经在这一天一夜了，吃蘑菇中了毒，有人将你背到这的，给你吃了药才活过来。"我不知他们的身份，不敢讲实话，只说是进山采蘑菇，迷了路，找不到家了。那女人说："你别说谎了，我们不是坏人，如果老刘不认识你，就不能将你背到我家来。等他回来你就明白了。"没几天，来了两个男人，还带了草药。我一看是关班长，忙说："老关同志你来了？"他笑着告诉我，他不姓关，姓刘

叫刘大昌，老关是他的假姓。他从大排队走后就到这里来工作。组织上又把他爱人从珠河调来，那个女人和小男孩儿便是他的家属。我向他讲了我这段经历，并表达急于参军的心情。他说："别忙，联络联络看！"

我在老刘这呆着，老刘出去接一位领导。他接了三次没接到，第四次总算接到了。这人不是别人，是三军政治部主任冯仲云同志，人们都叫他政委。冯仲云同志待人和气，很有学问。当老刘把我的情况介绍给他后，他当即写封信，叫老刘去联系。然后对我说，你到被服厂去工作吧。冯政委在这只住一宿就叫老刘给送走了。老刘回来后就去山里，说是为我联络工作。老刘去了很长时间才回来。他的样子很高兴，说他找到了大部队，把冯政委的信交给了他们，他们说几天派人来接我。不几天，果然来人接我。这个人我认识，也是得莫利人，是开果匠铺的，姓李，人们叫他李果子匠。我们常见面，却不知道他是抗联。于是我跟他上部队，从此我成了一名抗联战士。

在和谐的大家庭里

我所在的单位是三军一师的被服厂。被服厂原有七个人，三男三女，还有一个五个月的男孩儿，都是朝鲜族。

被服厂位于得莫利以南，地形很好，周围是山，还有一条小河，树林环绕，藏形不露。我们住的房子，里面有一个用小杆搭成的大地铺，上面铺满了草，还有一个用大树皮搭成的案子，是用来裁衣服的。周围有几个树墩子，大家坐在那上面干活。设备很简陋，有两台脚踏缝纫机，两个炉子，一口大锅和几个碗。我们吃的是大萝卜、白菜、野菜、土豆还

掺上一点粮食。我刚去，什么也不敢问，只是干活。吃饭时由于语言不通，他们就拉着我，一边走一边比划，意思叫我吃饱。

厂长姓李，男同志，是个残废人。那两个男同志，一个姓谢一个姓柴，他们二位的工作是来回运送东西。衣服做好后，他们负责藏起来，做多了，他们就往部队送，回来时，要背回吃的和用的东西，工作是十分辛苦。那两位女同志，一位姓崔，一位姓张，姓崔的还带一个五个月的男孩，是从五军来的，姓张的叫张锡淑。

我刚到那里三天没干什么，只是到处走走看看。小河旁有一口大锅，还有两个好大的木盆，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有一天老谢和张锡淑带我到树林子里去，张锡淑拉着我的手一边走一边比划，我们都拿着斧子和刀，看见黄柏树就扒皮。我虽然不懂干什么用，但是他们干我也跟着干。树皮放到大锅里煮，直到水黄了，把树皮捞出来再把事先泡好的白布放到锅里去煮，等煮好长时间，布成了黄色，就把布捞出来，放到河里漂，每天要煮五、六匹布（每匹可做八套衣服），累的站都站不起来，晚上一躺下就睡着了。

李厂长是和鬼子打仗负伤的，他是一位十分坚强的同志。他解小手得靠在树上，不然站不住。解大手要用几根木头搭个架子架起来，才能坐上大便。他从不出屋，他的主要工作是裁衣服，每天要裁十几套，还要看那个小男孩不叫他滚到地上。你想一个残废人需要有多大的毅力呀？看到他行动那样艰难，我们心里都很难受，可他却很乐观一丝不苟地进行工作。

到被服厂的第四天，我就投入了既紧张而又繁重的工作，和他们一起上山扒树皮，染布晾晒。一年里，只有秋天才能染布。因为，那时气候好，树皮也好扒布干的快。布染完后就集中力量做衣服。这个阶段最辛苦、最累，一天只能睡

三、四个小时觉，每个人都瘦的不象样子。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呢？第一，下雪前，要把做好的衣服送到树林深处藏好，雪后不容易隐蔽，有痕迹，敌人很容易发现。第二，衣服做完，要把缝纫机和一切东西都藏好，一旦有情况，不能让敌人看出这是被服厂。第三，用最快的时间，做完衣服，保证部队冬天过冬的衣服。

我就是那时候学会了做衣服。一开始把缝纫机上的针拿下来（因为环境艰苦，一根针也来之不易）学蹬缝纫机，一蹬就是几个小时。张锡淑同志手把手的教我。李厂长一有空就教我裁衣服。后来，在三军一师被服厂我成了主力，大部分衣服都由我和张锡淑去完成。我们每天都能做五、六套衣服，每套包括裤子、上衣、帽子和背兜。上衣的样子要四个兜，裤子在屁股和膝盖处要扎双层的，这样结实。帽子用六块布做成，只有背兜最简单，做成后要求是一尺八寸长，一尺三寸宽再加上宽三寸长五尺的背兜带，背兜外面再缝上两个小兜子是用来装书本和鞋的。

被服厂是个极保密的地方，只有几位领导同志和交通员知道，别人不知道。部队给我们送粮和布以及其它东西，也只能送到指定地点，再由我们被服厂的人自己背回来，我们也不和部队的同志见面，就是我们被服厂自己人出去了，回来后也不许询问。只能说："回来啦？"回来的人也不说什么，如果部队打了胜仗了，消灭了多少敌人，回来的人就说了，大家一块高兴。

衣服做完了，同志们教我唱歌、跳舞、讲故事。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中生活着、锻炼着，成长着。

树洞里的两天两夜

有次敌人大扫荡，向我们被服厂方向扑来。老谢同志进山扶着李厂长往外走，崔同志背着孩子跟着出去，张锡淑跟我一边比划一边说让我背上背兜跟她走。我们分三个方向走，防止敌人把我们全都抓住，能跑出一个也是胜利。我们走了一会，老谢赶来了。原来他把崔同志和李厂长掩藏好后，对我们不放心就赶来了。天快黑了，我们还没摆脱敌人的包围。我们跑到一个河边，实在跑不动了。我们看见河水又深又急，河边草丛厚厚的，有许多倒树横七竖八地躺在岸边，老谢灵机一动，让张锡淑和我下到河里去，用手抓着岸边的树枝杂草走到深处藏好，老谢把踩倒的草扶起来，就往东边跑，好把敌人引开。我和张锡淑顺着河边走了一百多步远，就紧贴着一个倒树底下两手抓牢树枝，只露出一个头，上面还有许多草挡着敌人不易发现。敌人到河边，发现有人向东边跑去，就一边打枪一边追，我和张锡淑一动也不动地站在河里。我们真替老谢着急，不知他能不能甩掉敌人。

天已经黑了，四周一点动静也没有，敌人也走远了，我俩想上来，但由于长时间泡在水里，手和腿都麻了，一点也不听使唤，费了好大劲也没爬上河岸。这时候老谢同志回来找我们。他有长期的战斗经验，对林子又熟悉，很快甩掉了敌人。当我听到老谢轻声呼唤我们的时候，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们被老谢一个一个拉上河岸，活动了一下腿脚，就又跟他走了。

在密林深处的一个空树洞前，老谢站住了。他对我们说："现在情况不清楚，李厂长和崔同志还有孩子都生死不

明，敌人走没走还不知道，你们在这躲两天，我去探听一下情况，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第三天我回来接你们。”我们虽然有两个人，可都是女同志，又没有武器，在这大森林里呆两天，也是很害怕的，但在这种形势下必须留下，不能拖老谢的后腿。我俩人就钻进那个树洞里面，除了解手出来，白天就在里面趴着，晚上到树上坐着。

老谢走后，我和张锡淑吃了不少苦头。每天晚上爬到树上，地面上狼嚎、熊叫声音不断，不时夹杂着风吹大树的响声，可真瘆人，根本不敢睡觉。天凉，怕敌人发现不敢生火取暖，还没有吃的，是又饿、又困，又累又紧张。好不容易到了第三天，老谢果然回来了，他告诉我们李厂长和崔同志及小孩都找到了，被服厂没有被敌人发现，但为了安全必须马上转移，老谢还给我们带来点吃的。我们吃完了就跟老谢往回走。

一想到要拆被服厂的房子，我们都舍不得，这个地点十分隐蔽，如果不仔细观察是看不出来的。盖房子的木头是从很远的地方运来的，因为房子跟前的树是不能动的，如果动了，敌人很远就会发现我们，我们实在是舍不得毁了它。如果敌人有了目标，是不会罢休的。我们只好忍痛毁了这个房子。破坏后，叫人看了就象是多年无人居住的塌架的房子一样。

在艰苦的环境里成长

我们离开了那个被服厂，走了很远到了另一个地方。这地方有一个小房子，地方太小，只能住人，不能放东西。

马上就要入冬了，部队派人送来了大批的布和棉花，是用十几匹马驮来的。我们几个人都躲了起来，不能与送布的

人见面，怕暴露目标。来的人只知道是来藏东西，他们把布和棉花还有点吃的分别藏好就走了。走后，我们把脚印盖好，等我们做时再去取，这次拿来的布都是灰色的不用染。

在那个环境，都要把当天拿回来的布做完，并且藏好。因为地方小，每次只能拿够一天做的布，还要防备敌人的袭击。做棉衣不象单衣那样快，要絮棉花。为了结实每条缝都要多缝几次。我和张锡淑做成衣，其它人干零活。有时我也帮李厂长裁衣服。李厂长总对我说："不能浪费一点布，这些布来之不易，有的是买的，有的是缴获的，有的是同志们流血牺牲换来的。"我时刻记住这些话，能省一点是一点，决不能浪费一寸布。

我们五个人一天能做十套八套衣服。做好后由老谢他们背出被服厂送到很远的地方藏起来。藏衣服来回不能走一条路，也不能把衣服放在一个地方。回来时，要把第二天用的布拿回来。同志们都说，部队的同志在前方打仗，冰天雪地没有棉衣怎么行，他们在前方不怕流血牺牲我们在密营里少睡点、累点也要尽快完成任务。我们起早贪黑的干，终于提前完成了任务。为此，首长表扬了我们。我们的生活很苦，吃的是野菜、蘑菇、树皮、草根，穿的是补了又补的衣服，我们虽然做了那么多衣服，可一件也舍不得穿。夏天风吹日晒蚊虫咬，冬天北风吹的透骨凉，尤其是晚上，情况好时还能生火取暖，情况紧张时不许点火连口热东西都吃不上。几个凉菜团揣在怀里饿时就拿出来，一点点的啃，把牙都啃出血了，嘴唇冻在菜团上拿不下来，特别女同志，不敢结婚，怕生孩子。我们被服厂的张静淑，还有金玉坤他们生的孩子都送给人了。

安景淑的孩子死在肚子里，好不容易才弄下来。女同志

来例假，没有卫生纸用一块布缝个口袋，装上草木灰，腿都被磨坏了。我们的生活虽然苦，但精神很旺盛，大家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革命一定能成功。

三军军长赵尚志同志和政委冯仲云同志也来过我们密营。他们给我们讲革命道理、讲红军的故事、讲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事迹、尤其是讲那些女同志，如何不怕牺牲不怕劳苦，勇敢和敌人斗争的事迹。从而鼓舞我们坚持革命，完成党交给我们的重要任务。

一九三七年三月份，被服厂的活不多，部队首长派人通知我和张锡淑随部队活动，老谢留下照顾李厂长和崔同志母子。我随部队来到得莫利村，看望了当年送我走的那二位老人并且又一次见到了赵尚志军长。军长让我给李家写封信，因为我从李家走的那年冬天，他们就不敢进山拉木头，怕我们报复。军长让我写信说明我出来是打日本的，决不找李家的麻烦，希望李家也不要和抗联日军作对，能够共同抗日。

领导让我们上部队活动，减少后方吃饭问题。我们所到村庄大部分都有地下党组织。一进村，老百姓对我们可好了。我们给老百姓挑水、劈柴、扫院子，并做宣传鼓动工作。开群众大会，教导员讲话，我们女同志唱歌跳舞，深受老百姓欢迎。老百姓有什么好吃的拿出来给我们吃，还把衣服送给我们穿，表示他们对抗日联军的情意。碰到有归屯并户的地方，我们就发动群众成立反日会，和当地的“十家长”“百家长”做斗争。不然那些“十家长”“百家长”总向日本人汇报抗日联军的活动，那我们就无法接近群众，没有群众我们就什么都没有。

秋天，部队留守处的领导调我和张锡淑让我们回密营被服厂。领导说：“前方后方都是革命工作，没有前方打仗不

行，没有后防的保障更不行，我们都要服从革命需要。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才算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我们没有什么说的，又回到密营被服厂。

大罗勒密遭劫

一九三八年二月，敌人大扫荡开始了，上级命令我和张锡淑到三军二师报到，随部队活动。李厂长和老崔由于行动不便先隐藏起来，老谢他们还做交通工作，为部队搞联络。从此我们大家恋恋不舍地分开了，谁想竟是永远地分离！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们，后来知道他们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英勇牺牲了，我永远忘不了和我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我永远地怀念他们。

二师的师长是常有钧，领导同志还有康主任、赵参谋，我去时这个师只有八九十名骑兵。这时三军司令部正准备西征。三军司令部当时在汤原县的汤力川的一个小山沟里，为了补充给养我们先到大罗勒密瓦房甸子沟背粮食。这个粮库是九军留下的，地点很好，四面是山，中间有一条小河沟流过，河边有一个用树皮搭的猎人用的小屋，能住两三个人，为了不让敌人发现，我们绕了五天才到那。小屋十分矮小，和树林浑为一体，不到跟前是绝对发现不了的。看粮库的人告诉我们，领导指示，他们俩平时不许出屋，不许打猎，不许白天点火，部队把粮食送到这快半年了，他俩日夜值班，怕敌人发现从没有离开过，看到我们部队到了，知道能离开这去打仗，所以非常高兴。

赵参谋把岗哨按排好，把马放在小河边。他向大家宣布，在这休息两天，洗洗衣服，军容清洁一些，到了司令部

别丢脸。同时也要大家提高警惕，不要砍树，要拾干柴枝生火做饭，干枝不冒烟。睡觉时要把枪放在身边，随时准备战斗。并且交待了万一发现敌人，战斗突围后的集合地点。交待完了，大家就拾柴做饭忙了起来。我们做饭没有锅，用盆当锅，用三根木杆往地上一叉把盆往上一坐就生火做饭。大家吃完饭有的睡，有的到河边洗衣服，也有的高兴谈论着西征的路线。常师长和赵参谋商量，派人下山买点盐，路上好吃。

赵参谋带人去换岗，他刚爬到山坡上就发现对面山头上有刺刀在夕阳下闪闪发光，他知道让敌人包围了，一边命令带去的哨兵赶快回去报告，一边向哨位爬去。然而已经晚了，大约有二百多敌人从山坡上冲下来。赵参谋一抬手，枪响敌人就倒下去了，一连打死好几个敌人，同时他也滚下了山坡。敌人一齐向赵参谋开枪射击，赵参谋机警地躲藏起来。顿时轻重机枪，加上小炮声，回荡在整个山谷。

枪声一响，战士们习惯地拿起枪，还没弄清情况，就被一阵敌人打来的小炮声震惊了，知道遇上了日本关东军。大家跑向山坡还击敌人。战斗一阵紧过一阵，虽然我们的战士英勇顽强，但由于我们人少，子弹更少，每个人平均不过三十发，不一会子弹就打光了。

我和张锡淑拿着急救包，给负伤的同志包扎伤口，只包扎了三个伤员，我那点绷带就用完了。这时，康主任过来了，他只说了一句："敌人太多了，把我们包围了，你快撤！"他又赶紧去通知别人。我一抬头看见周围山上都是敌人，这是我第一次打这样的打仗，心里很紧张。我刚一转身只见山坡上滚下一个战士，我急忙跑过去一看他已经牺牲了。这时一颗小六零炮弹落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掀起的泥土和树枝将我

打到，一棵树枝砸在我头上，把我砸昏了。不知过了多长时时，听见有人叫我，我睁眼一看是赵参谋。他扒开我身上的土和树枝，对我说："鬼子把咱们包围了，许多同志都牺牲了，你快跑！顺着这个河向下游走，不能暴露自己，找个地方隐蔽起来，我们能走出一个是一个！"然后又说："我再往前找一下，看有没有其它同志。"我要和他一同去，赵参谋不同意。

这时天已蒙黑了，我顺着小河往下游爬。为了不暴露目标，我在河水里爬，一气爬了二里多路。河的四周静静的，只有小山边有一点点地火光。我在河滩上的塔头边隐蔽着，一动也不动。过了一会我实在忍不住了，就慢慢地往那爬，忽然听见好象有说话声，听声音象小赵。小赵是师长的警卫员。我呆了一会又轻轻地向前爬几下，仔细一听真是小赵。我轻声叫他："小赵，小赵！我是张素贞！"我又问他："你和谁说话，你怎么了？"小赵扶着一个人蹒跚地走过来。我一看是常师长，他负伤了。常师长看见我，张口就问我知不知道其他同志的情况，我把知道的都详细汇报了，并告诉他，康主任和赵参谋已回去摸情况，他们一会儿就回来。

原来小赵和常师长从小屋出来就和敌人接上火了。常师长打了一会，枪卡住了，小赵的子弹也打光了，常师长的脚被敌人的炮弹炸伤了，小赵背着常师长跑到这儿。我忙给常师长包扎了伤口，伤口不大是炮弹皮将脚后根削去一块肉。常师长说："我们得快走，一会敌人可能顺河搜查。"于是我和小赵俩人架着常师长顺着河边走，天黑又没有路，走的很慢，天亮时大约走了二十多里路。我们累坏了，走不动了。常师长说："我们休息一下，弄点野菜吃。"我们往地上一倒，想休息一下可却睡着了。也不知是什么时间我被

饿醒了。起来一看，常师长正在河边挖车辘轱菜（即车前子）。我赶快叫小赵起来，我们一起洗野菜。洗完就上山了，走到一处僻静处，坐下来吃野菜充饥。这时常师长叫我和小赵一块去，接关系，我们不同意，因为不能抛下常师长不管，都争着一个人去，可师长说你们二人同去，能互相照应，他藏好就是了。我们只好听常师长的，常师长嘱咐我们到接头地点特别小心，因为这个地点大家都知道，如果有人泄漏了，就会把我们全都消灭了。我们辞别了常师长走了一夜，天亮了，走进一个山谷。恰巧在小路边有一棵两人抱不过来的大松树，正是藏身的地方，我和小赵藏在这里。白天好不容易过去了，天黑后我们出来，小赵在树后埋伏，我一个人去接关系。我按约定发出了暗号，对方也回了暗号，对方原来是赵锡林同志，他也是得莫利人。我们把小赵喊出来，商量一下决定先去战场看一看。我们抄近路，半天时间就到了那里。

我们看到了牺牲的战友，心里非常悲痛，他们静静地躺在那，还有六七匹死马。我说弄点马肉回去，他们都同意了。于是由一个人放哨，我们两人用最快的速度割下几大块马肉。我们怕战场周围有敌人埋伏，所以不敢在这里久留。当我们回到常师长哪儿天已亮了，赵锡林同志向常师长做了汇报，我和小赵煮马肉。马肉虽然煮得半生不熟，我们还是吃了，吃完后就地休息。一会儿，天到下半夜师长叫醒我们，让我们想办法把战士的尸体埋上，并嘱咐如果有可能再弄些马肉，路上好吃。我建议小赵留下，师长说："不行，我不需要人照顾，你们三人都去。"于是我们又返回战场。在战场上我们碰上了康主任和赵参谋。我们共同掩埋了战友的尸体。所有牺牲的同志，没有一个是背部负伤的，全都是

从前胸打进去的，他们死的都很英勇。我们流着眼泪默默地向他们表示，一定要狠狠地惩罚敌人，给烈士们报仇。

我们一同回到常师长藏身的地方。师长看见康主任和赵参谋，紧握他们的手，高兴得说不出话来。常师长说，可能有负伤的同志到接头地点晚了一些，我们还得去接关系。并决定由我和小赵去，其余的人再去弄马肉，给回来的同志预备吃的。康主任虽然身体不好，大家又不让他去，可他坚决要去。

我和小赵到了接头地点，正碰上了老兰同志，我问他看见张锡淑没有，他告诉我："张负伤了在那边呢。"我们赶紧赶到那边，一看张锡淑没有人样了，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伤口还渗血呢。老兰和张锡淑不认识，语言又不通只能干瞪眼。我要给她包扎伤口，她不让，说一打开就不能走了。我说："你在这等着，我们去背些马肉回来接你。"她说："我先慢慢走。"我告诉她方向后，我们几个人又去背马肉。背马肉回来赶上了张锡淑，我扶着她，她告诉我，我和她分散后她就往山上跑，一看到处都是敌人，自己也不知什么时候受伤了。当走路时迈不开步，才发现裤子掉下了，一看裤带打断了，是腰部受了伤，她用绑带把腰缠上，不让它流血，后来她碰上老兰，老兰不知她负伤了，催她快走，她才告诉老兰她受伤了。老兰弄根木棍给她当拐杖，每天给她弄点野菜吃。由于二人语言不通，张锡淑又不让打开伤口，把老兰急的要命，现在碰上了我们，他才喘了一口气，说张锡淑真坚强。

我们几个人扶着常师长和张锡淑同志，一边沿着松花江边向北缓缓地走，一边想着过江的办法。常师长说，几年前在这不远处有一所小渔村，村中有一个地下联络站，负责人

是一个只有一条腿的中年人，不知是否还在，如果在我们过江就有希望了。于是常师长决定让赵参谋和赵锡林两人去接关系，他把联络的暗号及地点告诉了他们，并约定汇合地点，在一个有松树的柳茅子林。

常师长和张锡淑的伤很重，我们就搀扶他们走着，行动十分缓慢。当我们赶到指定的汇合地点时，赵参谋他们已经在那等我们呢。原来这个小渔村只有五六户人家，他们到那后，得知确有一个一条腿的中年汉子就去找他，说了一会话，就试探着对了一个暗号，结果，这人回了暗号，接上了头，联络员让我们先隐藏好，晚上再与我们见面。

晚上大约十点钟左右那个联络员划着一条破船来了，还给我们带来了一小桶稀饭。他问我们有什么要求，说他不能久留，怕敌人发现。赵参谋让他弄一条船，他说船都让鬼子弄去了，让我们不要着急，说完他就走了。第二天他又给我们送来了稀饭，并附代一张有关情况的纸卷，我们根据情报和自己的分析，明白了这次战斗失败的原因。

原来敌人早就知道了我们的这次行动计划，始终远远地跟着我们，我们派下山买盐的人一到山下就让敌人抓住了。这个人一看见鬼子就有一百多人，还有三四百伪军，他就害怕了，便叛变了革命，带着敌人来袭击。在伪军当中有一个姓田的排长，知道情况后就向地下党组织报信了，但交通不便，联系不上，这时敌人已把山区包围了。

常师长对交通员说："这一仗我们牺牲了十七个同志，死了二十一匹马，其余的，可能有骑马突围的同志，也有暂时联系不上的，也可能有被俘的，请地下党的同志注意接应一下。"

突围后的第十天夜里，我们在交通员的带领下，来到了江边。江上巡逻的汽船很多，半夜了我们来到藏船的地方，上了船，没有船家，我们几个人自己划，这几个人当中只有小赵会划。我们在他的指挥下，慢慢地划，由于不熟悉，船老是打转，一个大溜把我们冲了老远，常师长镇静地向大家一二、一二地喊口号，大家动作齐了，船也划的快了，我们刚到岸边，鬼子的巡逻船也开过来了。大家急忙下船，把船藏在树茅子里，下了船趴在堤下边，等敌人走后我们才起来。

张锡淑伤的厉害，常师长让她留在江南，她坚决不同意，我强迫她打开伤口用盐水给她洗，她真坚强，痛的一身汗也没吱一声。我们在常师长的率领下向军部走去，迎接即将到来的西征。

西征路上

我们终于在一九三八年三月，经过千辛万苦，走了十几天，到达了汤原县汤力川深山里，找到了三军司令部。

三军领导冯仲云、许亨植、张寿篯和金策同志，对我们表示热烈欢迎。司令部的医生马上给常师长和张锡淑重新包扎了伤口。第二天，冯政委找我和张锡淑谈话，他说："由于部队要西征急需军服，这里被服厂虽然有两位女同志，但她们不会染布，你和张锡淑来了，就去被服厂。"我和张锡淑去了被服厂。被服厂离司令部只隔一个小山。被服厂有十几个男同志，力气活由他们干，我们女同志也分了一下工。当时有一台脚踏缝纫机和两台手摇式缝纫机，张锡淑不能干重活，就锁扣眼，我专门裁衣服，其它同志做衣服。每天男同

志都要上山采野菜，找松树明子，劈成筷子粗晚上照明用。我们起早贪黑的做衣服，男同志做饭，二十多天，就把布都做完了，我们的眼睛被烟熏的又红又肿，脸上全是烟灰。

一九三八年四月，部队西征走了。西征部队有三军、六军、九军和十一军。我和一个九十多人的教导队留了下来，由参谋长许亨植和康主任带队，主要任务是学习、提高素质。大部队走后，我们每天学习文化、军事和革命理论，但由于敌人抽调了大批军队围剿我们，所以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艰苦。不但吃的没有，药也没有，特别缺少食盐，大家都浮肿了。为此，康主任带四名战士，出山到依兰县接关系。结果和强敌相遇，在战斗中康主任和另一名战士牺牲了，敌人又抽调了大批人马开始搜山，为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避免无谓的牺牲，我们停止了训练和学习，由许亨植带领我们在一九三八年六月也开始了西征。

我们沿着大部队走的路线前进，一路上我们看见不少死马和打仗留下的痕迹。没有粮食就把死马肉割下来.有的已经生蛆了，用盆子煮了每人带上几十斤路上吃。

有一天，我们和敌人相遇了，许参谋长马上把我们分成几十个小分队，和敌人展开游击战。大森林里对面看不见人，我们和敌人围着山转，一有机会就消灭他几个。我们在暗处，敌人在明处，我们打完就走，敌人也不清楚我们到底有多少人，所以只能挨打。敌人吃了亏，便在两天后调来了大部队。我们分散往山外撤，避开敌人。我们来到山下的一个小村子，村里也没有粮食，老百姓到地里弄了些青苞米，碾碎了，掺点野菜做了点粥给我们吃。一位老人告诉我们：“敌人现在搞坚壁清野，归屯并户，修战备路和建堡垒，到处抓人，我们这个地方没有来过大部队，来几次汉奸，抓了两个

人，其他人都跑了，抓去的人不知是死是活，老百姓都在山洞里不敢回来。”我们吃了老人家做的粥，许参谋长给老人家钱，他说什么也不要。我们又走了，离铁力不远有一个小村子，那里有一个小粮站，只有十几个看守。我们解决了小粮站，把粮食全部拿走，还有点盐和两匹马。刚走不远敌人就追上了，许参谋长马上把部队分成三个小组，一个小组带着粮食和马进山，另两个组交替掩护，边打边撤。敌人也不知道我们到底有多少人，懵头转向。这次我们还缴获了几支枪和一些弹药。我们进山后就把敌人甩掉了。在山里休整一段时间，因为没有吃的，我们又从森林深处往外走。我从没见过这样大的森林，地上的树叶有一尺多厚。许参谋长说这是原始森林，在那里走路要靠指南针。我们也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方了，山上没有野兽，也没有野菜，有时碰上大树有元枣子，它就象我们家树上结的枣子一样，但不能多吃，吃多了胀肚闹心。

一天晚上，金玉贤同志上了一个小山包，站在山包往四面看，发现有一个小山下边冒烟，她马上回来向许参谋长汇报。许参谋长分析说：“不知道是追来的敌人，还是土匪，不大可能有老百姓，现在情况不明不能动，我先去看看，如果是敌人，由金玉贤同志马上带领大家往东撤，如果没有问题再行动。”许参谋长说完就带领赵锡林那个班奔向了冒烟的地方。

他们来到房子周围什么都没有发现，许参谋长就让赵锡林前去叫门，开门的是个老头，他们以为是土匪来了，吓得直哆嗦。许参谋长告诉他们：我们是东北抗日联军，是打日本鬼子的队伍，是解救老百姓的，你们不要害怕，并且宣传了我军的政策，老人一看许参谋长说话和气，渐渐有了

好感，老人告诉我们，他们在这住了十几年，从没有人来过。

我们在那休息了三天，白天上山采野菜、打猎。老人告诉我们，山上有一个大树洞，里面有一头大黑瞎子。许参谋长一听就说："我们去打，打黑瞎子还是有经验的。"黑瞎子最小三四百斤，最大的能有七、八百斤，如果抓个黑瞎子可够我们吃好多日子。第二天去了一个班，带二挺机枪，还拿了好多木杆子。我们先用木杆子把洞口交叉别上，然后往洞里打枪。黑瞎子被枪一打，没命地往洞外冲，可冲不出来。我们用木棒打，它就回到洞中，隔了好长时间，洞里面没有一点动静，我们有个少数民族战士，在家打过猎，掏过黑瞎子洞。他要进去看一看，许参谋长看他身体好又有经验就同意了。他进去以后，黑瞎子已经死了。他用绳子把黑瞎子绑上，把绳头扔出来，大家一起往外拉。拉出来一看是一头黑毛的大黑瞎子。如果是黄毛的不能吃，肉臭。这个黑瞎子足有六七百斤，我们把黑瞎子扒了皮，切成不等的肉块，大家分别拿。进洞的那个战士说，洞里可好啦，黑瞎子有睡觉的地方，也有拉屎的地方。我们大家都好奇想进去看看，可许参谋长不让。我们把肉拿到老猎人家煮了，准备路上吃。当时煮了一大锅，尽管没有盐，大家吃的也很香。

这家猎户是张、刘两姓组成。姓张的是山东人，逃荒来到东北。有人告诉他有招工进山伐木头的活，每天供饭吃，还给两吊钱，如果干的好还可加钱，这样张家爷俩进了山。伐木头是个累活。工头说打就打，说骂就骂，再加上吃不饱，没有多少日子就折腾的不像样子。有一天，老人的儿子和把头打起来，结果失手将把头打死，没有办法父子俩改名换姓，进了深山，靠打猎为生。

姓刘的也是父子俩，当年被日本鬼子抓去当劳工，受不了罪，跑回了家。鬼子知道后，将他家老少三辈十几口人都杀了，只跑出他们父子俩，在这里，恰好碰上了姓张的这个好心人，将他父子二人带进深山，从此两家合为一家。

每年他们下山两次，一次是春天雪化时，一次是冬天下雪前，他们用打猎获得的皮子换回吃的、穿的、用的，生活倒还可以，平常是不下山的，怕敌人发现他们。一年以后，两位老人下山找了两个受苦的女孩子，带上山，为两对年青人成了亲，后来姓刘的老人去逝了，但他们始终是一家人，还添了三个小孩，日子虽然清苦但十分和谐，对老人都十分孝敬。

我们在这三天，得到了这户素不相识的人家帮助，渡过了这次难关。和老猎人分手时，大家都很难过。

我们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跋涉，战胜了饥饿和疲劳，终于到达了通北县南北河。这时，偏偏涨大水，每天都下大雨，过不了河，我们便困在河套里。山丁子、臭李子全被我们吃光了，没有办法河套里的树皮、树叶和草也吃光了，吃这些东西都拉不出屎，互相用手抠出来。受伤的同志更遭罪了，没有药伤口都发炎了。许参谋长让大家把所有的绑腿都解下来拧在一起。一头绑在大树上，另一头给两个会水的身体稍好的同志绑在腰上，他们二人手拉手，过了河。过河找到张光迪支队长。张队长命令大家做木伐，当天晚上张队长带上十几个人用一个小木伐，给我们送来了粥。第二天张队长他们做好十几个木排，把我们都接了过去。这个支队有一些布，许参谋长把所有的女同志集中在一起，做衣服。当时，在这的女同志有：李桂香、柳明玉、金玉贤、陈玉华，主要负责人是位朝鲜同志叫女臣。她是北满省委准备派到地

方上工作的，临时住在这里。她直爽、活泼、热情，大家都叫她陈大姐，领导还让十几个男同志帮忙，这些布很快就做完了，同志们穿上新衣服都很高兴。张光迪支队长带领部队出发，我们这些女同志后来又分别到各个支队去了。

郭瘸子叛变

一九三八年九月，我被派到北安东部南北河的一个新成立的被服厂。被服厂由我负责。成员有柳明玉、李桂香和住在这里的人还有陈玉华，李铁匠和郭瘸子。陈玉华是从苏联刚回来，临时住在这儿，李铁匠是李桂香的爱人，原在机械厂工作，西征后没有成立机械厂，他便与李 桂 香 在一起。郭瘸子是伤员，准备送后方医院，暂时住在这里。我们这里，没有粮吃，天天吃野菜，郭瘸子老是发牢骚，居功自傲，总讲一些落后话。我曾多次批评他，他表示坚决改正，可一遇到困难就动摇。

这天，支队领导派人通知我们下山背粮，郭瘸子行走不便，小电报员又那么瘦小，我没让他们去。我领着其余四人都去了。回来时，男同志力气大，背的多，走的也快，李铁匠说他先走，然后再回来接我们。他背着粮先走了，我们就坐在地上休息。他走有半个小时，突然听见一声枪响，我马上吩咐大家隐蔽，便 奔 被 服厂方向跑去。到被服厂没有发现任何动静，也没有新的脚印，我又跑回去把大 家 招 呼出来，但为防止万一，还是分散走。到了被服厂，我让李桂香在外面放哨，我和柳明玉进去。只听柳 明 玉 高喊："不好了，李铁匠受伤了！"我赶快跑过去一看，李铁匠已奄奄一息了。我晃着他的脑袋叫他："老李，老李这是怎么回事？"

老李慢慢睁开了眼睛，有气无力地讲了事情的经过。原来郭瘸子看见李铁匠背粮回来了就问："她们呢？"老李说："还挺远呢。"老李坐在床上准备卸背上的粮食，郭瘸子去接老李的枪，样子是帮忙，可他却向老李开了枪，然后慌慌张张地往西跑去了。郭投降了敌人，八一五解放后，把他抓住枪毙了。老李说完，用手指着西面，就牺牲了。大家望着朝夕相处的战友遗体都泣不成声。这时我忽然想起了陈玉华她怎么不见了。出去找，在一棵大树上找到了被绑在那的陈玉华。她嘴里还塞着毛巾，昏过去了。我们拿掉她嘴里的毛巾，叫了好一阵她才醒过来。我问她这是怎么回事，她告诉我们，我们走后，郭瘸子就对她说：咱们找点猴头、蘑菇，等他们回来好吃。陈玉华便和他就出去了。郭瘸子看见一棵树上有猴头，便让陈玉华踩着他肩膀上去采。当陈玉华上去时，他一下子把她拽下来，按在这棵树上用绑腿绑上。郭瘸子怕陈玉华叫人，便用毛巾堵住她的嘴。这还不算，还要扒陈玉华的衣服，正赶上李铁匠回来，便丢开陈玉华迎着老李去了。

我们回来后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掩埋了李铁匠。把个李桂香哭的死去活来。他们结婚几天，就分开了，这次相见才几天时间李铁匠就永远地离开了她。我劝她说："别哭了，这个仇以后一定要报，现在得赶快离开这里。"李桂香很坚强，和我们一起把被服厂的东西都藏好，只拿了一点针线和零用东西，然后又去了藏粮处，每人背了一点粮食又出发了。

火线抢救伤员

七八天后我们来到八道林子。环境很险恶，晚上不敢生

火，白天也不敢生火，乘早上那么一个空时，做了一点菜团子，饿了就吃一点。我们在那转了两天，第三天晚上，山沟里有烟，我让他们三人在一个小山下等我，我去看看，如果发生意外，她们可往西面走。我到冒烟的地方，不远处趴在地上，仔细观察了一会儿，见是武装队伍，我断定他们不是敌人，于是我就过去了。哨兵也发现了我，我和哨兵说我是南北河被服厂的，名叫张素贞，有急事找部队领导。哨兵领我去见首长。这个队伍是十一军六支队，支队长叫高继贤，政委于天放，鲁连峰是支队长的警卫员。我向首长汇报了我们的情况，首长便派人去接我们那三位同志，我们就留在这个部队了。

一九三八年十月，我们跟部队去消灭了日本的"红部"得了不少粮食、盐布和一些日用的东西，还缴获了四五支枪及弹药。往下撤时我发现小刘趴在地上，我就跑过去背他，他让我放下他去救老张，老张伤的很重，我正不知怎么办才好，又来了一位同志，她背了小刘，我又回去找老张，他一点也不能动，我背着他就跑，跑过二个小山坡，我也走不动了，我放下老张想歇一会，敌人又追来了，恰好支队长派人来接我。可老张轻声对我说："我不行了，你们快走。"说着便牺牲了。我们赶紧用一些树枝和草将他盖上。敌人打上来，我们边打边退，支队长留下一个班来接应我们。在天黑时赶上了大部队。在这次战斗总结时，于政委和支队长表扬了我，说我临危不惧、火线背伤员，让大家向我学习。

生死博斗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路军冯政委把我们分配到德都地

区北部的朝阳山被服厂去工作。临走时冯政委将我留下，向我宣布被服厂和医院都由我负责。冯政委说："你的胆子大，和别的女同志不一样，你在地方上工作过，有对敌斗争经验。组织上再三考虑担当这两项工作只有你最合适不过了。"组织上叫我干，当然不能讲价钱。冯政委向我介绍了医院的情况。冯政委最后交待这个医院是极端秘密，不能让被服厂的人知道。第二天，我们四个女同志带上司令部给我们的一匹马（必要时杀了吃）还有一些粮食和药品，跟着交通员来到了被服厂。

这个被服厂只有间八、九平方米的小房子，又是用树皮盖的。原来还有三个人，一个老杨头和一个小男孩，还有一个大干部候启刚，他每天写上告信，他说他是东方斯大林。再加上柳明玉、李桂香、金玉顺我们四个，这小房子怎么装得下？

交通员代表冯政委向大家宣布：被服厂由张素贞同志负责！老杨头说："这里有两台缝纫机，一台脚蹬式、一台手摇式，还有廿多匹布，三十多斤棉花。还有几斤粮食，再也没有其它东西了。"于是我们在这里开始了工作。被服厂的地点很好，两面有山，还有一条小河，树也很密的，不到跟前是看不见的。当天晚上我们四个女同志在小屋外面露宿。第二天老杨头拿来一匹布做一个大帐篷。人在帐篷里住，工作在小房子里，我把这边安排好了，便和交通员去了医院。

医院离被服厂不远，只隔一座小山。医院的地点也很好，房子在一个小山包下的一个小山洞里，一般是找不到的。这里有十几个伤员，有一个王医官，有两个重伤号。李井印副参谋长也在这里养病。李副参谋长还带来一名警卫员和一挺歪把子机枪。

交通员向王医官和伤员宣布了冯政委的命令：医院由张素贞负责。给他们开了个会，告诉大家，总指挥给我们拿来了粮食、药品，还有一匹马。大家听了，非常感谢领导的关怀。我向大家说："我们现在很困难，敌人特别疯狂，部队上也没有粮食和药，但是我们一定要顶得住！现在下雪了，没有野菜了，我们就扒树皮煮着吃，一定要生存下去。总指挥给的这匹马，就是让我们在实在没有办法时，把它杀了吃。"我又说："我为什么从小就参加革命？是为了解放自己和解放全中国受压迫的人民。我们都是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我们要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共渡难关。"

李副参谋长也讲了许多鼓励大家的话，王医官决心很大，还有几个伤员也表了态，会开得很好。开完会，我回到了被服厂。

快过春节了，部队派来两个人，用四匹马给我们送粮和药品，当然还有其它东西。伤病员们很受感动，围着部队来的同志问这问那，可亲热啦。部队同志走时，我叫他们把这做成的衣服全带走。

转年秋天，工作更紧张。我们拼命干，白天不歇气，晚上点明子。终于在下雪前把衣服全做完。

这年冬天雪很大，部队首长通知说，敌人要大讨伐了，要我们做好准备工作。每年冬天下大雪敌人是不进山的，可今年却例外。原来三支队参谋长王钧率部队解决了沐河屯的警察署，又消灭了四站的日本大本营和那里的警察署，敌人吃亏了，恼羞成怒，对我军进行了报复，所以采取了拉大网式的办法进山大讨伐。

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坚壁起来，每人只留下自己的小背包，还有几个盆子。这几天我们的大部队又打了胜仗，缴获

不少的粮食，还有其它东西。他们给我们送来不少战利品，送到指定地方就回去了，然后通知我们自己去背。

我们四个女同志都去了，老杨头岁数太大，小苏是个孩子，就没有让他们去。当我们回来时，发现在通往被服厂的路上有皮鞋印，我当时断定肯定是有敌人，因为我们走过的路都用树叉干拖着把脚印盖上，现在有了新脚印一定是出事了。我马上命令大家把粮食藏好，然后分散到离被服厂不远的地方观察动静。被服厂被敌人烧了，我当时想老杨和小苏也不知是跑出来了没有呢，还是被敌人抓去了？但来不及细想，便让她们仨往山那边跑，约定在一棵大桦树下的山洞里等我。我从小山穿过去直奔医院，到医院的河边看见王青春在那站岗，我忙说："快回去，叫大家撤！敌人已把被服厂烧了。"于是我和王青春进屋组织撤退。伤病员互相搀扶着很快上了后山，我把李参谋长带来的机枪拿在手，王青春和我一起留下掩护大家上山。不大功夫，来了一小股敌人。我端起机枪就打，打了一阵，敌人便退下去了。敌人一走，我马上命令伤员撤，并在那个山洞里把那三个女同志找来。怕目标大，被敌人发现，我们便分散走，走后把走过的路全盖上。我们一天走不了多少路，两个重伤员得用人架着走，深山老林雪那么深，好人走都费劲，何况是重伤员呢。太累了，在一处比较隐蔽的地方，大家坐下来休息。我们几个女同志找了一些干树枝，准备生火给大家弄点吃的。这时忽然听到森林里传来说话的声音。这可把我们吓了一跳，我立刻和大家商量赶快散开，能走的就走，不能走的就留下，能活一个是一个，我再三请求李副参谋长："你带她们走吧！我和两个重伤员先隐蔽起来，如果敌人来了没有办法就和他们拼，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李副参谋长说："好吧，只好这样了，

你们要多注意，不能大意了，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他把机枪交给我了，说声多保重就带领其他同志走了。那时的每次分别都是生死之别，谁也不知道能否再相见。

我把两个重伤员背到一个大树洞里藏好，告诉他们二人不能出来，如果没有意外，我会来的，到明天不回来，就可能牺牲了。说完把刚走过的路盖好，就走了。走出很远的地方，我靠在一棵大树上坐下想休息一下，刚一坐下就睡着了。当我听见有说话声时候，天已大亮了。我马上警惕起来，悄悄地往前爬，我看见前边有人在那扒树皮，才放心，是自己人。我就站起来向前走，一边走一边问他们是哪个部队的，他们听到有人问话，马上就散开，问我是什么人，我告诉他们我是张素贞。他们听说是张素贞，又问有多少人，我告诉他们就我一人，他们看周围没有人就向我跑来。我也向他们跑去，一看是张志荣和郭政委。当时，真象离散多年的亲人相见，眼泪直往下滴，半天也说不出话来，我喝了一口水才说出话来。我告诉他们，被服厂和医院都让敌人烧了，老杨头和小苏不知去向，李井印副参谋长带领其他人转移了，还有两名重伤员在树洞里。

郭政委问明李井印副参谋长所走的方向后，派人把他们找回来，又把那两名重伤员也背来了，我和几名女同志给大家做了一顿美餐，是用松树皮和米熬成的粥。坐在火堆前，郭政委说：“这次敌人大讨伐是因为我们抄了他们老窝，敌人狗急跳墙，对我们进行了疯狂的围剿。敌人进山，我们出山还是抄他们老窝，但是已晚了，敌人把出路封锁了，我们出不去只好开向深山老林甩掉敌人。”

郭政委又召开了干部会，会议决定能走的就跟部队走，不能走的先留下。郭政委把他自己的马杀了留给不能走的同

志，又给留下的同志盖了一个小窝棚。我提出要留下，因为老杨头和小苏还不知去向呢，郭政委同意了。留下的同志还有王医官、李井印副参谋长和他的警卫员王青春等。

这天过半夜，我和王青春去找老杨和小苏。摸到被服厂，天刚蒙蒙亮，就听见有人走路的声音。爬近被服厂一看，一老一小站在山下的雪地上。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便使劲揉了揉，这回看清楚了，果然是他们。我差点没叫出来，拉着王青春往山下跑，由于山坡陡，我俩叽哩轱辘往下滚，我索性坐下往下滑，老杨和小苏也看见了我们，也一个劲地往这边跑。跑到一起了，老杨拉着王青春问这问那，小苏扑到我怀里喊我："老班长可见到你们了，我都做好牺牲的准备了。"小苏又哭又笑，我望着他那稚气的脸，又把他搂在怀里，两眼涌出了泪水。心里想这孩子在家或许正和妈妈撒娇呢，可现在却是一名小战士了。

老杨说前天我们走后不一会儿，敌人就到了。当时他们正准备做饭，我们回来好吃，突然听见从西边传来的马嘶声，老杨说："不好，是敌人，快走。"但已晚了，敌人已到了跟前，日伪军把他俩抓住连踢带打，问了半天，老杨头的胳膊让敌人的刺刀刺伤了，他一口咬定是打猎的，敌人没有办法，临走烧了破草房，并把他俩也带走了。

晚上敌人宿营时，把老杨头绑在树上，留一个伪军看守。他们一天没吃东西，北风呼呼寒气袭人，老杨的伤口还在流血，身上在渐渐地瑟瑟发抖，伪军看他可能不行了，也不看他，天气又冷，那伪军看见其他人都睡了，也钻进帐棚里烤火去了。机警的小苏悄悄地把老杨的绳子松开，他们俩就在附近的榛柴棵里藏了起来，当敌人发现人跑了，就赶紧找，敌人找不到就走了，老杨和小苏才回来。我也把我

们的经历简单地向他们讲了一遍。我撕了一块衣服布，把老杨的伤口包扎起来，准备走。忽听脚步声，我们马上散开，等了好半天，看见三个人，其中有一人是王福臣同志。

原来，王福臣同志早已来过被服厂，他看见被服厂已被敌人烧了，还冒着烟，断定时间不太长，赶紧回去向总指挥张寿篯汇报，总指挥命令他带两名同志来找我们。总指挥态度很坚决，他说："一定要把她们找回来，不管是死的，还是活的。"所以他们又到被服厂的地方找线索。他们发现有一条敌人走过的脚印，就顺着脚印跟着走，当他们发现路旁的一些倒木上没有雪时，就知道是自己人走过的路。我握着王福臣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也不住地往下淌。

王福臣同志让我回去向总指挥汇报，这里的一切暂时交给老杨负责。我临走时，和大家拉着手，不愿分开，我让他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事互相商量。我跟随王福臣同志回到指挥部作了详细汇报，总指挥说："被服厂和医院虽然烧了，人还活着，多一个同志革命就多一颗种子。"

总指挥让我在这休息几天，跟大家学学拉丁文。我就每天跟他们学拉丁文，由马克正同志来教。拉丁文比中国字好学，26个字母背下来，往起一拼，就能说话。我学的很认真，我们互相都能用拉丁文说话了。一个月后，许亨植参谋长找我谈话，让我到干校去工作，也可以听课，我便去了干校。

这个干校在深山老林里，有山有水，山也很特别，悬崖峭壁，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山，峭壁下有一条河，还有很多小河沟子和一片沟塘，进去就找不到路。那里已经有好几个女同志：安景淑、金伯文、李桂香、陈玉华等。我们给学员

洗衣服、做饭，保证学员学习好，一有时间，我们就一起听课。

这些学员都是各支队调来的，学习完后，再回到各支队担任领导工作，教课任务主要是全昌哲和张兰生二人担任。总指挥部的领导也讲课，我在那呆了两个多月，学员都走了，我们也就都走了，我和李桂香又分到三支队后方去了。

深山开荒

一九三九年六月，我到三支队后方海伦县工作，具体地点在大青灌一带的八道林子。

在厂长耿殿君的带领下到山里建立被服厂。我们每人都背着粮和自己用的东西，只有十二支队支队长朴吉松的爱人金玉善用马驮着走，因为她即将临产了。当时我俩尚不大熟悉，只看见她肚子挺大，这一路上，全是我照顾她，什么吃饭了、喝水、洗衣服、洗脸、洗脚都是我帮忙，连上厕所我也陪着她。

几天后，我们到了建被服厂的地方。这个地方很好，二座山特别大，山坡上的阳光很好，东面山下有一条大河，河面有三四米宽河水有一米多深。水流很急，人下去站不住脚。水特别凉。我们在山中间盖了一个能有十几平方米的房子。这就是我们新的被服厂。

我们到这后因为没有布，不能做衣服。耿殿君同志提出开荒种地，我们都同意。山坡上都是榛子树，土质好，我和李桂香上山用刀砍榛子树。耿殿君同志去搞农具，他走了五六天回来时带回不少农具和种子。我们上山开荒种地，家里由林玉珍看家并照顾金玉善。他的脚趾全都冻掉了，手指仅

剩五六个。

地种上了要防止山鸡吃种子，苗出来了也要看着，怕给山鸡和小松鼠吃了，长出苞米穗更得看着，怕野兽给糟踏了。我们正忙的时候，金玉善要生孩子，耿殿君叫我和李桂香留下，他们上山干活。耿殿君嘱咐我，小孩出来后，你就把孩子肚脐上的一条肠子用剪刀剪断再用线绑上就行了。这几天金玉善又哭又叫，我们也不知怎样安慰她。过了两天一夜孩子生下来了，是个男孩。我们真高兴！忘了剪那条肠子，同时又下来一堆东西，我可吓坏了。过了一会，金玉善问我孩子的脐带剪了没有，我们以为她要看孩子就去抱孩子，才发现那条肠子没剪，便赶紧剪断并用线系上。我们把孩子包好后，发现金玉善象个死人。我们又忙乎她，不一会儿好了。那条肠子剪了，可又对那堆东西发愁，这东西往那放呢？李桂香说她在家时，羊下羔都有包小羊的口袋，这包东西可能是小孩的口袋吧。羊的口袋挂在树上，小孩的口袋也得挂在树上，于是我们把口袋挂在树上。李桂香去地里报喜，我给产妇做饭。地里的人回来一看树上的东西，就问李桂香为什么挂在树上。李桂香说："在家时包羊的东西就挂在树上！"耿殿君说那是牲口的人的不能挂，要埋上。大家把那东西摘下来埋上。

第二天耿殿君去总指挥部办事，我说如果12支队过来就好了，好向朴吉松支队长报喜呀。白天下雨不下地，就逗孩子，大家都说小孩真好，就是太瘦，奶水也不足。一天晚上，孩子玩了一会儿，在大家都要睡觉时，孩子不哭了，一看死了，怎么死的也不知道，打开一看，脐带还有血呢，这可把大家心疼坏了。后来金玉善说："死了也好，活着也遭罪，还要拖累我和大家，只是他父亲一眼也没看见就死了，

可怜的。”

我们种的这几亩地长的很好，没有事上山采野菜和蘑菇，晒干了冬天吃。

开拓团报警

一天耿殿君同志从支队回来说，支队要去解决日本的开拓团，能走的人都去，他给我和李桂香也报名了。当时把我和李桂香高兴的了不得。第二天，天还没亮我们就走了，到了总指挥部，我们奉命随警卫班一起活动，一切听警卫班长指挥。约摸晌午就出发了，到了一个小村子，在那吃中午饭，吃完饭睡觉休息。可我怎么也睡不着。总想打仗的事。一会儿警卫班长来对我们说："可不许掉队啊！"我们就跟着队伍出发了。到了一个地方，天也黑了，说是休息一会儿。不一会儿，班长领来一个老头儿，他姓梁，让我们跟他走，我不高兴可不敢说。我们五人跟老头儿走了。过一会儿听见枪响，老头儿让我们匍伏前进，一会到了一个大房子跟前，老头儿告诉我们看见什么就拿什么能拿多少就拿多少，动作要快。我们一看里面东西真多，也不知拿什么好，老头儿说："快，不然大队撤了就坏了。"我和李桂香打了个大包袱，并往里塞针、线和剪子。然后每人背了三匹布。往回走时背不动，又舍不得丢，那边的枪声一直响着，我们得快走，我和李桂香把布摞在一起，撕一块布当带子，把布捆上扛着往外撤。到了集合地点，又来两个人，他们拿的是吃的东西。这时老梁头儿回来说："我们先走吧。"老梁头儿背着子弹还有两支枪，我们走不远，就碰上增援的敌人来了，老梁头儿让我和他留下，把身上的东西交给其它三人。我和老梁头儿趴在一个大石头后面，

老梁头儿说:“怎么能让大部队知道敌人有增援部队来了呢？回去送信是不可能了，我们打枪报警吧！”就这样，我们二人同时开枪，支队那边知道了有情况，马上改变路线撤了下来。我和老梁边打边退，支队长也派人来接应我们，我们来到了第二集合地点，由耿殿君同志直接把我和李桂香带回八道林子。我们每人都背着上百斤重的东西，有一匹马伤了，也给了我们，回来后，马上把马杀了。

后来耿殿君告诉我们，缴获多少枪和子弹，打死了多少敌人，我们也伤了三个同志，但都是轻伤，不用住院，去的人都满载而归，特别表扬了老梁头儿灵活机动给部队报警，使部队顺利脱险撤退。

哪里需要我就到哪里去

秋收了，耿殿君同志有事走了，被服厂让我负责。为了安排秋菜，我们四人来到地里，因为近一段没人看地，有不少菜让花兔吃了，各种野鸡也来凑热闹，我们开始收菜，老林和金玉善身体不好，行走不便，就让他俩在家晒豆角干和角瓜片，留着冬天吃，我和李桂香往家运秋菜。连角瓜秧和窝瓜秧我们也都收回去，一共收了二百多斤土豆、一百多斤黄豆，还有五、六百斤苞米。这么多的东西没有地方放，在我们住的房子旁接了一个小房，把苞米和不怕冻的东西放在那里。

秋收后便开始准备冬天的烧柴。我们住的周围的树是不能动的，怕暴露目标，就得到很远的地方砍。九月份耿殿君同志来了，还带来一个叫安井淑的孕妇，她是金昌哲的爱人。她怀孕三个月，肚子老是疼，到我们这来休养，到这没几

天，肚子疼的直叫唤，我们听着都受不了。有一天，上厕所，我陪着她去，刚走到门口，她疼的一下就坐在地上，我让她在屋里便，别出去了，可她说什么也不干，没有办法，我又陪她出去了，她刚蹲下，也不知掉出来一大块什么东西，仔细一看是小孩的脚，臭的不行了，这时才知道小孩死了，也不知死了多长时间。从那天起她肚子一疼我就用手给她往外拿那臭肉烂肉，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卫生可讲，以后肚子就不疼了，我们都很高兴。后来，她生的孩子都没活，直到八一五解放后她回朝鲜，生了两个孩子都活了。

一九三九年十月份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耿殿君同志是支部书记。在支部会上大家对我提出了希望，我永远忘不了那天，我高兴的一夜没有睡觉，心潮起伏，我想我这条路走对了，虽然艰苦但是只有这条路才能有出路，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解放自己，解放全中国。我在高兴的时候想起了我的双亲、我的哥哥，不知他们怎么样了，是否还活着，如果他们知道我已长大成人了该有多么高兴啊！我想着想着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我下定决心，今后一定要更严格地要求自己，党叫干啥就干啥。

吃完早饭后，耿殿君同志又走了，他走后，我和李桂香要上山砍柴，老林同志也要去，我说："你来回走不方便就别去了。"他说："在家闷的慌，不如到山上玩玩。"话是这么说，可我知道他是一个不愿吃闲饭的人，是一个十分坚强的人，这样，我们三人进山了。临走时，我跟安井淑和金玉善说："天气不太冷，不要老干活，到外面透透气，看看有没有什么动静。"我们进山后，找到一处有水的地方搭了一个窝棚。第二天开始砍柴休息的时候，我们又发现了山葡萄和山丁树，采了不少当天连夜送回去。第二天我们又上山

了，一住半个多月。我们不但打了好多柴，又采了不少野果。安井淑和金玉善把山葡萄做成酒，我们开始拉柴，柴没拉完，耿殿君同志回来了。传达了上级指示让我和金玉善去总指挥部报到。安井淑不高兴地说："过冬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单在这时候调走！"我说："我已经是共产党员了，哪里需要我，我就去哪里！以后我们还会见面的。"那一夜大家都没有睡觉，都舍不得我们走，天亮时，战友为我们做了一顿干饭吃，然后依依不舍送我们上路了，我们每个人眼里都闪着泪花，互相告诉对方珍重。

到了总指挥部后金玉善去了十二支队，我又到朝阳山的的一个被服厂工作去了。

突破封锁线

一九三九年十一日，我到了朝阳山。先见了被服厂的负责人马克政同志。我们认识，他教过我们拉丁文。马克政向我介绍了这里的四位女同志，两位男同志。四位女同志我都认识。她们是：李淑真、柳明玉、金玉顺、陈玉华。我领着女同志做衣服，马克政领着男同志送衣服、做饭。

我们搭两个大帐蓬，专门用来裁衣服和做衣服。房子让大家休息睡觉。我们休人不休机器，黑天白天轮流干。这样一天能做二十几套军衣。

总指挥部考虑我们任务重，又调来四位女同志，并送来不少明子。这四位女同志是：李桂香、张静淑、张锡淑、安井淑。大家见面，热闹一阵后，就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大家齐心合力，经一个月的时间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互相看一看都笑了，原来我们全都成了黑包公。这

一个多月每人平均每天只能睡上二、三个小时的觉。大家也都瘦的不象样子。做好的衣服由马克政组织人运出去了，我们把机器全部藏好，总指挥部的交通员来了，把张静淑、陈玉华、安井淑、张锡淑等四名同志调走，其他人全部留下。

一天，总指挥部来人，通知我们敌人要开始大搜山了，让我们注意。敌人一搜山我们就不能上山扒松树皮了，这也就是断了我们的生路，不扒树皮，就没有吃的。雪下的又这么大，一点吃的没有怎么办呢？我们在一起开了一个党员会，号召党员带动大家克服困难，寻找生路。大家一致同意往山外走，冲出封锁线。我们把大帐蓬拿下来，每人分一块布，往身上一披（布是白色的）离远处看分不出是雪地还是人。临行前再次开会讲了几点注意和要求。特别强调了互相帮助、争取不丢下一个同志，全部走出去。要求不管男女，身体好一点的同志轮班在前面开路。山里雪很大都在一米以上，不用故意盖脚印，大雪一会就盖上了。我们要趟雪走路，不许走出声音。一旦有踩雪声，我们很容易被敌人发现。还不准说话，一个跟一个，如果有人倒下，必须把他搀起来。我们走了十几里路，好不容易过了封锁线。封锁线是过去了，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当然是找部队，找吃的。我们大家已好长时间没有吃东西了，有些身体弱的同志支持不住了。我和马克政研究一下把大家分成三个组，我和李桂香一组，主要任务是寻找部队。我们二人走了大半天，看见有新的马爬犁印，是往山下走的。那上面一定有人，我和李桂香一商量往山上走，走了有四、五里路就看见马爬犁印乱了，又走了一里来路看见有个小房的烟囱在冒烟，我让李桂香在外面放哨，我进去看看。那时女同志的装束和男同志一样，难分出男女，我进屋后，那里面有三个人，我问他们是干什

么的，他们说，是上山来给干活的人做饭的，山上有十几个人伐木头，每天有五张马爬犁来拉木头。我又问他们木头是谁家的，他们告诉我是朝阳山地区一家姓刘的把头家的。我对他们说：我们不打你们，也不骂你们，只要你们说的是实话就行，我们人都在那边休息呢，你们先给我们做些饭可以吗？他说："这有现成的。"我说："这些不够，再做两锅窝窝头吧！"他们没说什么就去做了，我出来让李桂香先进去吃饭，她吃完后，我又进去吃，过了一会，第一锅窝窝头做好了，李桂香送了出去，她回来后第二锅窝窝头也好了，我们又拿了一些咸菜，临走时，我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把头来了，你们就对他说，这些粮先借给我们，我们是游击队，过两天我们还要来的。"我们拿着这些干粮又返回去找马克政同志。走着走着天黑了，我们实在太累了，找个地方休息一下，李桂香说那边有一棵大倒树，我们到那里一看倒树中间是空的，我们二人就钻进去了。在这里美美地睡一宿，等我们醒来，出来一看太阳老高了，吃了一点东西，就赶紧出山。走不远听见马叫，赶紧藏起来，一会又听见有人说话。

我对李桂香说："你向南去，如果发现敌人你就跑，我能找到你。"我匍伏前进，到跟前一看，是马克政同志，我高兴的大叫一声，向他们跑去。

原来他们是来接我们的。我把李桂香叫回来，与大家坐在一起，吃起窝窝头来。马克政同志说他们碰上了六支队的人了，支队长叫高继贤、政委于天放。我一听很高兴，终于找到大部队。

找九支队

一个多月后，开春了。敌人又来讨伐，这一天要和敌人打仗，六支队有个隋大队长，他的爱人金玉坤同志要生小孩。我们女同志和金玉坤一块撤。可她跑不动，我就搀着她跑，跑了一会她要解手，那里是解手，她生了孩子。这可怎么办，这么大雪，天又这么冷，孩子能活吗？孩子生下后我用我的衣服把孩子抱上就跑，金玉坤由其它同志架着走，也不知走了多远，也该着孩子有命，我们看见一个小房子就进去了，屋里有两个老头，还有一个小火炕，我马上把孩子打开，给她剪了脐带，是个女孩。我和金玉坤在这住了好几天。让老人给孩子找个人家，老人也知我们是游击队就答应了。这个孩子现在在依兰县，是解放后找到的，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只知道姓隋。

我们十几个人就在朝阳山地区转，没有吃的，尽吃松树皮也不行啊，何况还有个产妇呢，于是决定往外走，在一个小山沟里有个人家。这家三口人，老俩口和一个儿子，是从山外逃来的，我告诉他们，我们是游击队是抗日的队伍，老人家说："我知道你们是游击队，你们一进来我就看出来了，昨天还有游击队在这里住，他们是九支队的。"我们一听可高兴啦！如果能找到九支队也好啊！老人说："他们可能要进山，这几天敌人到处找游击队呢。"于是我们决定找九支队。

第二天，我们顺着九支队走过的路前进。我们走出山谷也没有找到九支队。这天是大年三十，我们走到一个小村子边。我们派出四个人去侦察看看村里动静，这四个同志摸的

也巧，她们去的这家竟是我们地下工作人员的家。这位地下工作人员是这周围三个村子的救国会的负责人，他告诉我们说："三支队长王明贵和王均同志都来这里过，还有其他部队也来过，许亨植参谋长来过多次。"说话间他家人给我们端上了饭菜。我们吃的真香，吃完饭我们都休息了。

过了初五，我们要走了，他给我们搞了好多粮和盐，并告诉我们九支队就在这一带活动。我们离开村子的第四天就找到了九支队。

路口阻击

一九四〇年二月，我在九支队机枪班当班长。

九支队队长边凤祥，政委郭铁坚，政治部主任姓周。在九支队的女同志有李淑珍，她是郭政委的爱人，顾玉明是张大队长的爱人，还有李桂香和我。

这年，敌人特别疯狂，归户并屯很猖獗，敌人手段相当毒辣，他们想把我们与老百姓分开，置我们于死地。

由于敌人的封锁，我们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头，大家每天只能用野草充饥，郭铁坚政委每天都去各大队，给大家讲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讲红军战士没有吃、没有穿、过雪山、爬草地，上有敌机轰炸，后有敌人追兵，讲红军战士不怕牺牲、不怕困难，终于到达目的地的事迹。他说："我们的困难是暂时的，大家要克服困难，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有一天，全支队集合，郭政委作动员，让大家提起精神，去解决日本的开拓团。于是向开拓团进发。

我们走了好长时间，走到离敌人不远的地方隐蔽起来

了。这个开拓团分三个地方，相隔都很远，我们也分成三个组，边支队长带有二十多人去解决粮库，周主任带几十人去解决老营，郭政委带二十多人去解决商店。郭政委把我们机枪班留下，叫我们守住路口。任务下得很死，要我们不准放过一个人。我们当时有两挺机枪，但子弹很少。我把十三个人分成两个小组，把住路口。郭政委又派两名同志，用两匹马驮着一挺机枪和几箱弹药给我们送来了。快到半夜了，通讯员来通知我们，掩护大部队进山。

在大部队往下撤时，敌人的增援部队来了，是骑兵。我告诉大家先隐蔽，等敌人近了再打。我们三挺机枪交叉打，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敌人冲不过来，也不知道我们游击队有多少人。我们打退了敌人一次次的冲锋，有两位同志受伤了，我给他们包扎好，背到隐蔽处。然后叫人掩护其撤退。我们九个人藏在大石头后面，敌人上来我们就打，敌人退下去，我们就休息。我估计大部队撤的差不多了，就让两个小组交替往下撤。可敌人却不冲了，只要我们一露头，他们就打，这非常明显，他们在等增援部队。我说："不能再等。"我让张子荣同志拿着一挺机枪先慢慢下去，到了一个隐蔽处，支上机枪，掩护同志一个一个替换着往下撤。这时郭政委派了一个班接应我们，等我们全部撤进山里，天都大亮了。

郭政委作了战斗总结，他说："我们牺牲了两位同志，受伤了三位同志。打死敌人数十名，缴获大批的枪支、弹药、粮食、布匹，还有二十多匹马。这次战斗是胜利的，特别是机枪班圆满地完成了阻击任务。"

有一天郭政委把我们三个女同志都找去，告诉我们总指挥部送来一批布，让我们进山去尽快做完。

战 场 呕 血

两天后我们上被服厂，经过一个小河沟。那天天气特别热，我们便蹲在河沟边想洗洗脸，可刚蹲下就看见沟边的草在动，我们以为遇见敌人就趴下了。这时我看见有个人在爬，我问他"什么人？"他听见女人声音抬起头看我，我一看认得这不是小徐吗？"你怎么在这呢？"我问他。他看见我既高兴又难过。他是个大学生，在后方搞宣传工作的，是个二十几岁的青年。

他告诉我，有一次敌人抄袭了他们的驻地。他把一切都处理完，背着文件和油印机跑出来后，和其他同志断了联系。他独自一人趟着大雪，过了好几个山坡，天黑时，他靠在一棵大树上想休息一下，结果睡着了，醒来后双脚不能动弹了。后来去后方医院养了一段时间，敌人大讨伐把医院破坏了，全部撤到大森林里，因为大森林里吃的东西少，只能靠别人给采着吃，所以他自己要求不进大森林，就在小山跟前的这条小河沟边来回爬，挖野菜，吃野草，顽强地生存着。后来六支队来了，高继贤支队长派人给他挖了一个山洞，怕他在外面睡觉让野兽吃了，又给他留下粮食。他怕粮食不够吃，还是以吃野草、野菜为主，但他从不离开小河沟的。听他说完后，我们说不要走远，免得部队的人来看不见你，我们又给他留下粮食，告诉他，交通员会尽快和总指挥取得联系，望他耐心等待。他说："再艰难困苦也改变不了我们的信念，我决不会投降敌人的。"他的话老是在我耳边回响，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

我们到了这个被服厂，房子是现成的，那里有两个男同志，由张子荣带领一个班给我们站岗放哨。那两个男同志

说："我们在这好几个月了，有八十几匹布，都是染好的，有一台脚登式缝纫机，只等人做。"于是我们就干了起来。还是和以前一样又紧张又困又累，每天睡三、四小时的觉，边干边收拾，不然敌人来了再收拾就不赶趟了。有一天，张子荣同志来了，让我们快撤，说敌人来这不远了。我让李桂香背着剩下的布，柳明玉背着有用的东西，那两个男同志背着没藏完的粮食，分散跑。可这时枪声离着很近了，我就用一块布把整个缝纫机一捆背着就往后山跑，手里还拎着自己的小背包和小提兜，那里有针、线、尺等东西。我翻过两个小山头后，就觉得心口发热、口发咸，透不过气来。放下缝纫机休息一会，刚放下一口鲜血吐了出来，还有血块，接着又吐了几口。我当时就觉得头昏脑胀，坐在地上起不来。原来大家都叫我假小子，就是同样几天不吃饭，我也比别人有体力，这回可完了，怎么也起不来了，我让李桂香找那两位男同志，想办法把缝纫机藏起来，如果找不到就让李桂香和柳明玉把缝纫机卸开藏好，我躺在那一动也不动。从那以后一天不如一天。

后来上级党组织通过地方组织给我弄来了最好的止血药，一共七丸，每天吃一丸，把血止住了。

我不吐血了，可留下了妇女病的后遗症，一来月经就口鼻窜血，又腥又臭，直到"八一五"光复后，我由苏联回到祖国才把病治好，也渐渐地胖了起来。

在深山老林中

我不吐血后，身体一直很虚弱，有一次，指挥部交通员让我们三个女同志都去六支部做衣服，他们有布没有人做。

说好一天到，可由于我的缘故，我们到那已过两天时间了。部队走了，我难过的哭了，交通员说："别难过，可能有情况，不然不会走的，你们在这先等着，我去看一看。"交通员两天后回来了，又带来两个人，还带来了粮和其他吃的东西。领导对我的现状很关心，来人是六军十二团的，其中一人是梁成玉同志，我们二人从小在一起，都是得莫利人，我们虽然不是亲姐弟，但比亲姐弟还亲。到现在七十来岁的人啦，他依然叫我姐姐，我叫他弟弟。他解放后在吉林园林处工作，现在离休在家，住在吉林老红军楼。他是关主任的警卫员，来的另一人就是政治部的关主任。一路上梁成玉同志对我百般照顾，到时候喂马，放马都不用我，我只管骑马就行了。我们到了森林的深处，看见用树皮盖的小房子。这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有两台脚登缝纫机，还有用树皮搭的裁衣服的案子，地上还有木蹲子，什么都准备好了，把缝纫机和布往屋一拿，就工作了。有两个男同志帮助我裁衣服，吃饭的时候，也不过问，做什么就吃什么。给我的饭是粮多菜少还是干的，一开始没注意，后来我发现大部队吃的全都是稀的，而且都是野菜多。于是我受感动了，捧着饭碗直掉眼泪，组织上对我多关怀呀！

外面的敌人大讨伐了，每天都在山上转，有一天，外面部队的同志回来说："敌人派大批军队搜山了，做好准备工作，关主任找到我们三人，告诉了我们九支部队的活动地点，给我们每人一匹马，带上吃的东西，让我们回九支部队。于是我们三人离开十二团，找了五六天才找到九支队。

郭政委身体不好，带上我们二十多体弱多病的人进了深山老林。过了几天，我们派人出山，都没能出去。一个月后，没有吃的，连马都杀了。有些人说："我们这是蹲山主

义，早晚得饿死，不如和敌人拼了算了，死了也光荣。”郭政委却说：“我们要想办法活，都死了谁打日本呢？”于是大家都在想办法，老刘说：“能找到河边也行，有河边就有野菜和野果，因为臭李子树和车轱辘菜都生在河边的。”郭政委召开了党员会，鼓励党员要有克服困难的信心。又把人员分成两部份，稍强一点的去找部队，不能走的，慢慢走找河沟。当时我想，我不能拖累大家，更不能有悲观情绪，革命是要有精神的，包括牺牲精神，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要坚持到底，决不低头。我跟着郭政委找野菜，我们这部分人终于找到了小河，顺着小河找到了野菜，野果等。还找到了蘑菇。去找部队的同志也回来了，带来了粮和其他东西，我们又有了活力，既然出了深山老林大家都不愿回去。

异 国 日 夜

一九四一年八月。

我们这些人围着朝阳山和敌人转，白天我们趴在苞地和高粱地，晚上老百姓让我们进村吃饭。秋天到了，要割地了，我们也不能在苞米地和高粱地里呆着了，能走的同志每人都背着整个苞米棒往山里走。这时郭政委把我们三个女同志找来，说是让我们去学习，没说什么地方，派几个同志护送我们，郭政委也同行，当我们离黑河不远时，郭政委才告诉我们到苏联去学看护，半年就能回来，又说以后的一段路一切都听兰交通的。

我们五个人中有两个国际交通。他二人带领柳明玉、李桂香和我来到黑河江边接关系，可没有接上，一连十几天都没有接上。老兰说：“可能是出了什么事。”又看见江边有

好多摩托车来回走。后来知道六月二十二号苏德发生了战争。局势紧张，可我们在深山老林里根本不知道。怎么办呢？老兰说："江边有灯塔柱，我们把它拉倒就能过江。"老兰也不知从哪弄来一把小刀锯，我们轮班拉，费了好大劲，第三天的半夜，那灯塔柱哗啦一下倒在水里，声音可大了，我们什么都不管，抱住灯塔就顺水而下，我这时才看清，塔柱外表涂的沥青，渗到木头里很深，所以那么难锯。我们被冲到一个小沙滩上，太阳已经很高了，我们都躺在沙滩上，一会就都睡了。也不知什么时候，被老兰推醒，睁眼一看把我吓了一跳，周围站着好些大鼻子、黄眼睛的人。他们让我们把手都举起来投降，我们不懂，都看着老兰他怎样做，我们就跟着做。我们的背兜和枪都被收去了，用一辆汽车把我们拉走了。在一座三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前停下，让我们三个女的下车进了屋，窗户是用铁栏做的，地上是草，好象是监狱，其实是个养鸡房，脏倒不脏就是有鸡粪味，我们也没管，躺在草上又睡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人叫醒我们吃饭，吃的是面包，这面包可黑了，不过还是吃光了。我要上厕所一推门给锁上了，我看见了站岗的跟他说上厕所，他不动，柳明玉过去和他作动作，意思蹲下上厕所，这才领我去。我到那一看，这么干净的小屋哪有厕所，我又出来了，表示没有厕所，他骂我，我也不懂，他领我进去把盖子打开又坐上去，我这才明白这就是厕所。第二天吃完饭让我们去理发，我们的头发都很短不用理的，那也不行，都给我们剃成小平头，和秃子差不多，剪了头又让我们去洗澡，把衣服都脱在外面，等我们出来时，我们的东西都烧了，他们给我们穿上了苏联战士的服装。

第三天来了一个翻译，说我们过江时锯断灯塔柱是违犯

了国际法，所以要对我们审查，我们说："我们不懂这些，领我们来的人说了算。"第五天，用一辆汽车送我们走，我们想："随便吧！上哪都跟着。"下了汽车坐火车，他们不许我们说话。在火车上都有苏联人带我们去吃饭，一句话也不让我们说，我们带个瓜皮小帽子，大皮靴子，靴大脚小，走起路来直晃，真难受。到了一个地方下了火车，有一个小车来接我们，送我们来到一个大院，这大院很漂亮，进屋后就看见了冯仲云首长和另外一名首长，经介绍原来是总指挥周保中同志。在这里见到了自己的同志就如同见到了亲人一样，眼泪就止不住了，二位首长安慰我们一番，我们又汇报了一下情况，首长说在这玩两天再走。这样我们在翻译的带领下去市场看了看，又看了看周围的环境，两天后用汽车将我们送到了北野营驻地。

到那以后正赶上跳降落伞科目，我们三人也参加了。由于我体轻在空中落不下来，所以称体重时我带上三十斤的沙袋子。我想我是来学习的，我不能落后。第一次没跳好，怎么下来的不知道，第二次就好了，以后一次比一次好，但总是绑着沙袋子。我们刚到北野营时，光着头（剃的）穿花布拉基，高跟鞋，要怎么难看就怎么难看，穿高跟鞋不会走路，没人时就光脚走，有人了就穿上鞋站在一边，吃饭吃不饱就上山采野菜吃。

我们开始上医务课了，由于没有文化学习很吃力，时间是很紧的，每天学习四小时，医务课，学习完了还有其他任务。在苏联的同志还有：李桂香、宋桂珍、宋玉廷、柳明玉、吴云清、徐云清、赵淑真、金玉坤。夏天还好过，冬天就难过了，气温零下四十多度，女同志又没有长裤子穿，只穿裙子和裤衩，中国女人冬天不穿棉裤是不行的，可在

那，纪律严明，不行也得行，到江边提水，浑身 上 下 都是冰。

一九四二年八月正式成立了八八步兵师，女同志都分到师部。女同志到师部后，有分到托儿所的，医院的，还有给军官做饭的，我分到了无线电营。我们每天都出操跑步，夏天游泳，冬天练滑雪（要穿上滑雪板），练劈刺，特别要练瞄准。冬天在雪地里一趴就是五十分钟。

我们在苏联的几年间，受到了严格的训练。虽然在那不用吃野菜、树皮，晚间睡觉是热呼呼的房子，也没有敌人，不用担心遇上鬼子，但是我们在那没有自由，不 许 互 相说话，不许上别人的宿舍，每一事都要请示汇报。所以尽管游击队生活艰苦，缺吃少穿，环境恶劣，有生死之忧，可我们十分想念生我养我的祖国，都盼望能早日回国。

一九四五年九月份盼望已久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我们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一场新的战斗在迎接我们。

驰 骋 哈 东

武 振 歧

1934年至1937年，我在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稽查处警卫班工作，先当战士，后为班长。（编者按：抗联三军原称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4年中，我们在李福林将军的领导下，驰骋在哈尔滨以东、松花江南北的尚志、延寿、方正、宾县、依兰、勃利等地，消灭了大量日伪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时间虽然过去多年，可那时的人和事，特别是那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只要回忆起来，依然历历在目。尤其是李福林同志的光辉形象，更令人永世难忘。

逼 上 梁 山

我甲寅年生（1914年），属虎的。1934年参加抗日队伍。

说实话，我所以参加抗日队伍，并不是事先有了较高的阶级觉悟，或鲜明的民族意识，那完全是日本鬼子逼的。中国有句话，叫逼上梁山。

我家住方正城南李振东屯，即现在的德善乡富裕村。全家4口人，父母领着我们兄弟俩儿过日子。父亲叫武文明，时年54岁，母亲娘家姓崔，时年50岁，我18岁，弟弟15岁。

父亲是风水先生，看坟茔、看宅地，很有两下子。虽然是胡弄人，可人们都相信。他有个朋友陈贵升，民族意识很强。宫姚旅一过来，他就参加了抗日活动，后来参加了抗联，在三军司令部后勤部工作（1938年病死于延寿县宝兴柞木台子），他时常对父亲说："亡国之人，如丧家之犬。堂堂五尺男儿，怎么能苟活呢？"父亲在陈贵升的影响下，参加了抗日活动。他先给宫姚旅搜集情报，后又为抗联筹集粮草。我们屯有个坏小子叫张林，向日本人告了父亲黑状，说父亲"通匪"。幸亏在伪警察署一个亲戚，把秘密泄露给父亲，父亲便携带我们娘儿几个，连夜逃到了宾县。搬走后，据说警察来抓父亲两次。

我们到宾县，住在朝阳河奶奶的娘家。奶奶的娘家姓刁，好大一户人家。这家人很善良，对我们很好。我家虽然出了方正，可父亲的抗日活动并没有停止。我们在朝阳河一直住了两年。一天，父亲说："咱们还是回老家去吧。"并说警务科那边已经没事了。我和娘心里都明白，一定是奉上级的命令。于是我们于1933年冬，又回到了老屯。

一天，有个陌生人，给我家送来一封信，恰巧父亲不在家。送信人千叮万嘱，叫母亲必须交给父亲。母亲问捎信人姓名，那人说："这个你就别问了。反正是性命攸关的大事！"送信人走不久，父亲就回来了。拆开信一看，皱着眉头对我们说："看来家里呆不住了。"后来父亲告诉我，这封信还是那位在伪警务科亲属写的，内容是有个叛徒禁不住敌人拷打，供出父亲是交通员。日本指导官便命伪警务科捉拿父亲。

父亲从家走后，找到好友徐景阳。他向徐把自己参加抗日军的打算一说，便得到徐景阳的赞同，并把他珍藏的两支

枪给父亲，一支为连珠，另一支为套筒子。父亲携带这两支枪，过了黄泥河子，找到了陈贵升。由陈贵升引路，参加了抗日队伍，在后勤部工作。

父亲走后，我们母子三人相依为命，度日艰难，日夜盼望父亲打回来，把日本鬼子消灭光。

1934年春，我到柴福生家去借拉子。柴福生的父亲柴永奎问我："借拉子干啥？"借拉子捞地，谁不知道，可他问得奇怪。屯亲我叫他叔，叔侄可以开玩笑，所以我回答他说："玩呀！"他脸色很严肃，口气挺生硬，斜了我一眼说："还有心捞地呢，脑袋说不上什么时候搬家。"

我很惊异，想问他点什么，可他却把我拽进屋里，悄悄地告诉我："听张林说，鬼子要抓你。因为抓不到你爹，用你顶缸！"

听后，我很害怕。便去找伯父武文会商量咋办。伯父想了想说："只好走你父亲那条路了。"我把伯父的意思与母亲一说，母亲舍不得我，可又有什么办法呢？于是我告别了母亲、弟弟，过黄泥河去找父亲。

父亲的抗日军，在黄泥河南。我过了河南走了几天，挨屯子打听抗日军，可谁都说不知道。从他们的神气上看，是在撒谎，从他们的眼神中，我已经看出，对我投出了怀疑警惕的目光。第五天头上，我走到一个砖瓦窑。此窑在郭德屯的沟南沿。窑的主人姓刘名举，领着一个年青的媳妇，在这烧窑。我向刘举打听："你知道抗日军在哪儿吗？"刘举一问三不知。但他又问我："你打听抗日军干什么？"我说："找我父亲。"他又问我："你父亲叫什么名字？"我说："武文明！"

刘举媳妇说："军队里是有个老武头儿！"

我一听高兴得几乎跳起来，可刘举却冷冷地说："老武头他们上下江去了。你先在这儿住几天，他们就回来了。"

我不愿意在这儿呆，因为刘举夫妇与我的年令相差不几岁，住起来很不方便。刘举媳妇很机灵，见我不高兴，似乎看出了我的心事。温和地说："你要不愿意在这儿，我把你送到一个老头儿家吧。"

刘举媳妇领着我，从砖瓦窑出来往东走有二里地的光景，有个小村子。村子不大，能有个十几户人家。进屯，她把我领进一间小马架子。马架子很阴暗，有个老头儿背着身搓麻绳儿。老头儿听见有人进来，忙回过身问："来啦？"显然对刘举媳妇很熟。刘举媳妇指着我问他："大叔，你猜这人是谁？"

老头儿看了我一眼，笑眯眯地说："不用问，准是武振歧！"

刘举媳妇说："大叔，你的眼力可真好呀！"

原来这老头儿，就是父亲的好友陈贵升。他与刘举媳妇，都是地下交通员。

刘举媳妇问老头儿："你咋猜得那么准？"

陈贵升笑着说："他象从他爹脸上剥下来一样。"

不过刘举媳妇当时对父亲并不熟悉，只听人说后勤部有个老武头儿。后来，她与父亲熟悉了，而且有了交情，认父亲为干佬儿，成了我的干姐姐。干姐姐姓氏名谁我忘记了，后来她在三军被服厂工作。她做衣服心灵手巧，打枪百发百中。她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当时都十多岁了，由于干姐的熏陶，小小年纪都会打枪。1935年，西片山被服厂被伪满州军包围，同志们相继壮烈牺牲，最后剩下他们母子三人。敌人欺他妇女孤幼，令其投降，可干姐宁死不屈，与儿子壮

烈牺牲，女儿胳膊被敌人打断。这个女儿现在住在延寿县城内。

刘举媳妇把我交给陈贵升后就走了。陈贵升问我："你来干什么？"

我便把家里的情况对他讲了。他听后，长长地吐了口气说："家里呆不了啦，上队吧！"

上队，即参加抗日队伍。

不过几天，三军的大部队从江北回来了。黄泥河子南岸几乎住满了抗日军。父亲来看好友陈贵升，不想竟碰到了我。开始他挺生气，埋怨我不该抛下娘和弟弟跑到这里来。当我把警察署要抓我的事情与他说了之后，他气乎乎地说："小日本儿，狗汉奸欺人太甚了！。咱们老武家，与他们誓不两立！"

经父亲申请，首长批准，我成了一名抗日战士。与父亲一起编到后勤部。

父亲后升任抗联八军参谋，牺牲在崔老膘子山下。

到稽查处

稽查处是管全军军纪的，处长由李福林同志兼任。（注）稽查处内有个警卫班，均由二十岁上下的年青人组成。我年轻、胆大，手脚麻利，很受首长喜爱。李福林同志要调我到警卫班，因我离不开父亲，说什么也不去。

一次战斗中，一团六营二连连长牺牲了。营长金长顺特地向总后首长要我做二连的代理连长。父亲听说后，一再向金营长推辞，说一个没参加过战斗的毛孩子，怎么能带兵打仗。可金营长却说叫我试试。我嘴不说，心理可愿意，因为

可以上前线杀鬼子了，比在后勤部跑跑哒哒强，于是我便走马上任。

对于我这个年轻的代理连长，战士们是不重视的。但我想，既然叫我带兵，我就得拿出当官的架势。有次我布置下卡子，二排长提出不同意见。按道理应当接受二排长的意见，可我极不冷静，捞出手枪要毙陈排长，说他违抗命令。陈排长当时没有反抗，背后却到稽查处告了我的状。稽查处命令金营长把我送去，在那里见到了后来是我的处长李福林将军。

李福林同志，当年三十来岁，中溜个儿，长挂脸，连鬓胡子，左眼睛在战斗中被子弹打失明了。

他叫我坐下，我没敢坐，心想这回可是重头的了，他要调我我不来，这下犯到他手里了，只有挺着挨整。他踱着步，半天才开口。他虽然是朝鲜族同志，可汉语讲得很流利。他异常严肃地说："你的错误性质是相当严重的，知道吗？"

我反驳他："不服从命令就该枪毙！"

他说："这次下卡子没必要，陈排长的意见是正确的，你不但不听，还要杀他，这纯粹是军阀作风！你有什么权利杀我们的同志？"

当时，我根本不懂什么是军阀作风，但从李处长口气中，已经感到它不是一个好东西。但我野性没退，便与处长顶撞起来。处长的警卫员急眼了，下了我的枪。处长也火了，叫他把我送交执法处。

执法处就是改造营，凡是违纪的官兵，都要送到这里。当时执法处在象鼻岭沟里，处长叫李熙山，即许亨植同志。他也是朝鲜族同志，当年二十六七岁，长得很帅。

他问我："你犯了什么错误？"

我胡编说："他要调我到稽查处我不干，便变着法子整我。"

李熙山当时就指出："胡诌！李福林同志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

在执法处，经过李熙山同志的耐心教育，我明白了自己错误的性质。我决心回部队好好干，弥补我所犯的错误。我向李熙山同志提出回部队的要求，可李熙山说，李福林同志特意交待，多关我些日子，磨磨我的野性。我是个急性人，在这里度日如年。怎么和李熙山同志"蘑菇"，李熙山同志也不放我走。我急得成天哭，喉咙都肿了，说不出话来。李熙山没办法，只好给李福林同志写信。没过几天，李福林同志派人把我接回去。

李福林同志待我很和气。他叫炊事员给我端饭，亲手为我挟菜。我心里感到热乎乎地，他象哥哥似地说："好好玩几天！"

于是，我在稽查处和年青人一起唱歌、赛跑、练枪，很有意思，比在后勤部与那些老头子呆在一起强多了。在稽查处这3天，等于进了疗养院，嗓子消了，精神头也来了。我对李福林同志，打心眼里佩服。第三天晚上，找我谈话。他耐心地分析我错误的性质、危害和思想根源，然后提出把我留在稽查处。

我所以不同意到稽查处来，除了离不开父亲外，更主要的原因是我看到了一些战士躲着他们，有些怕。经过这几天的生活，发现我的看法都是错误的，这里的战士亲如兄弟，这里的首长赛过父母。我问处长："咱们打仗吗？"

处长说："当然打啦！"

我高高兴兴地到警卫班去。

警卫班一共12个人，年令与我差不多，任务是保卫稽查处的安全。稽查处的负责人除了李处长之外，还有个政委和秘书。政委姓吴，作战中一支手指被打掉，人称他吴秃手，秘书叫南东根，他们都是朝鲜族同志。

智 退 屠 旅

1934年初，稽查处在中央山一带活动。当时，我们住在徐士国屯邱百户长家。那天我们正吃午饭，侦察员回来报告，说江北屠旅有一百多人过江来打我们。江北，即松花江北，通河县境内。屠旅，满州伪军，因其旅长姓屠，故称屠旅。李福林同志立即进行了战斗部署。他向我们说："我们离大部队较远，打硬仗是要吃亏的。我们要与他们软磨硬泡。与敌人交手后，要且战且退，将他们引到深山老林，出奇兵，打他个措手不及。"大家按着李处长的部署，开始行动了。

天傍黑，屠旅打来了。我们稽查处 30 多人，与他们交

注：李福林，原名公道钐，又名崔东范，1907年 5 月21日生于朝鲜咸镜北道稳成郡，1918年到吉林省和龙县明岩村居住。1928年参加革命活动，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任中共满州省委巡视员、1932年任珠河县委组织部长、1933年任珠河反日游击队党支部书记、1934年 6 月任哈东支队党委书记、1935年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执法处长。1936年 8 月任抗联三军一师政治部主任，兼任哈东游击司令。1936年冬任依东办事处主任。1937年牺牲在通河县二道河子北山。时年三十岁。武振岐说的稽查处即执法处。

手后，且战且退。敌人见我们的力量单，有恃无恐，一个劲地追。李福林同志怕敌人发现有假，又挥军竭力抵抗，似乎真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缓手之力的样子。当我们退到胡家岗东李荒篱把子屯的时候，便不退了。在这里分兵两路，占据两边山坡。敌人发动一次又一次进攻，整整打了多半宿，天亮以后，他们一看打不下来，便撤了。

这次战斗，打死敌人3匹马、6个兵。我方无一伤亡，大家都说李处长用兵如神。

缴长龙岗自卫团

打败屠旅，到大山头整休。部队住在大沟沿牛尾巴岗，稽查处的干部分赴各部队工作去了，这里只剩下李处长和我们警卫班。长龙岗南头有个自卫团，20多人。自卫团长倚仗日寇势力横行霸道，无恶不作。群众纷纷来找处长告他们的状，要求我们惩治这个坏蛋。李处长对群众的请求自然满口答应。但我们大家心里犯嘀咕：他们20多人，我们12个，他们龟缩在高墙大院内，又有炮台，我们在外面，在明处，能打赢吗？李福林同志最懂战士心思，他向我们讲："咱们不能蛮干。"

"武振岐！"他叫着我的名字。

"到！"我回答着。

他掏出笔，在小本子上，刷刷写了一篇，然后扯下来递给我说："你马上送到延寿六团！"

"是！"我接过信，转身走了。

六团，即三军二师六团，在延寿县小崔合屯住。我到那把信交给六团长，团长便派一连人随我来。这样我们在东，

六团在西，把自卫团死死围住，自卫团一枪没递，乖乖地投了降。

伏击饭冢

1934年3月勃利县起了民变，为首的人叫谢文东。日本鬼子司令饭冢大佐（战士们叫他饭桶），扬言要血洗勃利。三军司令赵尚志为了接应土龙山农民武装队伍带兵来到了依兰县。我们稽查处也参加了这次行动。

饭冢手下有个翻译官，名叫王少华。王少华爱抽大烟，但因临行匆忙，没顾得上带大烟土。他随几个特务进依兰化妆侦察，碰上了我侦察连长陈喜春。他们俩是光腚娃娃。他问陈这些年都干啥来的？陈说做点小买卖。陈问他干啥呢？他也不隐瞒，说给日本人当翻译，并托陈给他买大烟土。陈连长当时满口答应，并约定明日此时来取大烟土。第二天，他们按约见了面，王少华并没有取到大烟土，却被几个化妆的战士押到司令部。

赵尚志将军对他进行了耐心教育，开导他为中国人办事。并警告他说："你看到那些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当汉奸的人的下场了吗？"王少华当即向赵尚志将军讲了饭冢血洗勃利的计划，以及日军武器装备情况。赵司令叫人给王少华兜了一兜大烟土，王少华一见眉开眼笑。他向赵司令献计："饭冢已从哈尔滨动身，估计后天夜里能到。我也是中国人，为了生活给鬼子干事。饭冢来时，我给你们送信。"

于是王少华带着大烟土走了。

王少华一走，大家议论纷纷，有人说象王少华这样的汉奸，说话不可靠，也有人说，他有奶便是娘，得了这么多大

烟土能为咱们办点事。赵司令嘴上不说，可心中有数。他命令把人马调到依兰附近的三大家。因为敌人要到土龙山，得走范家沟，而三大家正在范家沟的南侧。

第三天晚上，是司令与王少华相约的日子。那夜很静，战士们很紧张，都整装待发。等到半夜，王少华没有来，天亮了，还是没有来。第二天，太阳一竿子高的时候，王少华气喘吁吁，衣装不整地跑来。见赵司令的面一口连声地说："快快！"

经过询问，方知饭冢带来20辆汽车，每辆车都坐满了鬼子兵。王少华所以来晚，是为了取得准确情报。

赵司令立即命令开始准备伏击饭冢。我们稽查处的任务是设路障。即在路上拉上绳子，两头绑在树上，阻挡鬼子的汽车。

太阳出来老高，鬼子的汽车大大咧咧地闯进了范家沟。这时埋伏在沟两旁的战士枪声四起，没进沟的汽车掉头就跑，进沟的鬼子兵为我击毙，饭冢也没逃出中国人民对他的惩罚。

战斗结束了，王少华吓得还趴在壕沟里一动也不敢动。

专打日本鬼子

打完饭冢。我们稽查处又在火烧窝棚、洋犁片打了两仗，然后回到方正，在巴豁子岭徐明久大棚住下了。

在徐明久大棚住到旧历年，大部队从沟里下来了。他们在郭德屯、张九台屯整休过年。部队到这里的消息被县城里的日本守备队队长西山大尉知道，他率200多日伪军向我军扑来。

这次来的敌人，日军少伪军多。在伪军中，除了极少数认贼作父的顽固分子外，大多数为生活所迫，当兵是混饭吃。再则，我们善于做政治工作，和他们“交朋友”。在伪军单独进山的时候，碰上我们，我们给他们钱，他们给我们子弹，拣回一些子弹壳向鬼子交帐。我们对这类伪军是不打的。

那天早晨，天很冷。我们爬在岗上，见敌人坐着爬犁上来了。伪军在前，日军在后，到屯北，日伪军纷纷从爬犁上跳下来，端枪猫腰向屯子捕来。西山大尉挥刀指挥，伪军在前，勾头缩脑，一个一个从我们的枪口上过去了，我们没有开枪，等日军进入射程内时，只听一师师长关化新大喊一声：“打！”我们的子弹象开闸的水向日军扫去。西山大尉一看不好，他先坐着爬犁向方正跑去。

这次战斗，打死日军28人，我军连长孟昭山同志和陈排长壮烈牺牲。

打 邓 团

1935年农历8月14日，三军、八军和九军集结在方正县大小瓜兰川一带，既现在的新安乡，准备打宾县。

那日午夜，我军从歪水砬子、盘龙屯向宾县县城迂回包围。我军前头部队先把敌人通往各地的电话线掐断，断了城内与外面联系。宾县城内日伪军人数不多，大约有几百人。当他们发现我军的时候，立即向哈尔滨挂电话，但挂不出，便改拍电报，日军司令部接电报后，派邓团前来增援。

25日凌晨，我军与邓团接触。邓团是坐汽车来的，火力挺猛。我军且战且退，一直退到天架山。到天架山，首先占

领青石砬子。青石砬子居高临下，两架机枪封锁，敌人冲上来又退下去，退下去，又冲上来，整整与邓团打了一天。太阳偏西的时候，敌军一个连向我发动全面进攻。我军为了诱敌深入，放弃了青石砬子。敌军以为我招架不住，便猛力相攻。当他们占领青石砬子的时候，机枪从四面骤起，敌人一个整连全死在青石砬子上。

邓团不甘心他们的失败，拚力反击。不久又有一个连被歼灭。邓团见大势已去，乘汽车逃跑。

我军从王大烟袋船口过江，太阳一竿子的时候，抵达太平山。抵太平山后，方正县守备队前来阻截。三军少年连与其交手。少年连作战勇敢，歼灭不少日军。日军败退曹红玉家。同时，通河、延寿、林口的日军也向我包抄。赵尚志将军当机立断，不与敌人硬打，率大部队向沟里转移。

笔架山赴宴

1936年初，我当了警卫班长。八月节后我们到依兰，住在邱百户长家，当地有两个绺子队，一个叫金山，一个叫小金山。他们是哥俩儿，金山因腿瘸又叫瘸金山。

瘸金山骑马，双手使匣子，400余人，在依兰一带是个大绺子。据说李延禄将军曾与瘸金山联系，动员他抗日，他表面达应，但还做打家劫舍的勾当。他欺软怕硬，见大部队来了就躲，见我们人少，便想欺负我们。

一天，瘸金山打发两个土匪，持他的亲笔信，请李福林同志赴宴。李福林同志与吴政委一商量决定去赴这次鸿门宴。明知去赴宴凶多吉少，但如果不去瘸金山会到处宣扬

抗联都是贪生怕死之辈。临行前吴政委嘱咐我说："要大胆、心细、见机行事。必须保证李处长的绝对安全。"我向吴政委保证："有我就有李处长！"

李处长随身带支枪牌橹子，我带了两件武器：一支大净面匣子，一支枪牌橹子。

我们骑着马，来到了瘸金山的底窑笔架山。早有小匪报上山，不一会，瘸金山带着他的四梁八柱下山来迎接。这些头目面带杀气，心怀鬼胎。李处长在瘸金山等人的陪同下，来到山上。山上有正房五间，中间开门。瘸金山把我们让进东头那两间。

瘸金山置酒相待，满脸堆笑。李处长坐正位，瘸金山等左右相陪。首先是瘸金山对李处长寒暄敬酒，然后是四梁八柱轮番上阵。我一看明白了，这些家伙使用车轮战，要把处长灌醉。处长的酒量很大，我知道，喝个斤八的没问题，可这一个一个碰谁受得了？然而，处长却谈笑风声，毫不在意，一边喝酒，一边宣讲反满抗日的大道理。劝他们改邪归正，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我看时间长了不行，处长一醉说不定会出什么事。我心里时刻记着吴政委的叮嘱：见机行事。我霍地从腰里拽出两支枪，比着瘸金山厉声说："你们这是黄鼠狼给小鸡拜年——没怀好意！"瘸金山冷笑一声说："怎么，以酒待人还有恶意么？"李处长微微一笑对瘸金山说："不要和他一般见识。这小子有股牛性。"然后掉头冲我说："王才，还不把枪收起来！"

王才是我在稽查处时用的名字。

听李处长的话，我把枪又插入腰间，但两眼虎视瘸金山。李处长慢慢地站起身，向瘸金山及他的四梁八柱拱了一圈手说："兄弟还有个会要参加，不能在此久陪，后

会有期！”说着就要走。可是众匪首纠缠不放，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李处长嘿嘿一笑说：“咱们都是自家兄弟，不瞒众位，要不是赵司令通知，我和兄弟们一醉方休。”

众匪一听赵司令的英名，个个目瞪口呆，立时老老实实的坐下了。李处长真不简单，竟能把他们镇住。

瘸金山问：“司令在哪？”

李处长故作神密，趴在瘸金山的耳朵上说：“昨夜下榻邱百户长家！”

这话是专门对瘸金山说的，可旁边的人都听得一清二楚。只见瘸金山伸出舌头，半天才缩回去。瘸金山也把两拳一抱说：“既然处长有重要事情，兄弟不便相留！”

众匪见当家的发话，也都满脸堆笑异口同音地说：“兄弟们不便相留。”

临行前，处长高声朗气地对他们说：“贵队活动区属红地盘。三军司令部早有规定，在红地盘内的山林队、绺子队不准绑票、抢劫。违者严惩不贷！”

讲这番话的时候，处长态度很严肃，众匪连说是是。于是众匪将我们送下山。

瘸金山约处长上山干啥？后来才知道，是想把稽查处撵出中央山，他们好独霸一方。

擒 奉 山

农历九月，我们在黄鱼圈沟，住在老张头儿家。黄鱼圈沟在方正县新安乡的小瓜兰川，因产黄鱼而得名。我们给老张头

儿扫院子担水，老张头儿很受感动，与我们的关系很密切。在闲谈中，我们向他调查，他见到的抗日军有没有违纪现象？如打骂群众，污辱妇女等等，他说没有，但他对穿黑衣服的却深恶痛绝。当时，我们穿黄衣服，白布用黄柏树皮煮了，土匪穿黑衣服。老张头说，穿黑衣服的人打粳米骂白面，比警察狗子还凶。我们问他在当地有那个绺子。他告诉我们说，这绺子底窑在马架山一带，100多人，大当家的叫"奉山"。我知道奉山是"四海"的弟弟，当年18岁，枪打的很准。我们便把老张头儿说的情况向处长做了汇报。处长与吴政委商量之后，决定去缴奉山。

在去笔架山的路上，我们高举红旗，佩带红臂章，唱着抗日歌曲，浩浩荡荡。奉山的岗哨在山坡上，老远就看见我们了，忙向奉山报告。奉山在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面前作威作福，可一见到我们就熊了。他立即率队下山来迎接。

奉山穿一身日本黄军呢制服，腰插一支长苗匣子，脚上穿双日军大皮靴。在奉山背后跟着小崽子也插把，长苗匣子。小崽子，即土匪头子的警卫员。见了李处长，奉山把腕当胸，笑着说："不知处长驾到，请恕罪！恕罪！"

李处长叫吕凤山率队在山下待命，他带着我，与"奉山"一同上山。

我们到山上，进了屋，屋中间是铺土炕，土炕上面铺条日本军用毯子。"奉山"先让李处长坐下，然后他把鸭子腿一拧，坐在处长对面。我看见当他坐下来的时候，把长苗匣子骑在裤裆里，手握大"狗"。我明白了，这小子没安好心啊。我把橹子攥在手中，只要"奉山"动一动，就先把他打死。

李处长向他讲了党的政策，并警告他要爱护群众，不得

胡来。处长说："你们在红地盘内抢东西，真是贼胆包天！"

对处长的警告"奉山"满不在乎，他说："我们是胡子，与你们不一样，大道朝天，各走半边！"

李处长一听就火了，猛地跳起来，吼道："胡说八道！侵扰百姓，就是天王老子我们也要管！"

"奉山"也变了脸，从裆下把匣枪拽出来，没等"奉山"出手，我的枪就响了。但这枪没打"奉山"而是打在房笆上，震得土哗哗直掉。就在"奉山"一愣神的功夫，我一个箭步蹿过去，下了他的枪。站在他后面的小崽子想掏枪反抗，我的另一支枪口对着他的胸膛说："你敢动一动，先打发你回老家！"小崽子怕死，乖乖地交了枪。这时李处长从腰间掏出枪，向窗外"叭叭叭"打了三枪，这是他与吕凤山约好的信号。

枪响之后，吕凤山率我们战士摇旗呐喊，冲上山来。在我枪口下的"奉山"，传出命令："谁也不准反抗！"

土匪们把枪架在外面，顺山坡站了一大溜。处长叫人把"奉山"捆上，又叫他交出花名册。处长心细如发，把现有人数与花名册一对照，发现少30人，30支枪。处长问奉山："这30人哪去了？""奉山"说："到外面下卡子没回来。"于是吕凤山同志派几个战士，押着小崽子去找那30个人。不一会，30人30支枪都收回来了。

李福林同志给众土匪开了个会，宣布解散这个绺子。回家的发路费，参加抗日的，我们留下。当时有部分人参加了我们的队伍。

我们把"奉山"带到黄鱼圈沟，吴政委劝"奉山"参加抗日。"奉山"年纪虽轻，可思想既顽固又相当反动。他

说："我当土匪图的是快活。抗联的苦我受不了，你们不放我，莫不如把我杀了。"尽管吴政委把嘴唇都快磨破了，"奉山"还是死心塌地当胡子。吴政委与处长根据群众要求，商量了好长时间，终于把"奉山"处决，省得他危害百姓。

入 团

1935年秋，三军二师师长关化新来见李福林同志。李福林同志是稽查处长，又是三军政治部主任，除了管全军军纪，还管全军给养。关师长从下江来，是向军部请求过冬服装的。

我当时并不认识关师长，他带个警卫员，口口声声要见李处长，按规定他们必须把武器交出，方能见首长。我一说他们便把武器交了。

李处长与关师长是老战友，自然熟悉，不过见面很冷淡。李处长问他："老关，你从哪儿来？"关师长说："从西四来！"李处长回答说："我也是从西四来。"然后他们紧紧地握着手。

原来这时有的人经不起艰苦环境的考验，而变节。赵司令为领导同志接头制定了这套暗语。回答上了，说明与组织联系没断。

"西四"，这两个字，一直在我脑中折腾，不知是啥意思。后来我问李处长，他说是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

这时我才知道，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我悄悄问处长："我可以加入共产党吗？"

他笑了，说："当然可以，不过得创造条件"。

我心中纳闷，入党还要什么条件呢？我把命都豁出去了，还入不了党？

1936年夏，李福林同志找我说："你有入党的要求很好，你现在的条件还不具备，你先参加"西弯"吧！"

又一个新名词，我虽然不懂，但我相信处长是对我负责。李处长说完给我写了封信，叫我去找三军司令部少年连指导员蔡金山。

见到蔡金山，他看了信之后，让3天以后来这里找他。3天后，我去找他。蔡指导员领我们5个青年战士，拿一支马盖子枪，一支匣枪，领我们走进树林子。他把匣枪顶上顶门子儿，放在一块大石头上，叫我跪在枪口前，宣誓："要当叛徒，枪开后堵。"枪口对着我的心口，我没有说那两句话，只是说："我当抗联，就把我的命交给抗联了。生是抗联人，死是抗联鬼！"

这两句话很平常，可都把蔡指导员感动得直掉眼泪。他抓住我的手说："从此你就是组织的人了。"

原来我加入了青年团。

进 城 报 仇

1935年初冬，家里传来不幸的消息：母亲被日本鬼子逼死，弟弟被鬼子活活打死了。

方正县警备队特务韩某，用手枪威胁我母亲："赶快叫你男人和儿子回来，不然要你们娘俩儿命！"我母亲回答他："我早就向你们报告了，我们母子与他们父子断绝一切关系，你还找我干啥？"韩某暴跳如雷："那是假的，连3岁孩子都哄不了。"说完走了，以后三天两头来逼母亲。母

亲毕竟是女人，被姓韩这个家伙吓病了，没几天就离开了人世。姓韩这个家伙，解放后想收买我，他说他有个姑娘想招我为婿。我与他不共戴天，便到政府检举了他，监毙于方正。

母亲死后，敌人派警察马德山把弟弟抓去。马德山是南满人，解放当时潜逃了。警察署非叫我弟弟说出我与父亲部队的所在地不可。三天功夫，弟弟被折腾得奄奄一息了。敌人没问出口供，便把他送回屯，不久就死了。

这些消息地下党同志向三军领导同志报告的，总后领导同志转告父亲，父亲又告诉了我。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痛不欲生。找李处长，请求出兵为母亲弟弟报仇。李处长对母亲弟弟的不幸深表同情，可他却不同意出兵方正为我报仇雪恨。他说："日伪汉奸欠中国人的债太多了，我们只能一笔一笔的记着，但不能有一个仇报一个仇，不过，总有一天会算清的！"

我要求李处长出兵方正拿那个姓韩的特务。李处长说："现在不行，等以后会有机会的。"

我想不通，仇报不了，成天哭，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不几天，就病了。李处长派宣传干部小韩，把我送到沟里养病。

小韩名叫韩淑珍，北刁翎火烧窝棚人。后任一团排长，在宾县歪水砬子战斗中牺牲在蟠龙屯，年仅二十四岁。

我和小韩住在一个山民家。小韩劝我说："要报仇得好好养病，身体不好怎么报仇？"我一想可也对，心路放宽了些，饭也能吃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由于身体的好转，报仇的心一天比一天切。总梦见母亲、弟弟拉着我，哭叫着："你给我们报仇啊！"我想等部队打进方正，说不定姓韩、姓马的坏蛋，早死了呢，不如现在进城，亲手杀了他们。我知道方正城内

驻满鬼子兵，还有伪警察大队，我要大摇大摆进去，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最后一想只能化妆进城。要化妆，必须带短家伙，可我使的是大枪，带这个家伙，离二里远就能被人发现，还能进城？韩姑娘带支橹子，要是给我该多好啊？管她要，她不给，于是我想出一条妙计。我诓韩姑娘说："三八我使够了，能不能把橹子换给我使几天？"她信以为真，便把橹子给我了。她是李处长派来，明为照顾我，实为监视我，我心里明镜似的。但这位千巧百灵的姑娘，竟叫我骗了。

第三天夜里，我把枪插在靰鞡腰子里，偷偷地离开了韩姑娘。

顺山路，我一口气跑到了李振东屯。到屯子时，天都快亮了，我直扑李振东家。他家五间房，板杖子院，两扇木门，在里面上闩。我跑得又累又乏，用拳头砸门。李振东闻声前来开门。到门前悄声问："谁呀？"当我说"武振岐"的时候，他大吃一惊。忙问："你怎么回来了？"

李振东是地下交通员，我当他面自然不能说是给母亲报仇来了，便胡诌了一个理由："队伍在山上被困了，三天三夜没吃东西。首长派我到城里买吃的。"

李振东信以为真，开门把我让到屋里，并给我弄了点吃的。

李振东说："城难进呀！自卫团把守城门难进难出啊！"

听他这么一说我可犯愁了，眼泪简直要掉下来。李振东见我急成这个样子，想了想说："咱屯有个宋老疙瘩，他儿子才从警官学校回来，现在在城里警察署当差。他媳妇今天进城去找他，不如你借机混进去。"

和一个女人，我怎么能混进城，不由两道眉拧起了大疙瘩。李振东一笑说："山人自有妙计！"

早饭后，李振东领进一个小媳妇。20多岁，长得挺标致，穿戴整齐，怀里抱个孩子，手里拎个包儿。

李振东说："你给她抱孩子，就说是她的表弟。"

唉呀！李振东不愧为李振东，竟能想出这个鬼主意。我望着他，敬佩地笑了。

李振东又把我打扮一番，上身穿件青夹袄，腰里扎条青铜色的布带子。

我给这媳妇抱孩子，这媳妇在前面拎包走。到城门，守门的团丁见是她，很客气，可对我却要良民证。就瞅这媳妇瞪了团丁一眼说："连我都不相信了？他是我的表弟。"团丁一听是她的亲戚，忙点头哈腰说："哪里 哪 里！"就这样，我混进了城。走到十字街，我把孩子递给她说："谢谢你！我们该分手了。"她说："有什么谢的，咱们都是中国人嘛！"

在方正大街上，走一处打听一处，但谁也不知到姓韩和姓马的狗特务住处。我有些泄气了，但还是不死心。这时候我饿了，肚子咕咕直叫。恰巧路过蔡果匠铺，我便推门进屋。顺手掏出五元钱，扔在柜台上说："买光头！"

掌柜的是个秃顶老头儿。接过钱看看，又抬头看看我，样子很惊讶。坏事就坏在这五元钱上了。这五元钱，按当时说，能买一面袋子光头，可我错误地以为只能吃饱肚子呢。这个秃顶老头儿见我买这么多的光头，便起了疑心。他皮笑肉不笑地对我说："你没带家什吧？"我愣了，随后他微微一笑说："我给你找个面袋子。"说着转身进后屋去了。

不一会儿，他从后屋出来，拾个面袋子，走到光头箱子

跟前，一把一把地往里装光头。就在此时，一个人闯进果匠铺。此人姓罗，是山林警察队的班长。原来秃顶老头回屋给山林警察大队挂了电话，警察队派罗班长来抓我。

他气势凶凶地把枪口顶在我的胸口，大声吆喝我："这光头是你买的吗？"

我毫不含糊地回答他："是！"

"买这么多干什么？"他立起眼睛问我。

我灵机一动说："我家死了人，求人打墓子，我是给他们买的。"

他两眼上下翻看，大喊："不对，一定是给马胡子买的。"

我坚决否认："不是！和我一块来的人在外面买菜呢，不信你问问他们。"

他一歪脸向外看，我乘机猫腰从靰鞡腰子里拽出手枪，没有一点犹豫一枪将他打倒在地。果匠铺那个秃顶老头早已溜走，街上已经乱成一团了。

"抗联进城了！""抗联进城了！"

人们的喊声不断。

我急忙从果匠铺逃出来，一直往南跑，跑到南门，南门已关上了。这可怎么办？我想四门恐怕都关上了。我记得在西南有个墙豁子，说不定从那里可以逃出去。可在远处一看，那里早站满了伪军。方正城里布下了天罗地网，此刻，我后悔不该冒险进城。

这时城里一片混乱。鬼子兵，治安队，在大街上横冲直撞，商店闭店，老百姓都躲进屋中。一队治安队从北跑来，和我正对面。我想这回算完了。可人不该死，在我旁边竟出现一个大菜园子。这菜园子，是用杖条夹的，那里有几排黄

瓜架，我急忙掰断几根杖条，钻进菜园子，在枯了叶子的黄瓜架下猫着。等治安队过去，我才松了一口气。

那是初冬，只下几场小雪。这园子主人姓王，是赶马车的，外号叫王大黑马。我在黄瓜架下蹲着，王大黑马媳妇来抱木柴。她见黄瓜架下有个人，以为是贼，刚张嘴要喊，我忙说："大嫂，别喊！我不是坏人！"她从头到脚打量我一番后，问："你是干啥的？"我想编瞎话，但又说不出，只好说："鬼子在抓我！"我以为她准害怕，但她却叫我快进屋。刚进屋王大黑马也回来了。他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武振歧！"他又问："武文明是你什么人？"我回答说："父亲！"他问完拍我肩头一下说："打死罗班长可是你？"我默默地点点头。他再不问什么了，叫他媳妇给我弄吃的。

他叫我住下，明天想法送我出城。

这一夜，我几乎没合眼。第二天吃完早饭，他叫媳妇给我定一副墨镜，一顶毡帽，一件长袍，我穿戴上之后，成了地地道道的特务。

我坐在王大黑马的马车上，他挥鞭直奔南门。守门团丁认识他，老远就搭讪问："王大黑马，一早干什么去？"

王大黑马说："我也不愿意动弹啊！可这位老总非叫我出车不可，说是守备队长的命令！"

团丁见我这身打扮也不敢说什么，只是说："署长有令，谁也不许出城。"

我在车上高声叫道："我是特务班的，我奉太君之命，去捕逃犯。如果误事，你有几个脑袋？"

这几句话我不会说，是王大黑马教的。王大黑马是地下工作者，但我当时不知道。团丁不禁吓唬，忙点头哈腰地把

门开开了。

王大黑马用力打马，一溜烟出了方正城。车到李振东屯，我说："大叔你再送我一程吧！"

王大黑马笑了，他说："你不是说你是李振东屯的吗？"

我无言以对，他又扬鞭打马，一直送我到二和尚庙。

他很严肃地对我说："年轻人别意气用事。办什么事都要三思而行！"

真是金石良言，我不知道怎么感激才好。忙跪下给他磕头。他抹车打马走了，连瞅我也没瞅。

回到沟里，韩淑珍气不打一处来。当天晚间，我们到稽查处。处长和政委可火了，特别李处长，他象头发疯的狮子。连吵带嚷，口口声声要毙我。吴政委说："你当不了战士，你走吧！"我说："你们打我骂我都行！我娘死了，弟弟亡了，叫我上哪去？"

韩淑珍也流了泪，她说："都怨我，处长交给我的任务没完成好！"

原来处长叫她做我思想工作。

处长嘴说叫我走，我知道他舍不得我，这些话都是气话。他又瞪了我一眼说："禁闭三天！"

缴天邦

1936年初，农历腊月二十八，我们正在李振东屯。王芳屯、马殿井子屯的群众来报告，他们为抗联筹集的春节物资，用200多张爬犁运送，当路过巴豁子岭松木杖的时候，被土匪天邦队截去了。

处长听了很生气，当即给双凤邱百户长写信，让他派30张爬犁，到李振东屯待命。邱接到信后，立即动员30张爬犁，星夜赶到李振东屯。于是，我们在李处长的带领下，从南六方过江，直奔松木杖，整整跑了一宿。

我们到天邦队的底窑，土匪们正在吃饭。站岗的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李处长叫他转告"天邦"，就说抗联要见他。岗哨去了不久，"天邦"从屋里出来了。"天邦"，大个儿，50多岁，花花脸。他与李处长早就认识，寒暄了几句之后，把我们接进屋里。李处长没等"天邦"开口，便单刀直入地说："无事不登三宝殿，到你这里来，是向你讨给养的。""天邦"说："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讨给养，与我'天邦'何干？"处长嘿嘿一笑说："在巴豁子岭下，你们截了我200多张爬犁，大当家的不会不知道吧？""天邦"说："根本没有这样事！"

我一看这小子要耍赖，不如先下手为强，便灵机一动，冲"天邦"问："大当家的，你使的什么枪？"

"天邦"不知是计，答道："五个子儿中华牌！"

我说："这种枪我从来没见过，大当家的是不是叫我开开眼？"

"天邦"以为他们人多势众，又在他的匪窝，便把枪递给我。我左手接枪，右手用我的橹子，给"天邦"支上。我大声喊："你敢动，我就搂火！"

这时"天邦"不那么神气了，用眼睛斜斜他的小崽子，可小崽子也不敢动，怕我真搂火。我冲小崽子命令道："你把"天邦"的裤腰带解下来，把他绑上！"小崽子迟疑了一下之后，便把"天邦"绑上。这时李处长叫小崽子传"天邦"命令让土匪们进院训话。众匪进院后还不知是咋回事，

就被我军缴械。缴了一百五十多支枪，遣散了这支绺子队。在山上我们找到了被抢的套户和物资。

我们押着“天邦”，到大罗勒密。“天邦”的朋友，大罗勒密山林警察大队韩队长，前来堵截“天邦”和春节物资。处长不让我们正面与他们接触，尽量躲着走。他们停，我们慢走，他们追，我们就快跑。韩队长死盯不放。在转山子北，我们击毙了山林警察5人。这时，军心大乱，不敢再撵我们了。我们到徐明久大棚后，把春节物资卸下，打发套户回家过年去了。

对“天邦”，处长想处决他，可是“天邦”说，他早已投奔了四军。处长随即给李延禄将军写了信，询问“天邦”情况。李军长回信证实了“天邦”的话是真的，并请稽查处把“天邦”送到四军。李处长遵照李延禄同志的意见，将“天邦”送到了四军。

虎头山歼敌

1936年秋。我们稽查处来到宾县虎头山下，李处长给当地一个姓王的粮户送去一张名片，提出要在他家住宿。粮户张灯结彩欢迎我们进宅。

这家是个大院儿，土院墙，4个炮台。我们在门口的4个炮台都上了岗。处长告诉大家好好休息，明天好行军。

睡到半夜，驻宾县的日军摸上来了。由于连夜行军，大家人困马乏，我们的岗哨也睡着了。日军在大门外大喊大叫，把西南炮台的岗哨吵醒了，急忙向李处长报告，处长喊醒了大家，他说：“从后墙跳过去，绕到敌人背后，听我的命令！”然后对这个粮户说：“你到门前问问是谁，他要说

是抗日军，你怎么也别开门，他们要说是皇军，你 把 门 开开，开开之后，你赶紧躲开。”

粮户答应走了，我们翻过后墙，爬在黑暗处。这时，日本兵大喊大叫：“开门，开门，快快地开门！”。

粮户高声问：“谁呀？”

日本兵喊：“抗日军！”

粮户说：“抗日军，不能开门！”

日本兵又说：“是皇军！”

粮户把门打开，日本兵一涌而入，足有百十来人。这时处长高喊：“打！”

埋伏在四周暗处的战士们，打了一顿排枪。日本兵，除了几个越墙逃去的外，其余都报销了。

这次战斗，缴获重机枪两架、轻机8架、60多支 步 枪。

捏“饭 团 子”

虎头山战斗后，我们又收拾了几个“饭团子”。

“饭团子”是我们战士对自卫团的戏称。这些家伙倚仗日本人的势力，为非作歹，渔肉乡里，可是一旦见了抗联，就软了，所以我们都叫它饭团子。当部队到宾县“九千五”休息时，有很多群众向我们告本地自卫团的状，要求我们为民除害。

这个自卫团消息很灵通，知道我们要打它，便 严 加 防范。白天，四门紧闭，晚上，墙上油灯高挑，照得 如 同 白昼。

战士们作战热情很高，纷纷要求打头阵。李处 长 不 说打，也不说不打，叫大家好好休息。第三天晚上，处长突然

命令我们："撤！"

我当时想不通，真想问问这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可处长的脾气我们是知道的，只好忍着。

队伍悄悄离开"九千五"，经过多半宿的急行军，大约在天亮的时候，来到离"九千五"六十多里路的孙家菜营。

"九千五"的自卫团整整折腾了三天三宿，弄得人困马乏。第四天早晨发现我们撤了，便向当地群众打听我们的去向。这次撤退是相当机密的，连一点蛛丝马迹也没留，群众自然不知道。同时，以为我们撤走了就不能回来了。可我们都出人意料的由孙家菜营又返回了"九千五"。

那是初冬，雪尚小，地里的豆茬还露着哩。那天夜里，处长命令我们把棉袄反穿着，因为棉袄里子是白的，雪虽小，棉袄与雪也不好分辨。

我们经小半宿的行军，又回到了"九千五"，到达时正是清晨。自卫团一夜无事，睡得正香。我们翻墙而过，三声枪响，自卫团乖乖地举起了双手。

处长对自卫团长说："我们是仁义之师。来了，应当开门迎接，干么这么戒备森严！"处长要毙他，他吓得连连求饶。李处长说："饶你这次，下次再碰上我，可不客气了。"

我们缴了28支枪，把团长和团丁都放了。

到延寿，与一团会合。延寿六团自卫团听说抗联过来，急忙给延寿县城打电话派兵增援。来增援的是伪军，50多人。正好与我们走个对面。他们误认为我们也是伪军，硬问我们口令，我们不对，刚想开枪，刘海涛团长打出一梭子子弹，敌人溃不成军，有26人为我活捉。

从加信子南天台山拉山回来，在长龙岗住一宿。长龙岗

南牛尾巴岗大沟沿有个自卫团，约有30多人，群众恨之入骨。我们住在老李家。老李家媳妇，对我们说："你们快逃吧！南头营盘变成大刀会了。这些人吃上符念上咒，枪子打不进去呀！"。

李处长与吴政委商量，要除掉这个自卫团。

自卫团住三间草房、土墙院套。我们是从房后摸进去的。扇形包抄，留南边活口。

自卫团在南墙上设的岗哨被枪打死，院里乱了套。这些吃符念咒号称刀枪不入的自卫团鬼哭狼嚎地闹了起来。他们在墙内打，我们在墙外打，整整打了两个多钟头。最后，他在支持不住了，纷纷向南溃逃。稽查处的战士，越战越勇，一举将其全歼。

奇袭山林警察队

1937年5月，我们住在中央山郭王家，郭王家离大罗勒密不远。

大罗勒密是林区，日本鬼子烧柴都是从这里用小火车运。每次运木头，都由山林警察押车。

赵尚志司令给我们稽查处一个命令：缴山林警察武器、补充我军不足。李处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警卫班。

为了打有把握仗，李处长召集了诸葛亮会。会上，大家七言八语，出主意、想办法。有人说打伏击，又有人说扒铁道，大家争论来争论去，最后话题集中到扒铁道上来。有人说，小火车不比大火车，它开得慢，如果发现铁道被扒了，人可以跳下车。又有人说，咱们扒铁道与伏击相结合，等他们发现铁路出了事，咱们就一哄而上。大家都说这个主意

好。要用这个招儿，就要偷偷将铁轨的螺丝拧下来。于是处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拧螺丝得用扳子。但是上哪儿弄扳子呢？正在我发愁的时候，碰上了田喜林。

田喜林，30多岁，依兰县人，在大罗勒密小火车站道班当工人。家有老母，住大罗勒密街里。他不知道我在队伍上，问我："你出来干啥？"我说："生活没出路，想找点活干。"他说："我这里倒有活干，比如说验道。可是工钱太少，一天只给一元钱。吃的更糟，高粱米拌黄豆。工头还挺蝎虎，看谁不顺眼就抡巴掌！"

我一心想进工棚弄扳子，便说："只要能挣钱，受什么样的苦，我都不再乎。

他看我挺实在的，便提议拜兄弟，我自然同意了。我们插草为香，他为兄，我为弟。

田喜林把我领进工棚，向工头介绍："这是我的表弟，想找点活干，混几个钱花！"工头见我年轻力壮，就把我留下了。

田喜林还把我领到他家里。我给他母亲买了见面礼。这样，我们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了。

有天，我问他："咱们工地有扳子吗？"他说："有，工头管得很严。"他问我："弄扳子干啥？"我只说："有大用场！"他点点头，似乎懂得点什么。

一天早晨，他从工头那里偷着拿来一副扳子。在交到我手的时候，再三叮嘱：千万小心。晚间我偷偷把扳子拿到了部队，处长见了很高兴，连夜命战士将铁轨衔接处的螺拧开。第二天早晨，小火车来之前，扳子仍在工头的铺下面。

在我从工棚回部队的时候，小火车从大罗勒密方向开

来，当它驶到这段路的时候，小火车突然脱轨，车上的警察纷纷跳下车。这时，早已埋伏在两侧的战士，在李处长的指挥下，一起开火，几十个山林警察举手投降。缴了枪，处长给他们训话，叫他们少作恶，不然，中国人民绝不会饶恕。

田喜林从此参加了抗联，进步很快，由战士提拔为二团二连连长，后来在一次战斗中牺牲。

李子英全家打鬼子

黑瞎子沟，在依兰县南。部队没住两天，又开往勃利县。在勃利住了七八天，又回到了方正县。从方正过响河，经巴豁子岭，在万家窑住下。休息两天后，到新安乡的大小瓜兰川。

在黄鱼圈沟，有个大户叫李子英。此人思想进步，为人正派。听说抗日联军来了，主动把我们接进家里。

李子英家墙高院大，墙是用土垡子垒的，院里四角四个炮台。我们在这儿只住一宿，第二天日军就扑上来了。

东南响的时候，日军来了200多人。

李子英对处长说："这几个鬼子用不着你们动手，只要我领着我几个儿子就可以了。"

处长说："鬼子能放过你吗？"

李子英说："没关系，人是活的，大丈夫以四海为家。"

李子英说完，率领全家，分别登上四个炮台。鬼子刚进入射程，李子英首先开火，接着其他炮台枪声如豆。鬼子一时弄得懵头转向，也不知道院内有多少兵。李处长又命令我们爬上墙头向鬼子射击。鬼子被打得抱头鼠窜，狼狈逃命去了。

这仗击毙鬼子50多人，缴枪50余支。处长叫李子英把枪存好，李子英说啥也不干。他说："我知道队上很缺武器，你们拿去吧。以后有用到我李子英的地方捎个口信就行！"

三 次 负 伤

我在稽查处这四年里，共负伤三次。

一次是打宾县时节，在歪水砬子，李处长正看地形，一发炮弹飞来，我将他推倒，炮弹爆炸，他没受伤，却把我的屁股炸伤；第二次是与宾县山林警察队打仗，整整 打 了 一天，天傍黑的时候，处长命令撤。我们作战的地方是个大塔头甸子，大部分战士撤了，只剩下我们三个。我的那两个战友，不幸中弹身亡，只有我一个人在那还击。突然一个飞溜从我唇边擦过，我只觉得象被蚊子叮了一口，很痛，弄出了血，我知道这里负伤了。我愤恨已极，向敌人反击，直到把向我开枪的那个家伙打死。第三次负伤是在转山子。那次战斗，我使的是枪牌橹子。我们的对手是大罗勒密的山林警察队。冲锋中，我被子弹打了个斛斗。我感到腿发麻，走道抬不动腿。战斗结束后，处长把我送到江北去治疗。大夫一检查，说："还好，没伤到骨头。"大夫把一根一头带孔的铁棍，纫了绷带，顺我的伤口插进去，然后攥着两头来回拽，疼得我满头大汗，就差没跳起来叫唤。这一拽，子弹毒锈拉出来了，直滴黑血。当见到鲜血后，大夫便停了手。前两次负伤，我都没离开部队，这次负伤，李处长非叫我休养。于是我离开了稽查处警卫班。

后来听说李福林同志牺牲在通河县，我为他失声痛哭。我失去了一位好首长、一位好父兄。

（玄照发整理）

地 下 烽 火

张 学 勤

一

我于一九一四年出生在方正县梨树园屯，四岁时父亲因病去逝了。五岁那年由于生活实在过不下去了，母亲便带我改嫁到老谭家，我由于性格倔强，不愿在人家低三下四地生活，六岁那年便和老舅外出干活。

记得临走那天，母亲送了我们很远。她一边走，一边哭。走到一座小山前，老舅不让她送了，叫我先走，我就在前头跑着、跑着，不敢回头看，怕看见母亲哭，更怕母亲看见我哭。翻过山后，我趴在地上使劲地哭了一场。从此以后我便成了一个孤儿。直到今天，只要我一想到母亲，就好象又听到了她的哭声，心中隐隐作痛。

七岁时我来到了方正县宝兴隆给人家放猪，不挣钱，只给点吃的和穿的，以后岁数大点便给地主扛活。到十五岁的冬季我将扛活攒下的钱拿出来念了一年零几个月的书，正是由于读书才使我有机会接触革命，走向抗日救国的道路。

二

念了一年零几个月书后，钱花光了，我又开始给地主家扛活。当时我有个老师叫王纪甫，他很了解我的情况。他为我在学校找一些杂活干，挣一点钱。以后他又叫杨春带我一

起到他家玩。杨春和我都住在宝兴隆屯。我当时给朱永恩家扛活。每到放工时我和杨春便到王老师家听他给我们讲故事。王老师很善于演讲，他博古通今。开始常给我们讲古代岳飞，杨家将怎样抗金救国的故事。以后时间长了，他就给我们讲现在中国怎样的黑暗，日本怎样侵占了东北三省，怎样对中国烧杀、掠夺等。并说："现在中国人就要象岳飞、杨家将那样起来抗日救国。"以后又讲了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共产主义。当时我对这些名词并不懂，只是觉得新鲜，挺愿意听的。记得有一天，王老师突然问我"学勤，你为什么还不成家呢？"。我说："没有钱，娶不上媳妇。"他又问："那你干那么长时间活怎么没攒下钱呢？"我答不上来了。他说："这就是剥削，那些有钱人家倒不象你这样干活，可他们有钱。地主家的孩子，十几岁就结了婚，可你这么卖命地干活，却没钱娶媳妇。"待一会，他又说："要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就好了。"他给我讲了社会主义，人不剥削人，人人平等，多劳动，多挣钱，我问他哪有这样的地方，他说苏联就是这样的地方。接着他又给我讲东北抗日联军的事。最后他说："人总有一死，要么为国家抗日而死，要么被人欺压，当亡国奴而死，但后者是可耻的。"他所说的话引起了我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后来，我说要去找抗日队伍去。他说本地就有共产党。我问是谁，他就不讲了。我离开他家时，他嘱咐我说："千万不要把我所讲的事对人讲，要找共产党，以后会有人来找你的。"

从此，他常常在我放工时，要我到宝兴屯去找任福德，到东拉屯找李殿相。有时又要我给他送信或东西什么的。在这期间，我渐渐知道了这是一个共产党组织。

一九三五年二月的一天，东拉屯的李殿相找到我，说：

“你要求参加革命，经王纪甫和杨春介绍支部讨论，决定吸收你参加延方支部任交通员工作。”随后他又叫我别扛活了，找一个房子住，做交通支部联络点，少种点地，以做掩护，如生活有困难组织上给予帮助。就在当年五月份，王纪甫找到我说：“参加共产党要找两个介绍人，经组织批准才行。”我说：“找你和杨春做我的介绍人，怎么样？”他说：“行。”事隔不久，李殿相又来到宝兴隆告诉我，经王纪甫、杨春介绍，党支部讨论，上级批准（珠河中心县委关化新批准），我从一九三五年八月十日起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把延方支部组成人员向我做了介绍。支部书记：任德福组织委员：李殿相、宣传委员：王纪甫、共青团书记：杨春、交通委员：张学勤、共青团还有申正浩。当我听到这消息后，心情非常激动，象我这样一个四处流浪的人，能在这个组织生活，能够为崇高的事业奉献一切，心中怎能不激动。但我也知道，从这时起，我随时都有被日本人抓住砍头、枪毙、活埋的危险。

一九三六年秋，王纪甫同志因搞宣传活动暴露了身份。就在日本特务带领朝鲜自卫团去抓他之前，他及时得到了消息，转到抗日三军工作，任秘书改姓徐（随母姓）。所以三军的人都叫他徐秘书。据我所知，当时在部队知道他真实姓名的只有李兆麟同志。后来王老师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在背往后方时，壮烈牺牲。

一九三五年前，我们支部直接受李兆麟、冯仲云、关化新领导。一九三六年成立方正县委后，又受县委直接领导，形成了双层领导。我们支部由县委书记刘兴亚（原名张继武）和杨春（已调任县委组织委员）等同志具体领导。当时与我接触的上级领导主要有刘兴亚、杨春等同志。我们与部

队接触不能太多，因为部队成份较复杂，常有叛变事件发生。假如叛徒出卖了地方组织，整个工作都将遭到破坏。所以，只有少数的几个领导和部队接触。当时我们延方支部的主要任务是：向人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发动群众向部队募捐，为部队提供情报，购置枪支、弹药、布匹、药品等，动员青壮年参军和铲除汉奸。

自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我们延方支部为抗联做了大量工作。仅募捐每年都达上千元之多，申正浩以种水稻把头身份，暗地摊款，每年都为部队提供很多钱款。任福德以中医治疗红伤为名，为部队购买了大量的药品、枪支、弹药、布匹等，都及时的送到了部队。一九三六年一月左右的一天早上，我在任书记家装好子弹，准备送往部队，刚一出门就碰上了派驻所的张警长，他见我背着一个沉甸甸的袋子，马上对我产生了怀疑，问我从哪里来的，要检查我的袋子。这时，任书记赶紧走了过来说："这是我亲戚，到这办点年货。"说完之后，急忙把张警长让屋里，我才脱了险。

过完年不几天，我又一次到任书记家取子弹，当时拿来两支短枪及大约三百多发子弹，装在马爬犁上，上面垛了草，刚一走出屯，便碰上了三个保安队员，他们让我下了车，搜查了我身上，见没有什么东西后，便拿上了刺刀的枪往草垛上捅捅，没试出有什么东西，便让我走开了。使我又一次脱险。

一九三六年七月的一天，支部在我住处召开紧急会议。支部的组成人员都参加了，任书记说："地方组织出现了一名叛徒，大家要提高警惕，没有紧急情况，相互不要再进行接触。"几天以后，杨春又找到我，说看一看，哪个地方枪毙人较安全，开枪不被人听见，并说叛徒已经抓住了。当时

我走了一圈后，看方正西张家沟里还可以，便告诉了杨春。第二天，我和杨春、王怀青，便押着叛徒来到了方正西张家沟里，我当时站在外面放哨，杨春和王怀青执行枪毙任务，叛徒跪在前面，杨春拿着枪对着他打了好几枪，可是都是哑子儿。这时王怀青在旁马上拿起一根棍子，使劲给了叛徒几棍子，才将他打死。以后我们延方支部又研究了打宝兴隆朝鲜自卫团，打地主陈守忠的方案，并把情报及时送到了部队，又动员了多名青壮年参军抗日，把宣传鼓动抗日的传单多次撒到了宝兴区太平山驻防的治安院里。延方支部保存的文件，在解放后交烈士馆。延方支部在抗日中作了大量工作，这里面也有救国会的支援。

三

一九三六年十月左右，为了工作的方便，我在方正县宝兴隆屯老朱家院内找了一个屋住下（一个小炮台里），租了点地，以维持生活。有时组织上也常在经济上对我补助，县委张书记和杨春住在方正，离我有二十多里路，经常在我那召开会议，传达上级指示，检查、布置工作，会后常常在我这里吃住。我们有着很深厚的感情。

记得有一次会后，张书记在我处住下了，我们唠了一夜，我对他谈起自己的经历及不幸的童年，他听完后很久没有说话。过了一段时间，他问我还愿意学习吗，我说："当然愿意啦。"他说根据地有一个训练班，想送我去学习。我听杨春说过这个训练班，是赵一曼办的，他在那里学习过。条件和训练水平都很高，我听了非常高兴。后来又通知说由于形势紧张，训练班不办了。

一九三七年以后，东北抗日联军的处境比较艰难了。我们地方组织的处境也较危险。一九三七年十月（打场时节）刘兴亚和杨春来到我住处，脸色比较严肃，叫我马上通知任福德在杨春他三哥家开会。参加会议的有刘兴亚、杨春、任福德和我。会上，刘书记传达了省委指示，主要内容是：部队要转移到苏联去，地工人员就地分散潜伏，保存实力，待机活动。我们听完后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地工人员主要任务是支援部队，部队是地工人员的靠山。所以都舍不得部队走。大家要求和部队一起走。刘书记很严肃地说："这是省委的指示，谁也不能走，我不走，省委书记不走。""省委书记现在是谁？"杨春马上插了一句，刘书记沉思一下说："为了向大家交个底，省委书记还是鲍书记（当时没说叫什么名），在哈市道外鱼市卖鱼呢。"说完之后刘书记又看看大家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到任何时候都不能出卖同志，就是砍头、活埋，打死也不能讲。"传达完省委指示后，我们又研究了一下今后潜伏的方式，接头的方法等。开完会后，天已经黑了，刘书记连夜赶回方正县去了。杨春就在他三哥家住下，我心情沉重的走回老朱家。

四

会议开完的第二天早上，天还蒙蒙黑，有个姓孙的日本特务，带领森林警察队突然将老朱家包围起来，他们闯进门后，直往上房奔去。我忙躲到马棚旁，抱了一捆草装作喂马。这时，一个警察走到我身边问："你姓什么？"我说："姓薛。"（我母亲姓薛），他又问"你认识薛广义？"我说："认识。""那你还不快走！"他小声说。他马上端起了上刺

刀的枪大声说："走，到这边来。"说着把我押到西北后院墙下，然后把我推上了墙，叫我赶快跑，并说："抓还抓不着你呢，你还在这呆着。"我跳下墙跑到杨春的三哥家叫起了杨春。我说："我处被包围了，刘书记走了没有？"他说："走了。"我才放心。我和杨春背着墙向北跑到一个顺水境，杨春说他回方正去，并叫我在外躲一阶段再回来。我们分手后，我向西跑去，游过石头河子，河水正是结冰时期，刺骨的冷。趟过河后，我在野外呆了一天一夜。由于穿的少，又受了寒水浸泡，浑身又麻又痛，又饿。第二天中午回来后，我才知道由于没抓到我，便把朱老三抓去了。朱老三被抓到伪警署后，说他家窝藏共产党，让他交出共产党来。朱老三当时并不知道我的身份，又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所以被打的死去活来。朱老三的四姑娘当时是支部妇救会成员，为了防止出意外，我积极地做了四姑娘的工作。四姑娘说："就是我父亲被打死，我也不会出卖同志的。"后来，老朱家花了许多钱才把朱老三保出来。

事过不久，我在方正见到了表哥薛广义，他问我知不知放我的警察是谁，我说："不知道。"他说那是咱们梨树园屯老宋家的孩子。表哥虽然不知道我是共产党，但他听我宣传过抗日救国的思想，也算是一个"可疑分子"吧，所以常向到他那里玩的宋警察做一些工作。并告诉警察，我在宝兴屯老朱家，以后要照顾一下，所以这一次他将我放了。至于警察为什么包围我处，至今仍是一个谜。也许同志们经常在我处开会，进进出出引起了特务的注意。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但是足以说明我们抗日宣传工作是成功的，共产党要生存、发展、壮大必须依靠人民。

五

延寿、方正两县抗日队伍，从一九三八年开始，转移下江，到一九三九年延、方抗日队伍基本已走光了。在这期间我们仍作了一些工作。一九四〇年前后，有一天，杨春突然来找我，叫我通知任福德说，张书记被捕了，叫大家提高警惕，出外避一下。但他又说："张书记党性很强，我相信他不会出卖组织，出卖同志的。"我听完之后，心情沉重，因为象我们这些人，只要抓进去就别打算活着出来。过了没多久，杨春又来到我这，十分悲痛地说："张书记牺牲了，牺牲的很壮烈。"他大概地对我讲了一下张书记被捕及牺牲的经过。张书记是在一家当长工后被一个地主出卖的。日伪警察逮捕他时，在他身上搜到了证实他是共产党的文件。在县城的监狱里，他受到了严酷的拷打，直到最后被打断了双腿，他还是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最后，日本人无可奈何的将他枪杀了。杨春说完之后，我们都流下了眼泪。在我们的心中不仅是悲伤，更多的是对日本鬼子、汉奸的仇恨。

不久杨春迁到了延寿县南黄玉区小三姓屯，改名叫赵成，在那找了几个小孩教书。为了和杨春同志取得联系，一九四三年夏季，我也到了黄玉区东沟里小营屯那里去住，与杨春相隔五里多路。我所住的屯子，只有几户人家，其中有一户姓杜的和伪区长很好。还有一个姓张的，再就是王家哥俩，王老五和王老七，还有一个姓若的，都管他叫若大哥。王家哥俩和若大哥没有什么势力，经常被抓劳工，他们成了我工作的对象。我经常向他们讲一些日本侵略者的罪恶。怎样烧、杀、抢、夺，奸污妇女，抓劳工等，教他们怎样躲避

抓劳工、抗税等。

一次，日本鬼子要线麻和山葡萄时，我带头抗交，由此引起了伪区长对我的怀疑，不给我发身份证，列为可疑分子。一九四四年八月的一天，伪区长突然带着警察将我抓进监狱，准备第二天运往外地挖煤做劳工，可就在当天晚上，监狱里一个警官喝醉了酒，将所有的劳工提了出来，将一些病残的人赶了出去。当时我的腿跌伤，正在腐烂，所以，也在其中。后来听说，那些挖煤的劳工再也没回来。光复后，我曾带枪去抓过那作恶多端的伪区长，他不知逃到哪去啦，始终没找到。解放后，若大哥参加了独立团，王家哥俩都参加了革命工作。后来见到我说，他们早就怀疑我是共产党了。

任福德在宝兴进行发动群众，抗租抗税活动。一次，在带头抗税过程中，被延寿加信子警察署抓去，后经群众保释出来。在这一段工作中，我们都经历了最艰苦、最危险、最黑暗的时期。

六

一九四五年二月，我到杨春那询问有什么指示时，他兴奋地告诉我，听说方正日本副县长自杀了，形势要好转了。六月份，我又去找杨春。他说："苏联可能要对日本宣战，你速回方正，找任福德，组织地下武装。"随后杨春回到方正永山屯和史皮铺屯找到了救国委员会郑凤岐和那凤亭，组织地下武装。后来，郑凤岐他们在永山屯组织群众，赤手空拳从日本散兵手中夺取了二百多条枪，两挺机枪。双方都死伤不少人。我和任书记在宝兴组织了一百多人的人民自卫

队，正是我们党在延、方两县保留下的火种，在光复中燃烧起来。

当年九月，我到方正县城去探听消息。在大街上见到了一个中国人，穿着苏联服装，正在指挥几个人贴标语。其中有几个标语写到李兆麟、冯仲云、周保中等同志从苏联回来了。我便走上前去问："李兆麟他们真的回来了吗？"他回头看看我说："是的，你认识李兆麟？"我说："不认识，只听说过。"他问我叫什么名，有什么事。我说："只是想找点事干。"他说："以后你有什么事，就到方正苏军司令部找我，我叫傅国壁（现名武昌文）。"回到宝兴后，我把见到傅国壁的事向杨春讲了，杨春听了很紧张问我："你讲没讲咱们的组织和同志？"我说："没讲。"他高兴地说："太好了，现在什么样人都有，蒋经国还在苏联呢（不知当时在不在），别再是国民党拉下的大网。"隔了不几天，我和杨春一起来到了方正县城，在街上碰到了原方正县委宣传部长范景海同志。他见了我们高兴地说："傅国壁是自己人。"并由范景海带领我们见到了傅国壁同志。当时傅国壁同志是随苏联红军进城的。

当年十月，傅国壁同志去了哈尔滨，找到了李兆麟同志。李兆麟同志指示，现在还是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尚未破裂，应以民主大同盟为掩护，积极组织武装，叫傅国壁负责军事，杨春负责党务工作。到年末，在方正组织了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一千多人的部队，并在当年就把延方支部改为延寿支部。支部书记任福德兼宝兴人民自卫队队长，申正浩是支部组织委员，还和杨春搞方正工作，我和权凤来任延寿支部宣传委员，我还兼任方正的交通员，朴喜清任宝头屯朝鲜人民自卫队队长。

七

民主大同盟成立以后，方正城内的情况仍然很复杂，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有共产党（还不公开）、有国民党、还有伪满警察，也有土匪。因为还有为数不多的苏联红军，所以除共产党外，其他势力还不太敢动手。

在混乱的局势面前，最主要任务是建立起一个新的秩序、安定民心。四五年冬的一天，我和权凤来来到了延寿县夹信子搞宣传活动。中午，我们正在往墙上贴标语。这时，走过来几个伪警察（当时还没肃清），大声喊："你们是干什么的，敢在这贴标语。"说完，把我们带到了保安队（日本鬼子留下来的）。当时有一个叫李要中的警察审问我们："你们是从哪来的？"我说："从延寿来。"又问："你们是什么组织？"我说："是大同盟的。"他对大同盟是什么组织不了解，就问："那你们信什么主义。"我乱蒙了一句信新三民主义。他又指着地上的标语说："你们写了工农联盟口号，是不是共产党？。"我说："不是。"他见问不出什么，就装着和我拉近乎，说："我看你的驳壳枪不错，咱们换一下怎么样？"说着就走了过来，我知道他要下我的枪，就说了一句"行"，我拿出了枪后，马上扣上了扳机，他们一惊，也端起了枪，空气非常紧张。正在这时，从外面跑进一个保安队员，慌慌张张说："不好了，老毛子来了！"他们一听，忽拉一下都从后门跑了。我和权凤来迎着苏联人跑去。这时有几个苏联红军正坐着车往这边开，一见我拿着枪，就停下了车，端着枪不让我们靠前。我忙拿出一个证件给他们看。因临走时傅国壁给我们开了一个证明，内容虽是

用汉字写的，但签字却是俄文，而且又盖了苏联司令部的大印。他们看完之后，让我们上了车，坐在车上跟我们比划了半天，才知道他们是从县城下来买粮食的，现在要回延寿县城。正好临走时杨春叫我到延寿县找赵维卿到方正工作，我顺便坐车到了延寿。下车后便和权凤来分了手，直接去了赵维卿家。

赵维卿当时也是站着看风头，准备谁势力大便投靠谁。不过，当时由于他和杨春是从小在一起长大的，所以在我说明来意后，也不便推辞了，答应去方正，并留我在他家住了一宿。第二天早上，我向他告辞时，看见他打开了一个小柜，从里面拿出了六支崭新的驳壳枪，并叫进来三个人。给两个青年一人一支，又给一个老头两支，自己拿了两支别在腰上，对他们说："你们去收拾一下，准备去方正。"然后又对我说："你先回去，我随后就到。就在我刚走后不久，延寿县保安大队长兰大头带领保安大队将赵维卿家包围起来，问"方正来人了吗？"赵维卿说："来了，早走了。"兰大头不信，进屋看了一圈后走了。后来才知道，是一个退役警察向兰大头告的密。

以后，赵维卿背叛了革命，投到了国民党一边，当了土匪。解放后被人民镇压了。

八

日本投降后，方正县城留下了许多弹药库。由于方正县城的武装基本是在我党掌握之中，因此引起了各方土匪的注意，多次攻打方正县城，没有攻破。在城内我方形成了北打通河，东打李华堂，你打不进来，我打不出去的局面。双方都

有很大伤亡。后来由于形势严峻，方正县党组织研究了向东北局求援方案。去东北局求援的有傅国壁、程志清县长、曹局长和我等多人。

当时，城内成份也较复杂，所以，当我们上车时，在送我们的人群中就有不少人，手里拿着手榴弹准备往车上扔。护送我们的是几个苏联红军。他们围车厢站着，手里端着转盘机枪对着下面，逼的下边不敢往上扔。我们就这样出了城外。可是在半路上司机把车停住了，说车坏了（后来知道是司机有意破坏）。没办法，我们只好步行，走了一天一夜到了宾县附近。听说东北局在宾县，我们非常高兴。到了宾县后，虽然东北局在那，却没有多少部队。所以在宾县呆了二十一天，只等到三五九旅，我们又随三五九旅向回返。当时，除了方正县城外，周围几个县都已相继哗变，部队到达珠河、延寿都遭到了城内反动势力的抵抗，我军也有很大的伤亡。到达方正后，由我党领导的自卫队，打开城门，没放一枪一炮便迎进了城。部队稍调整后又开往通河，在通河又遭到了反动势力抵抗。在方正城内，党组织的牌终于公开挂了出来。

我想说的是在日本投降前后，我们延方支部作了重大贡献。如果没有延方支部的存在，就不可能发动群众，组织起人民自卫队；如果没有延方支部的存在，方正县城也许会象周围县城一样哗变；如果没有延方支部的存在，部队进城也要遭到人员伤亡。这段工作，也就是我们贯彻执行一九三七年省委指示方针的结果。

一九四六年二月，延寿县王一青县长，调我们宝兴人民自卫队到延寿夹信子驻防，保护加信子，当年三月，张希尧将我们人民自卫队改为松江省警卫四连，任福德任连长兼宝

兴区长，我任该连指导员兼宝兴区指导员（宝兴区那时还未划给方正）。那时，土匪还很猖獗，以前加信子住有一个伪二十二团的韩团长，光复后当了土匪。手下有二、三百人。我们曾交火多次，给了他很大的打击。他对我们恨之入骨，经常下来骚扰百姓。我们为了控制他的家属，部队就住在他家，使他不敢轻举妄动。当年五月，我得了伤寒病卧床不起，部队又去剿匪，只留下了我和警卫员二个门岗。当时二连有二个战士叛变，在韩团长部下当土匪，和我们连的排长马庆永相勾结，准备把我杀了去领赏。这时他们见机会难得，就叫马庆永将我的警卫员打发上街买东西，还将门岗撤了下来，把两个土匪放了进来。他们见我有病在炕上熟睡时便要动手。这时候韩团长的女人从屋外闯了进来，她认识这两个土匪，在屋外看见他们进了我的屋后，知道情况不好。她进屋后，将他们叫到自己屋内，问他们来干啥，他们说要我的命。韩团长的女人叫两个土匪赶快回去，问问韩团长还要不要家了，要不要他妈了。两个土匪赶快走了。以后在土改时，我们从马庆永家搜出了国民党给他的委任状。后经群众请求，把马庆永枪毙了。这件事当时我并不知道，韩团长投降后我才知道事情的经过。

这是我从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六年十一年的大概经历。回忆起这十一年的经历，我觉得是那些死去的烈士，是那些不顾个人安危、甚至家庭毁灭的人民给了我勇气，使我走过了这十一年的艰辛路程。

我想补充一点，关于中共珠河县委原书记关化新牺牲的经过。

方正县城光复后，我在县城碰上了原一个屯的放牛倌张凤山同志，当时都管他叫张牛倌。抗日时，他参加了抗日联

军，后来部队打散了，他又回了家。他碰到我对我详细讲了关化新牺牲的经过。

抗日联军三军一师，经过几次战斗后，伤亡很大，还剩下二、三十人。当时是夏天，在师长关化新带领下进了一个山里。当部队坐下休息时，日本的飞机在上空扔下了许多传单，叫关师长投降，关师长非常气愤，说："走。"又带领队伍往里走了二十多里路。傍晚时，天下起了雨，战士们由于又累又冷便坐下休息，升起了火脱下衣服烤，可能由于生火的原因，过了一段时间，日本鬼子悄悄地摸了上来。当时张青山坐在关师长旁边，听见有响声便喊了一声"有情况"，过了一会见没动静，有人说可能是野兽吧，就再也没注意。这时日本鬼子已完成包围，一起向火堆旁放小手炮，扔手榴弹，用机枪扫，张牛倌听到后面"呀"的一声，回头一看，关师长身中数弹，倒在地上。张凤山连忙背起他走了十多步发现关师长已牺牲了。张凤山放下关师长，拿起一挺轻机枪，一边打一边跑，和另一名战友突围而去。跑了十几里，见没有日本兵追，便把打光子弹的轻机枪，埋在了一棵大树下，没有办法，只好下山回家了。另一位战士也走了，后来不知去踪。据他所讲，除了他和另一名战友外，其余的可能全牺牲了。以上是我听到关化新牺牲的全部经过不知是否属实，不知现在对他的牺牲经过有无记载。

忆 我 的 一 生

四失父　五离娘　七执长鞭立山岗
狂风啸　瀑风袭　手麻脚木守猪牛
畜失群　夜难归　狼嚎狐叫心惊慌

孤儿苦　流浪悲　思念爹娘泪水垂
九一八　日本占　国亡民耻人遭殃
遭抢劫　受凌辱　奸污抓工一烧光
共产党　唤民族　同心齐力来救亡
树雄心　立壮志　三五参加共产党
为国难　为民族　心中只有共产党
视同志　为祖国　奋发前进再前进
为国家　牺壮士　救国英雄永不忘

四、五、七是我的岁数，三五是指我参加中国共产党，国亡民耻是指中国的各族人民。

附：订正与补充

玄照发同志：

你好！你邮来的信及文史资料都已收到，非常感谢。在你们走后不久，我们找到了父亲在笔记本上的回忆材料、几点说明及后面的那首诗，都是他在十几年前写的，写的比较详细，原封不动的抄录下来，在一些细节方面又询问了一下父亲后，稍整理寄给你们。由于时间匆忙，有些疏漏，同时又询问了一下父亲，父亲又讲了一些，故做如下订正和补充。

我的名字

小时候没有名字，我的名字是老师王纪甫起的，他说："你勤勤恳恳干活挣了这么一点钱还要拿出来念书学习，我看你就叫张学勤吧！"

惩处叛徒一事

1936年7月左右惩处的叛徒，当时没有细问，因为党的

纪律不允许，所以不知叛徒是谁。

被抓劳工经过

1943年夏季为了和杨春联系方便，我来到了黄玉区东沟里小营屯我母亲那里。在那里搭了个小马架住，和杨春相隔五里多路。由于我在那经常宣传一些抗日救国道理，引起了伪区长周凤苏的注意，他不给我发身份证，列为“可疑分子”。周凤苏这个人无恶不作，经常下乡收租收税抓劳工。交不出租税的就被他抓起来带到场院罚跪毒打，并把一些强壮劳力抓往外地作劳工。所以人们对他恨之入骨。

大约在1944年入秋时，上次写的8月份不太准确。一次日本人要线麻和山葡萄，我带着王家哥俩及若大哥以没有为名抗交，这更加引起了周凤苏的注意，第二天他带人突然将我抓进监狱。监狱里面关押了大约一二百人，我们都不知运往何处，去干什么？就在被运走前一天警察局劳务股有一个姓袁的警长喝醉了酒，将被抓的人都提了出来，他带着一副眼镜，手里拿着文明棍，将一些有病的和没有行李的人指到一边，当指到我时问：“你的行李哪?”我说“没有!”他又看了看我脚上正在发炎的伤口说：“就你这个样，半路不病死，也得冻死，出去吧！”然后又对身旁两个警察说：“叫周凤苏再抓两个来！”就这样我脱了险。我被抓走后，母亲受到了惊吓一病不起，又无人照顾，喝凉水，吃野菜，全身浮肿，最后悲惨的死去。周凤苏深知人民不会饶过他，祖国一解放他就藏了起来，我找他多次，也没找到。

关于杨春的一点情况

杨春在我之前入党，又是我入党介绍人。1936年以前杨

春任延方支部共青团书记。1936年方正成立中共县委，杨春任县委组织委员。光复前后杨春在方正县作了大量工作。

1945年6—7月份（麦收时节）有股日本散兵从依兰走到了史皮铺（上次写的永山屯不对），在一个场院休息。他们把枪架到一起，抗日救国会的郑凤岐等人伪装成送饭的、割麦子的，悄悄摸了上来，靠近后一见时机成熟便突然跑上去夺枪。等到日本兵醒悟过来后已措手不及了。但有的日本兵手里还有短枪及手榴弹，于是双方展开了战斗。两方都有很多人伤亡，最后日本兵溃逃。夺取了二百多条枪，二挺机枪，为后来组织人民自卫队准备了武器，后来我才知道这场战斗是杨春指挥的。

光复后杨春去哈尔滨见到了李兆麟，把延方支部的工作情况作了汇报，得到李兆麟同志的高度评价，并将评语及支部组成人员的名单交给杨春带回。这份文件我们支部成员都传阅了，可惜后来被土匪赵维卿强行搜去。

杨春党性很强，个性也很强。记得有一次我们在省开会，有个警卫人员胡说：杨春背叛革命。杨春听后大怒险些没将那人打死。他就是这样的倔强；以至最后以死向人们表白自己的清白。纵观他的一生，他象在方正县牺牲的其他烈士一样，不愧为方正县人民的好儿子。

硝烟弥漫的日子

陈 魁

我是方正县伊汉通乡尖山子人。一九二〇年生，一九三六年参加革命。先在抗日联军三军留守处当战士，后给李福林同志当警卫员，一九三七年退到苏联。在短短的一年间我经历了数次战斗，虽然已过去几十年了，但也忘不了，特别赵尚志同志的叱咤风云的光辉形象，仍记忆犹新。

初识范伯伯

我说的范伯伯就是范景海老人，当时是中共方正县委的宣传部长，是从尚志县派来的。解放后任方正县参议。当时他在方正做地下工作。

那年他有四十多岁，比我爸爸年长几岁，所以我管他叫范大爷。他中等身材，爱说爱笑，对人和气，凡是认得他的人，没有一个与他合不来的。说真的，我也喜欢他，胜于我的父亲。他给我讲了很多故事，我为故事中的人物所感动，梦想当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

父亲告诉过我，他认识范伯伯是在一个赌场。

我家三口人，父母和我。父亲是贩鱼的，我虽然十几岁，也找活干，给本屯地主安四爷放马。父亲的工作很辛苦，早晨到张家炉上鱼，走二十五里，到方正街去卖。在去

方正中间得路过二吉利屯，二吉利屯有个自卫团，自卫团长叫隋升，人称他隋保总。隋保总在二吉利设赌抽头，大发其财。什么宝局、牌局、骰局，应有尽有。父亲年轻时爱看小牌，靠贩鱼挣几个钱，还不够养家糊口，怎敢去参加赌博。但好酒不如茶坊，卖鱼回来爱到赌场看热闹。一来二去，他也参加了赌博。父亲脑袋好使，手气又好，场场都赢。父亲心地善良，不肯拿赢得的钱。但又不好还给人，只好陪着再玩，直到输了为止。父亲这一举动，被范伯伯发现了。范伯是搞抗日活动的，什么地方都去。范伯伯问父亲："你赢了应当就走，为啥又输回去？"父亲回答说："都是穷光蛋，输了钱，老婆孩子谁养活。就是玩呗！"范伯伯说父亲心眼好，于是他们便交了朋友。这样，他以后经常到我家来。有天范伯伯对父亲说："老弟，咱们都是穷人，不能同生，但愿同死，不如拜个把子。父亲也喜欢范伯伯，又邀了李果子匠，老于头和安四爷，一共五人，成为结义兄弟。其实拜把子只是我党发动群众联系群众的一种形式，当时我当然不理解。

范伯伯不但给我讲故事，还教我读书识字。我记得，他有本《百家姓》，可能总在怀中揣着，弄得破破烂烂的。他拿这本书教我念。我听母亲说，人生下来，阎王爷早就造定了，念书的和放猪的是命，命里该然。所以我问范伯伯："认字有啥用啊？"范伯伯说："用处可大了。能看书，能看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我给你讲的故事都是我看书看来的，不认字咋行？"

为了能读故事书，我与他学习《百家姓》。日子久了，我们熟了，我问他："范伯伯你是干啥的？"范伯伯笑着问我："你说呢？"我想了想小声说："马胡子！"

当时尖山子一带是红地盘。马胡子是日本鬼子对抗联的污称。不过当时群众也把抗联称做马胡子。含义与日本鬼子可就不同了。

范伯伯一听哈哈大笑："马胡子，人民的马胡子。"

当我知道他是抗联后，便缠着他给我讲打鬼子的故事。他工作很忙，但对我的要求，尽量满足。通过他讲的故事，使我幻想成为杀敌立功的抗日民族英雄。有天，我向他提出："范伯伯，我也能抗日吗？"他说："只要你愿意，当然可以了。"我一听高兴极了。只要范伯伯答应了我，我一定能够身穿黄军装，身背小马枪，跨上赤兔马，手拿冲锋号，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小英雄。我急着问："多咱带我走？"范伯伯迷起了眼睛，想了半晌才说："现在倒有件事情很着忙，不知你敢不敢？"我抢着问："是不是抗日的事？"他说："那自然。"范伯伯告诉我，要在尖山子建立一个儿童团，任务是搞情报。并叫我当儿童团长。我想团长是官，官就是英雄，便满口答应了。可范伯伯说，光有官，没有兵，算不得英雄。那么兵上哪去找？范伯伯告诉我："你去找你最要好的小朋友。那些仇恨日本鬼子、汉奸的小朋友，组织起来，拧成一股绳。"于是我找了老赵七十子，杨家山、李云、高台。我和他们插草为香，拜了把子。按年岁排顺序，李云老大是大哥，赵七十子老二是二哥，我与高台同岁，但我比他生日大，高台是老疙瘩，我就是三哥了。拜把子后，我对他们说："从今以后，咱们有福同享，有罪同遭。谁也不行出卖谁。"大家一致表示，一心一意，绝不出卖朋友。接着我把组织儿童团的事情与大家说了，大家一听说是抗日，都一致赞称。

缴自卫团

一九三五年四月，我参加了缴自卫团的斗争。

二吉利的自卫团，不但设赌，而且还堵截我抗联物资，成为我军的一个祸害。据此，我军决定除掉这个自卫团。

记得那天早晨，天刚放亮，范伯伯把一个中年人领到我家。他向我介绍说此人姓孙，是三军的副官。范伯伯叫我管他叫孙叔。范伯伯说："赵尚志将军决定拔掉二吉利这颗钉子。这次行动分两步：第一步，捉住隋保总，第二步解决自卫团。捉隋保总的任务交给你和孙叔叔。"听说把任务交给我，我高兴地几乎要跳起来。我说："范大爷，下命令吧！"范伯伯说："一切听孙叔叔指挥。"

隋保总家住在得莫利，每天下午，他都回家。回家，尖山子是他必经之地。孙叔叔对我说："咱们就在尖山子乱葬岗子下卡子捉拿隋升。"

那天下午，下小雨，我们来到了尖山北乱葬岗子。孙叔叔隐蔽在坟后边，我骑着马，在路边装着放马。我头戴草帽儿，身披蓑衣，怀揣磨得锋快地小镰刀。时隔不久，现在说，大约在下午三点来钟吧，隋保总骑着马从二吉利向这边跑来。我把事先准备好的纸烟握在手里，怕雨淋，等他近前好说话。

"你是谁？"老远，隋保总就大声喊，样子很紧张。

"是我呀！三叔。"屯亲，我管他叫叔。听他喊，我懒洋洋地回答他。

他见是我，心放下来。用缓和的口气说："哦！是柱子！下雨了，还放马？"

我的乳名叫柱子。

我漫不经心地回答他说："安四爷说，这匹马有病，特别将养将养。"

说着话，隋保总来到我跟前。我把握在手中的纸烟举在眼前说："三叔有火么？借个光。"

其实我不会抽烟。他斜了我一眼之后，喃喃地说："一捏岁数就抽烟！"

我嘻笑着说："抽着玩呗！"

说着我们两匹马凑到一起。火也不借了，从怀里掏出了小镰刀，乘他不备的情况下，搭上了他的脖子。他刚想挣歪，我就说："你动一动，我就往下拽！"

他脸色煞白，口中说："柱子，别这么闹！"

这时孙副官从坟后跳出来，用枪给他支上。他乖乖从马上下来，交了枪。孙副官向他交待了我军对待汉奸的政策，叫他为人民立功。隋保总连连说："只要不杀我，叫我干啥就干啥。"

就这样，我们捉住了隋保总，完成了第一步任务。

当日，我们把他押到转山子，交给了李福林同志。

当天夜里，孙副官带队人马，押着隋保总上二吉利。孙副官对隋保总说："现在是你立功赎罪的时候了。到二吉利，你在前头走，向岗哨喊话，要是你敢出卖我们，小心你的脑袋。"

隋保总为了活命，连连答应。

到二吉利屯外，碰见自卫团第一道岗。岗哨问："什么人？"

隋保总回答说："是我！"

岗哨听是他们团长的声音，可也没在意，但看到我们二

十多人，很卺眼，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可是我们已经到了跟前，想反抗也没用，乖乖地做了我们的俘虏。这样，我们到了自卫团住的院子。院墙又高又厚，四角有炮台。

进屯，孙副官把我们分成两路，向自卫团部移动。他押着隋保总直奔自卫团的大门。

“谁？”哨兵问。

“我！”隋保总回答说。

“是保总啊！那是谁？”哨兵问。

孙副官一个箭步蹿到哨兵跟前，把枪给他支上说：“抗日军！”

接着埋伏在两边的战士，涌进了自卫团。

按着原计划，队伍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解决四个炮台，一部分解决大营。时隔不久，炮台上和大营里的团丁都做了我们的俘虏。孙副官向团丁训了话，放他们回家去，并警告他们，不许再给鬼子汉奸干事。隋保总也被我们放了。

这一仗打得很漂亮，一枪没放，白白得了三十多支枪。

路上我问孙叔叔，这么打是谁出的主意，他说是范伯伯。

参　军

一九三五年腊月，我出屯搜集情报，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走到家门口，见屋门大敞四开。邻居告诉我，方正县里来了三个警察狗子，抓我父亲没抓着，就将我母亲抓去了。

一听，我急了一身汗，心中没有了主意。范伯伯告诉过我，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到张家炉找他。

我出了家门，一口气跑到张家炉。到张家炉，真找到了范伯伯，恰巧父亲也在这儿。我哭着把母亲被抓的事告诉了他们。

范伯伯说："抗日是革命啊！革命不是住家看狗，是一场残酷的斗争。你要参加革命了，就要坚强，遇着天大的事，也不准哭鼻子呀。"并告诉我，母亲被捕一事，他已知道，正与父亲商量怎么营救。听他这么一说，我就不哭了。

我在张家炉呆着，他们走了，我在这里呆了一天一夜，想母亲，吃不香，睡不着。第二天夜里，范伯伯与父亲回来了。范伯伯高兴地拍着我的头顶说："快走，见你母亲去！"

范伯伯真是个能人，母亲叫鬼子抓去，居然能要回来。我与父亲见了母亲面，母亲搂着我直哭。

母亲被抓进警察署，吊打非刑，逼她供出有个姓范的马胡子住在我们家。母亲认死也不肯承认。一连上了三次刑，她都挺过去了。为了蒙蔽敌人，她装疯了。虽然装疯，敌人也是不放她的。那么她是怎么回来的，父亲说多亏范伯伯。那夜范伯伯从张家炉回来，找安四爷商量。安四爷是个开明地主，后来也参加了抗联。他拿钱，找景警尉运动。景警尉得钱，打通了关节，日本才将母亲放回。

母亲虽然回来了，可父亲却说："家是不能呆了。我得走，到部队去。"并提出带我走，母亲听说带我走，很不愿意，她说："一个小孩子家，鬼子能把他咋的。"我也不同意离开母亲，向父亲说："娘身边没人怎么能行啊！"这样，父亲到部队里去了，我留在了母亲身边。

一九三六年四月，一个夜里，我与母亲正躺在炕上睡觉，日本鬼子领着十多个警察把我家包围了。一阵叫门声把

我惊醒，母亲推我一把说："快跑！"我推开后窗户，一纵身跳出去。这时邻居也被惊醒，见我跑出，知道鬼子在抓我，就将我拽到屋中，一把推到土豆窖里。我虽然在土豆窖里，我家发生的事儿，都听得一清二楚。

鬼子问我母亲："柱子哪去了？"

母亲疯疯癫癫地说："你们给我送柱子来了，送吧，多送几棵！"

鬼子气的直喊，重重地打了母亲几个耳光。母亲拚命地叫着。

鬼子命警察四处搜查我。搜了半天，不见我的踪影，只好走了。鬼子走远，邻居将我拉出了土豆窖。

回到家，给母亲揉脸。母亲对我说："只要抓到鬼子，千刀万剐也不解恨！"

正说着，有人进院，并敲窗户："柱子！开门。"

声音虽轻，一听就听出是谁了，是他——范伯伯。

我打开了门，把范伯伯迎进屋来。原来，鬼子进屯时，范伯伯就在屯外，观察动静，鬼子走后便进屯来看我们娘俩儿。他安慰母亲说："大妹子，吃苦了。"

母亲说："挨打受骂咱挺得住，只要柱子在就行。"

范伯伯说："柱子也暴露了，不能在屯里呆下去了，得上队。"

到这个时候，母亲当然得同意了。范伯伯给我写封信，叫我到尖山南边，有个地窝棚，找王小脚。我拿着范伯伯给我写的信，找到了王小脚。

王小脚是个老太太，大约五十左右岁。山东人，小脚。她是抗联的地下交通员，以种地为掩护。

在王小脚的地窝棚里有二十多人，都是全副武装的抗联

战士。我把信递给她之后，她看了看，对一个大个儿抗联说："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柱子"

原来，我捉隋保总的事，三军全知道了，怨不鬼子抓我呢。

然后她指着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对我说："他就是李司令！"

当时李福林正当三军三师政治部主任兼稽查处长。由于他过去做过哈东支队司令，人们还叫他李司令。

李司令，朝鲜族人，三十多岁，早就听说他是神枪手，双手使匣子，百发百中。他的汉语讲得很好。他对我说："给我当警卫员吧！"

我想当什么都可以，反正抗日就行。于是我当了李福林同志的警卫员，当时，我才十五岁。

梨树园诱敌

李司令叫我当他的警卫员，可我个太小，上马得人掴。于是李司令叫我在留守处干几年，等个儿长高再说。

我们留守处只有十五六个人，住在梨树园。

有一天，交通送来情报说，日伪军三百余人，由汉奸景警尉带领，进山"讨伐"我军。

梨树园这地方，地处山区，可攻可守。但是，敌我力量太悬殊，十多人怎么能抵挡住三百多人。

我们的李处长召集大家开会，讨论是撤还是打。大家议论纷纷，主张撤的人占多数。这时，赵尚志将军领十个战士，到留守处视察。我们的处长向将军做了汇报，并请示是打还是撤。赵尚志将军问大家："你们说是撤还是打呢？"

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出声。司令说：“你们以为敌人人多势众，咱们打不过，要撤是不是？”这真说到我们的心上了，大家都乐了。赵司令异常严肃地指出：“他们三百，咱们加在一起才二十三个。敌人的兵力是我军十多倍。从兵力上看，这是以卵击石。可见，敌人短处太多，地形他们不熟，进了山就懵了。我们呢，山里的地形地物，我们全熟，闭着眼睛也分辨出哪是哪。凭这儿，我们就能打败鬼子。”

听了司令的话，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都认为司令讲得有理有据。大家一致说：“听司令指挥！”

司令说：“咱们这仗采用诱敌深入战术。我们把他们引到沟里。然后两面夹击，以少胜多。”

于是我们二十三个人，在赵司令的率领下向山里撤去。

鬼子进了屯，问屯里人：“这屯子住过马胡子吗？”

屯里人按司令的布置说：“住过，住过！吃完早饭就走了。”

敌人又问：“往哪里去了？”

屯里人指着我们打埋伏的那趟沟说道：“我们看见他们钻到那趟沟里去了。”

敌人问我们有多少人，屯人故意把我们的人数说少：“十一二个吧！”

鬼子随即命令其二百人在梨树园待命，一百人由景警尉率领向我扑来。

从梨树园往南走，前边是座大山，山下有两处山丘，呈馒头状，是条深谷，这里正是打伏击的好地方。

司令把我们分成两部分，分头占领两边山丘。山丘上，榛蒿芜杂，趴在里面，谁也发现不了。

敌人向沟里杀来，三百米、二百米，一百米、五十米。

“打！”赵司令高喊。

两丘枪声骤起，敌人纷纷倒毙。

汉奸景警尉见中了埋伏，又不知我军底里，慌忙喊：“撤！”

日伪军拚命往后跑，但没有跑出我军枪子的射程。这一仗，消灭敌人六十多，缴枪100多支。我军无一伤亡。

草皮沟歼敌

草皮沟位于松花江南岸，伊汉通乡得莫利东。赵司令于一九三六年六月，在这里打了一场歼灭战。共歼敌二百四十余人，其中有日军四十人左右，缴获子弹十二驮。（一驮四箱）

打草皮沟的前一天，交通给我军送来情报：日伪军一千余人，正集结在得莫利，准备进山讨伐。接到情报后，赵司令马上召集军事会议，研究了作战方案。决定将敌人引出得莫利，到草皮沟来打。

当时我军有司令部的少年连、稽查处、老六团，计约二百七十余人。

赵司令派少年连作尖刀班，到得莫利诱敌。他们的作战原则是，许败不许胜，把敌人引进草皮沟为目的；稽查处、司令部埋伏在草皮沟东侧，老六团埋伏在草皮沟西侧。就这样，给敌人布了个口袋阵。

少年连奉命从转山子穿过，到得莫利与敌人接火。敌人误以为偶然相遇。他们有五百余人，欺我人少，便极力相击。少年连且战且退，把敌人引进了草皮沟。

当敌兵进入口袋之后，两侧伏兵骤起。眼看五百多人要报销，江上开来日军炮舰，才算救了没死者的性命。

这仗打完，我们随大部队到万宝山沟里的大猪圈整休。

打“江亨”号

一九三六年八月，从佳木斯送来情报：本月十六、七号的时候，有条货轮要从草皮沟过。船上装的是大米，白面和白糖，是给哈尔滨的关东军送的给养。

赵司令听得这个消息，高兴得睡不着觉。因为金秋已到，抗联的给养不足，需要补充。现在送上门的东西，那能叫其空过。于是，赵司令决定：江上劫船。

据情报说，这船是条大船，船号“江亨”。劫船与劫火车可不一样。劫车好劫，只要把铁轨一扒，火车再能耐，也得出轨。但船却不行，船在水中，在岸上打枪无济于事。所以我们决定用木炮轰。

木炮是在双凤山做的。用一尺多粗的榆木，中间抠个大窟窿，里面装进炸药，铧铁之类的东西，重有三十多斤的样子，接上引线，两边用黄泥堵死。当年赵司令木炮轰宾州，就使这样的炮。这炮威力很大，把城墙轰个大豁子。

这次打“江亨”号，赵司令率少年连和稽查处参加。少年连埋伏在草皮沟，稽查处埋伏在大沟。并从两个单位中抽出一百二十人当敢死队。

上午十一时，“江亨”号开进草皮沟。

我们的木炮安放在草皮沟的斜对角上。背靠大山，架在大树上，炮口对江面。

当船接近十余米的地方，我们的炮手，将木炮引爆。轰隆隆一声巨响，浓烟滚滚扑向“江亨”号。铧铁、铁砂击中船身。船不动了，在江水中直打晃，头冲江北，尾冲江南。

敢死队一声吼叫："杀呀！"纷纷跳上了船。埋伏在两侧的少年连和稽查处也一哄而上。船上押运的日伪军慌忙举枪还击，然而为时已晚。

少年连在岸上，用喇叭筒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伪军和船工们，我们不是来打你们的，你们要放下武器。"

伪军的枪声哑了，只有日军在负隅顽抗。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击毙了四十多个鬼子兵。伪军纷纷举手投降。

战士们从船上扛下大米、白面。

司令命令我们兵分两路，一路运往一棵松，楚山亮子，留部队用。一路运往江北南北六方，给当地群众用。

货运完，有人主张烧船，赵司令不让。他说："船虽然是资本家的，可是是鬼子抓来的呀！"

于是，我们把船放了。

这次战斗还缴获了二三十支枪。

一棵松巧布疑兵

一九三六年九月份，抗联三军在大猪圈整休，准备在十月份北征。

一天，范伯伯从方正县来见赵司令。当时，司令正开会，范伯伯向司令报告说，打"江亨"号之后，日本鬼子恼羞成怒，从通河、依兰调来不少兵，大约六百余人，准备打一棵松。

司令一听很高兴，他说："既然来了，不能叫他们活着回去。"

范伯伯报告完，就走了。范伯伯走不久，我们的侦察兵

回来了，他说大队鬼子兵已到大罗勒密了。赵司令命少年连作尖刀班，去大罗勒密诱敌，他率大队人马到一棵松。

从万宝山到一棵松之间只有一条路，没有其他路可走。这条路两旁是大山，中间是条长谷。两旁的山立陡立陡的。站在上面往下看，得伏身；站在下面往上看，得仰壳。赵司令就选择这个地方，布疑兵，打鬼子。

大部队都埋伏在沟的两侧，只叫十几个战士在山上砍柴。这山很拢音，人们说话，十里以外能听见。战士按司令布置，边砍柴，边唱小曲。

尖刀班是马队，当他们走到大罗勒密南的时候，正巧与敌兵相遇。两下打了一阵，尖刀班佯败，向一棵松方向跑。鬼子挥兵进攻。尖刀班跑到我设疑兵的深谷时，引敌入沟。鬼子兵不加思索，追入沟塘。

这沟是蛤蚂塘，脚插进去，拔也得拔半日。因为我尖刀班骑马，蛤蚂塘很快就过去了，鬼子是步行，自然要在塘里挣扎。骑马的鬼子官嫌当兵的动作迟缓，边骂边用刀背砍。

砍柴的战士，象没事似的在山上唱小曲。

六百鬼子兵，进入谷中，约有一多半了。赵司令率伏兵冲出。枪声如过年放鞭，好不热闹。鬼子兵哭爹叫娘。鬼子官一看上了当，急令撤退。然而为时已晚。

此仗共歼敌三百，缴获枪支三百多。

智取通北

一九三六年十月份，赵司令率领我们打通北。

打通北共去七百多人。从延寿出发，经方正、通河，到海伦，一路无阻。从海伦进山，遇上麻烦了。

索伦族是我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之一。日本鬼子为了对付抗联，收买了索伦的上层人物，他们改编为山林队，发子弹、发薪饷。索伦人祖祖辈辈以狩猎为生，善骑善射，是别的民族不可比拟的优点。他们长期生活在森林里，对地理非常熟悉。从海伦到通北，必须经过这里。

我们一进山，他们就知道了。不过，他们听说领兵的是赵尚志，不敢与我们正面接触，兜圈子，与我们捉迷藏，拖时间，想饿死我们。我们对情况不熟，对要出现的问题估计不足。情况果然发生了。给我们拉道的道没拉开，使我们在山里，整整迷了一个星期。临来的时候，粮食带的不多，不几天就吃光了。找群众，到哪里找？在这深山老林里，连个人影儿也看不到。怎么办？司令一面命令把马杀了吃，一面派人找向导。不久，碰到一个索伦人。他不会说汉语，哇哩哇啦讲索伦话。我们部队有个叫丰保太的，他毛遂自荐，说他会讲索伦话。司令叫他向那个索伦人讲清抗日的大道理，叫他给我们当响导。丰保太按司令的意图与他翻了半天，丰保太才对司令说："他说他愿意为抗日军效力。"通过丰保太，我们才了解索伦头目的狠毒用心。这个索伦人说，从这里到通北，得经过三个索伦营，从这个营到那个营，抄直走只有七八里，绕道几十里。赵司令叫他领我们直奔索伦营。

到第一个索伦营碰见了他们的山林队，尽管赵司令叫那个索伦喊话，可是怎么喊也不听。他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司令下令说，注意少数民族政策，躲着点，所以，我们不敢奋力还击。这场仗，我们损失很大，死了二百多战士。

到第二个索伦营，司令改变了被动挨打的主意，下令主动出击。没等索伦人动手，我们就把索伦营包围起来了。在我军强大的威力下，他们不得不投降。赵司令向他讲了反满

抗日的大道理，并警告他们别上日本鬼子的当。这些“山林队”经过教育，提高觉悟，纷纷表示愿意为抗日效力。赵司令命他们去第三个索伦营讲明真象。他们去了不久，第三个索伦营的山林队来投降。在我军的教育下，当场有二百多索伦兄弟，参加了抗日联军。

正月三十儿，到通北，一共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

敌人在通北驻重兵，有满洲兵大营，还有日本兵大营。我们一共才有七百多人，又加上一路疲备不堪。所以赵司令说，不能硬打，得智取。

他叫几个战士化妆成索伦人，扮作进城卖皮子的样子。走在城门口，他们装作打架。故意扭打在哨兵跟前，哨兵不知是计，前来驱赶。我们的战士乘机干掉了哨兵，打开城门，赵司令挥兵直入。

这仗打得漂亮，打他个猝不及防，仅几个小时，就把这两个大营消灭了。缴获枪五百多支，又吸收一些伪军和当地青年参加抗联。二月初五回到延寿，带回一千多人。

（玄照发　整理）

出生入死话当年

郑桂珍

父亲叫我学枪法

我1919年出生在方正县大罗勒密。父亲郑万昌曾在依兰镇守使李杜手下当连长，后来参加了抗日同盟军第四军任连长、营长、团长。人们叫他老连长。又因我家猎户出身，父亲枪头准，所以人们又叫他郑炮。当时我家四口人，父母加我，还有一个哥哥，哥哥学名郑洪涛，小名叫帐子。参加抗联先后改名郑广智、郑国志。哥哥长我四岁。父亲的性格粗暴倔强，哥哥也是那样，有一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虎实劲儿。父亲自己这样也喜欢别人这样。记得九岁那年，父亲打猎回来，把枪放到炕边儿，趁父亲出去后，我便在那摆弄，不知怎么把子弹推进了枪堂，一勾火，枪响了，把屋地一口大缸打碎了。惹了祸，我吓哭了，母亲也吓坏了，谁知父亲回来进屋一看，不但没火反倒哈哈大笑起来，连连夸我有胆量，长大准是一块好料。从那以后，每逢父亲回来，总是手把手地教我使枪。十岁，父亲就教我骑马。还有一个叫大环子的姑娘，她比我大两岁，一有机会，我俩就骑着父亲的马到野地里去玩。妈妈一看见我骑马弄枪就生气，骂我比小子还淘气，可父亲却越来越喜欢我。

1930年，父亲将哥哥送到方正读书，寄住在冯裕井子一

个本家的家里。转过年，“九一八”事变了，父亲让哥哥从方正退学回来，开始呆在他身边。那个时间大罗勒密十分混乱，人心惶惶，说日本人快打来了，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母亲终日愁眉苦脸，父亲也暴躁不安，有时喝上酒就骂东洋鬼子太欺负中国人。同时也骂中国兵都是熊货，连门口都看不住。每逢父亲发脾气时，我们都不敢吱声，偎在母亲身边，好象要有一场大难来临。

哥哥早就学会了使枪，而且枪法很精。有一次哥哥打了一只狼回来，父亲很高兴，夸哥哥有出息，并指着哥哥对我说：“代小（我的乳名）也得好好学枪法，以后好打东洋鬼子。”母亲不乐意，她说：“代小不能跟你爷们儿学，摆弄那东西早晚要吃亏。”

草皮沟负伤

“九一八”事变后，风声一天比一天紧了，从上边下来一些零零散散的兵。这些兵窜进大罗勒密，抢老百姓的东西，作践妇女，什么坏事都干。还说日本子眼看就要打进来了，好东西，好女人不能留给东洋人。老百姓拖儿带女纷纷往大山里逃难，鸡飞狗叫一片混乱。父亲被李杜召去。就在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我们一家也逃进了大山里，地名叫新四棚子。

不几天父亲从依兰回来，回山里找到了我们，还带来几个弟兄。

四月初，父亲带着那几个弟兄和哥哥要下山弄粮食，我也跟着去了。我骑着一匹老实的白马，父亲在弟兄手里给我串了一支小马枪。

下山以后，我们在大罗勒密西河截住六个散兵，他们押着

两辆车，车上坐着六个哭哭啼啼的妇女。父亲一见就火了，命令弟兄们下了他们的枪。这六个家伙起初十分蛮横，当听说是郑炮的时候，一个个吓得脸都白了，连忙求饶。父亲很脑火，骂他们："算中国人吗？把本事用到东洋鬼子身上去，你们没有姐和妹？"说完，父亲挥挥手让他们走了。这六个家伙象野鸡似的钻进了柳条通，那副狼狈样子十分好笑。

那六个妇女见我们救了她们，感谢得痛哭流涕，父亲想回山，怕她们又遭到不幸，问她们是哪里人，她们说是方正南井子的，一再请求父亲把她们送回去。父亲让哥哥带六个弟兄护送她们回家。我也要求跟哥哥去，父亲说，你妈挂念你哩。我执意要去，父亲只好同意了，那六个妇女都对我骑马背枪十分好奇，我尽量装成一副大人的样子，好让她们瞧得起我。

我们护送到方正南井子王家，就往回返了。

我们往回走的时候，天就不早了，当经过草皮沟时，突然在左侧的树林里响了一枪，我哥哥叫我快下马，我往下一下，手搭在马鞍上，这时又响起了一枪，子弹从我右侧肋部穿过，并打在马肋骨。我负轻伤，马的肋骨被打折了。哥哥飞快地跑过来撕开衣衫给我扎上。这时，打埋伏的土匪早就不知去向了。

大罗勒密西山救李杜

四月将了，我的伤好了，山外也不太紧了，我随全家及另一些人回到了大罗勒密，刚刚安顿下来没有几天，由方正又开过来一股兵，是大汉奸于琛澂的兵。一时间大罗勒

密又不安稳了，人们纷纷往山里跑。我们也进了山。那次父亲把三十多弟兄拉进山里。几乎是同一时间，李杜的二十四旅也由依兰开过来了，还带了两门炮。李杜部队进驻大罗勒密时，于大头的部队也由方正开过来了。李杜在大罗勒密没找到父亲，便派人进山给我父亲送信。父亲接到信后，对母亲说："老李提前过来了，我下山碰碰头。"他告诉哥哥不要乱动，回来听消息。我想跟父亲下山弄盐，母亲不叫我去，可父亲同意了，给我使个眼色，我便高高兴兴跟着父亲下山了。

当我和父亲走到转山子时，忽听到大罗勒密西山一带枪声响成一团。父亲的脸色一下变了，马上对我说："你快回四棚，叫你哥哥把队伍拉出来！"我来不及说啥就打马跑回山里，报告情况后，哥哥把三十多弟兄带下了山。

大罗勒密西山一仗是李杜与于大头的遭遇战。原来于大头事先得到先头部队的报告，说李杜开过来了，于大头把队伍在西山摆开，要打李杜的突击。结果李杜没等给我父亲送信的人回来，便拉起队伍向西开去，正中了于大头的埋伏。战斗一开始，李杜就处于不利情况，于大头的装备优于李杜，而且又是伏击，所以战斗打响后，李杜的阵势就乱了。我们听到枪响时，战斗已进行了一个时辰，于的部队有日本人的一架飞机空援，这越发使李杜慌乱了。

哥哥将队伍带出以后，父亲领着人在南侧冲上山去，这时只见死人遍地，人喊马嘶，父亲在乱兵中找到满脸灰尘、嗓子都哑了的李杜，指挥弟兄们对于部来了个反冲击，父亲的人枪头都很准，所以一个反冲击就把于部的人压了回去，接着抢占了有利地形，把李杜的人接应了出来。取得暂时优势后，李杜被接出战场，给养也扔了，两门大炮也不知去向。我父亲领着李杜往南撤，把他送到刘陈小站，即现在的一面

坡附近。

四天以后父亲带着人回来了，他瘦多了，脸色很难看。他摸着我的头说："这一仗也亏你送信及时，你哥要晚来一会儿，李杜也就完了。"说着便拿出一支小手枪给我，我高兴极了，连忙接了过来。父亲又拿出四十粒花生仁大小的子弹。小手枪，其实好看不实用，哥哥说那玩艺儿只能给人搔痒痒。父亲与李杜分手时，李杜命令父亲设法把丢失的两门大炮找到。父亲回来后，在大罗勒密真个把那两门炮找到了。于大头大队过去后，看炮的人没来得及把它们弄走，就让我们劫回来了。那家伙又笨又重，父亲命令把炮栓、炮镜卸了下来，使那两家伙成了废物。

拒于兵哥哥受骗

自送走李杜以后，父亲显得非常苦闷，他对我们说："中国人真败类，日本子还没来，自己就跟自己干上了，还能不亡国！"他当时还不知道于大头是汉奸。

我回到大罗勒密大约三、四天光景，父亲去江北了。这时于大头的兵又窜回来一股子，当时街里只有哥哥十几个人。于兵进街后，我们全家和一些老百姓退到西街的一个大营里。哥哥他们作战很勇敢，于兵从早晨开始进攻，一直打到中午也没打进去。战斗很紧张，哥哥他们守在营门一刻也不敢离开，午饭顾不上吃。母亲和嫂嫂焖了一锅小米饭，由我送去，弟兄们轮班吃饭。于兵打不进去，狂喊乱叫："姓郑的要不把炮栓、炮镜交出来，就血洗大罗勒密！"。原来他们来取炮栓炮镜的，尽管他们狂呼乱叫，哥哥他们也不理睬。于是他们就放起火来，点燃了五十来所房子，一时火

光冲天，浓烟滚滚。他们又把跑不出的老百姓抓了五十来个，其中有商务会长，押到大营门口，对哥哥喊："姓郑的，你再不交东西我们让这些人死在你的眼前！"哥哥对他们说："炮栓和炮镜是我爹放的，我不知道，你们先把人放了，等我爹回来拿。"

于兵不答应，威胁哥哥："不交东西就杀人，要不你小子就出来抵押。"哥哥为了保护群众，对他们说："说话算数！"于兵说："那当然！"哥哥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哥哥出去后于兵便把他捆了起来，随后一忽啦都攻进了大营。哥哥见受骗，破口大骂，一个小子抽了哥哥一马鞭："你小子不用嘴硬，到时候有你好看的！"

剩下的弟兄们一看哥哥让人抓了，怕反抗伤了哥哥，只好让人缴了枪，那些家伙进营以后大抢一气，接着押着哥哥直奔三家子去了。

哥哥被抓，母亲和嫂嫂急得又哭又叫，郑国臣和郑广祥立时去江北找我父亲。母亲忽然想起了地面活人孙三爷（孙仲和）和父亲相好，便叫我快去找他，当我找到孙三爷的时候，天也快黑了。

哥哥被押到三家子以后，就被毒打一顿，孙三爷赶到后讲情，于兵有个连长根本不给面子。孙三爷急了，说："弟兄们混地面要留后路，这年头谁的脑袋也不是铁打的，老郑只这一个儿子，要有个好歹，郑炮让你们出不去三家子。"这帮家伙也知道我父亲的厉害，核计了一会儿，觉得不如送个人情给孙三爷。孙三爷给了那个连长一包烟土，他们就把哥哥放了。

进　山

1932年，日本子进了大罗勒密街。汉奸们忙着建立伪政权。父亲名声大有人有枪，大罗勒密的头面人物想把父亲拉出去为日本人效力。父亲当时心情很烦燥，骂日本人、骂没有骨头的中国人。母亲劝他要注意身体，想想这个家。可父亲说："连大家都没有了，还有你个小家！他妈的，要么干，不干就得当奴才，中国人不能忘了祖宗！"原来父亲正要起事。

那年秋天。父亲事先把我们安排到陈家亮子老贺家，让我照料母亲和嫂嫂，那段时间，父亲身边总离不开广祥和国臣两人，张信的父亲张文修也经常和我父亲碰头。他讲什么事都很神密，我心里既害怕又高兴，总觉得要发生一件大事情。我哥哥那年十七岁，长得象我父亲那样壮实，我们哥俩一有工夫就在柴棚里练枪，我们比赛闭着眼睛看谁的枪装卸的快，当然我比不上他，可我闭着眼睛也能装卸。

父亲起事了，拉起三十来个弟兄进了山。父亲起事的第二天，张文修到陈家亮子告诉了我们，要我们不要动，特别嘱咐哥哥要保护好我们的安全。我和哥哥又害怕又高兴，母亲可整日愁眉苦脸。几天以后，我们就听到人们风传：郑炮反啦，打死了日本人，拐了枪，日本子正四处抓他呢。这些消息我和哥哥知道，不敢告诉母亲。母亲和贺老太太整天祷告，咒骂这个世道。嫂嫂那时身体已经有病，生孩子时又经几次折腾，把身子弄垮了。

哥哥自得知父亲的消息以后，老是不安心，可又担心这边出事，他总盼着山里来人，我和哥哥一个心眼恨不得一下

子飞到父亲的身边。

天气凉了，终于有一天父亲打发广祥哥哥来了，他对母亲说："二大爷怕你们在这里出事，要我领你们快进山。"我和哥哥一听可高兴了。母亲担心嫂嫂身子不好，又担心哥哥的孩子幼小，她想把嫂子和孩子留下来，哥哥不同意，怕万一出事连累了贺家，嫂子也愿意进山，说要死要活要在一堆，贺家老奶奶想留也留不住，不住地掉泪。当时贺家四胖子（即何永详，后参军改名何畏）非要跟我们走不可。我记得他那年只不过十多岁，长得虎头虎脑。我们和他相处的很好，以姐弟相称。他很服哥哥，有点不服我，因为我是女的。他早就发现了哥哥有手枪，眼馋得要命，我的枪没让他发现，怕他要。我们要走了，四胖子和哥哥难舍难离，哥哥答应给他弄支手枪，两人拉钩起誓，象那么回事似的。

那一天夜里，我们一家依依难舍的告别了何家，进山了。

在深山密林里

父亲的底窑在南山沟里。我们一见面，父亲就说："这回好了，你们来了，少了我的牵挂。"

母亲对哥哥和我不放心，父亲说："犊子和代小得闯一闯，这年头不吃冒烟的家伙怎么行。"但母亲说什么他不放我，父亲只好同意我在她身边。我怕母亲掉眼泪，也不敢太逞强了。

父亲将我们安整好了以后，就带着弟兄们接二连三地下山。有时一出就是几天不归。当时往山里运粮食困难，都是用人背。为了节省用粮，我和嫂嫂出去拣木耳、蘑菇，回来

掺上少许苞米面充饥。因为不舍得放盐，（当时盐很宝贵）有一股子邪味儿。

进山大约半个月左右，父亲从山外弄来两捆大枪，枪都生了锈，大约有二十多支，我们娘几个用破布擦。又呆了几天，队伍全拉回来了，有四十来人，带回一些粮食、衣服、子弹之类的物品。队伍进山，除了练兵就是开会。在密营七、八里地的地方都放了卡子，外人很难进来。那段时间哥哥好象长成了大人，，有一支很亮的大枪，父亲的贴身警卫仍然是广祥和国臣，哥哥也在他身边。

阴历九月份，天气一天天冷了，可弟兄们大部分都没有棉衣。一天父亲带人背回一些棉布和棉花，几个弟兄背来一台缝纫机，母亲一看机器就埋怨起父亲来，原来这台机器是我们家的，临走时寄存在一个姓曲的人家。父亲对母亲说："以后你们娘几个就赶棉衣吧。"嫂嫂在家学过裁剪，由她裁剪，母亲缝纫，由于活多，从不拿针线的我也拿起了针。几天后，父亲又领来两个妇女，一个姓孙、一个是大环子姐，这样，一个山里的小被服厂就成立了。

交十月，山里冷了，父亲他们活动的更紧了，有时一连十几天不回山。我们娘几个连那两个妇女盼着队伍回山，因为粮食不多了，弄不好就得饿死。为了省粮食，我们分头出去采蘑菇充饥。那时嫂嫂有病，孩子要吃奶，让嫂嫂好多吃点粮食，可她怎么也不肯，我们急了，她才比我们多吃一点儿。

落第一场雪的时候，父亲拉着队伍回来了，有几个挂花的弟兄。这明情是父亲他们打了仗，看父亲阴沉的脸，我们谁也不敢问，默不做声地为伤员洗伤口，包扎伤口，背后我问哥哥，他才告诉我，父亲是和于大头的队伍碰上了，他们

还是为炮栓、炮镜的事来的，父亲已将那几件东西沉到黄泥河子里，永远也找不到了。

那天晚上我们吃了一顿饱饭。饭后，父亲在另一个大棚里给弟兄们开会，我也凑了过去，站在门口一旁偷听，只听父亲火气很大，说："干这个就得把脑袋掖在裤腰上，怕死就别干，愿下山咱老郑不留，别他娘见硬就往回缩。要回去也没你的好，除非投日本子……"父亲的话说了很多。我看见弟兄们对父亲的训斥都很服气。但我发现了一个意外，给我父亲当差的广祥和国臣不见了。我连忙告诉母亲，母亲问哥哥。哥哥说，他们另有任务。后来才知道广祥被安排到下边当底线去了，国臣跑了交通。

我们在山里过冬了，这一冬我们吃了不少野物。大环子姐和姓孙的大姐回到大罗密去了。

取 子 弹

1933年春，树叶抽芽以后，父亲他们活动起来了，经常出没方正、依兰一带。日本人几次与父亲的队伍较量都吃了亏。父亲的枪法好，其它队头都服他。只要打日本人，他都一样看待。如果小帮胡子祸害老百姓，那他决不客气。有些胡子叫他郑不开面，日本人叫他郑老虎。

我要求参加部队，父亲同意了，说："你年岁小，打仗不行，你就给咱队伍跑联络吧。"实际联络就是以后所说的交通员，我的任务是下山与郑广祥接头，地点在南胡家沟的小树林里，

郑广祥的接头人大约是张文修，张文修与街里还有联络，我是最后一个接头人，叫"三级站"。这些工作都很保

密，不准乱打听，但我心里明白。由于我是个女孩子，装成挖菜的可以随便在野外出入，不被人注意。短短的时间内，我就从广祥那里取出两次情报，三百发子弹，四十斤盐，我也从山里带出一百两大烟土交给了广祥。因为这些东西是用大烟土换来的。

记得那是四月中旬，街里的交通买出一千多发子弹，已经运到杨三爷的家里了。广祥通知山里以后，哥哥带着三个弟兄和我下山，哥哥他们埋伏在东岗下坎的小桦树林里，由我装成挖菜的孩子去杨三爷家里取子弹，头两次很顺利地送到了哥哥那里，第三次我从杨家出来，就发现身后有几个人跟上了我，一看不象自己人，心里有点发毛，加快了脚步想拐进树林，那几个人见我要跑，拔出短枪就追了过来，边追边叫："站住，不站就开枪啦！"我飞跑起来，一声枪响，我觉得腋下象火筷子烧了一下似的，一跟头摔倒了，筐里的子弹翻了出来。我一急，翻身抽枪，对着前面的一个大个子开了火，枪响了，只听那大个子妈呀一声，其余几个都趴到了地下，骂我："妈的！小女胡崽子好厉害！"这时哥哥他们冲过来了，连连开枪盖住了五十步以外的几个特务，把我接了出来。这次我面对面与敌人开了枪，可惜没打中要害。其实那小五风子手枪根本就没有杀伤力，除非在三、五步之内。我的腋下让子弹擦了一条，但不重。母亲疼我，埋怨父亲。而父亲却满不在乎，还说，"咱老郑家坟地风水好，将来准能出息个花木兰。"

此后，我下山再也不敢大意了，听广祥说：挨了一枪的那个家伙到处讲，说一个小女胡子崽会使双枪。我听了觉得十分好笑。

落脚杨家

这一年，父亲的队伍越来越大，集中起来有一百多人，街里的日本和汉奸多次在父亲手里吃亏，父亲有时也汇合起几个队头，数百人攻打街里，有时“绑票”①。这一年里，大罗勒密抗日斗争非常红火，村屯的老百姓都觉得日本人在老郑手里玩不转了。

这一年的冬天，仗越打越厉害了，大罗勒密的日本军和汉奸队伍专们对付我父亲。傍腊月时，父亲对母亲说：“东洋鬼子要和我拼命了，治死谁不准定，你们在这里也不是个长办法，万一日本人搜山，你们怎么受得了。还是到依兰杨五家躲一躲吧。”关于依兰老杨家的事听父亲讲过。民国十三年快马杨五的两个孙子杨忠、杨孝被胡子绑票，是父亲救出来的。杨孝认父亲为干老儿。杨孝即杨超石，现在在中央冶金部工作，虽然我们与杨家关系特殊，但是母亲不愿离开父亲和哥哥，所以母亲一听就哭了。我要求留下，父亲说：“代小还是跟你妈妈去吧，照顾你妈和你嫂子。”他又对母亲说：“到杨家以后，跟他们学学配药，队伍上少不了要用的，以后我会打发人找你们的，不打走东洋鬼子，过不了消停日子。”

一天夜里，我们和父亲分手了，母亲眼睛都哭红了。我们坐着爬犁，父亲一直送出山口，临分别时，他一再嘱咐我要照顾好母亲和嫂嫂，并对护送我们的哥哥和郑军说：“遇上帮子②就报我的字号。

①将地主或奸商抓起来当人质、用钱来赎、是筹军饷的一种手段。

②指大股小股的武装土匪

我们一路风寒赶到了依兰，路上也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天亮时分，到了杨家，杨家一家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杨家一家四口掌柜的叫杨忠，和他母亲、妻子陈凤英，十几岁的儿子杨孝。

哥哥安顿好我们后就要分手了，母亲抓住哥哥的手左看右看，泪水直流，她嘱咐哥哥一定要照顾好父亲，要关照自己，打仗要小心。嫂嫂抱着孩子，早已泣不成声，在那个年月里，亲人分别意味着什么，谁心里都明白。临走时哥哥把我叫到一边，叮嘱了我一番，然后对我说："爹的意思是让你学会配药，还让我把那玩艺带回去，你要那没用，出了危险不说，怕连累了杨家。"哥哥指的是手枪，我舍不得给他，但一想到要连累杨家，也只好交出去了。

肖石嘴送药

这年腊月，我们母女在依兰快马杨五的家里落户了。为了掩人耳目，我更名孙秀清，从此就跟着杨忠的母亲学习配制黑红伤药。快马杨五的黑红伤药是祖传秘方，向来是舍药不舍方，但是对我却是例外，于是我做了她的徒弟。

1934年春，父亲打发张文修找我们。张是裕方公司的把头，父亲好友，是跑交通的，绰号叫"张拉杆儿"。张文修告诉我们，父亲参加了李延禄的抗日队，哥哥跟李延禄部队走了。张文修又对我说："你父亲让我转告你，老杨家就是老李抗日队的秘密联络站，任命你为交通员和情报员，你的任务是负责药品和情报，接待咱那边的来人，千万千万要保密。以后需用药品，那边来人通知你。另外，依兰也有咱们

的底线人，以后会和你接头的。”

接到张文修的这个通知以后，我非常高兴，悄悄地对母亲说了。母亲很担心，怕我出事。

四月，有个老头来杨家找我，告诉我那边来人了，叫我带上药品马上去肖石嘴子接头。那天我挎了个筐子，装成挖菜的样子，筐子底下放了十料药，※上边盖着笼布，从火神庙绕出城，顺着江边往西走就是肖石嘴子了。

来到肖石嘴子。四处观望，突然从柞树棵子里钻出两个人来，把我吓了一跳。一看认得，一个是郑军叔叔，另一个人是父亲队伍上的，姓李。见了来人我乐坏啦，郑军叔叔收好了我带去的十料药，告诉我："父亲参加老李的队伍是共产党管的。"我那时不明白什么是共产党，觉得很新鲜，我问，"共产党？多大年纪？住在哪？"郑军叔叔和那人笑了，告诉我：他也弄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接着他又告诉我父亲打仗的一些情况，最后说："你哥哥出息了，当了一个小官儿。"

我把我们母女和杨家的情况告诉了郑叔叔就分手了。

依 依 惜 别

在杨家的日子里，我和杨孝、杨忠哥俩相处的很好，亲如姐弟。那时杨孝在学校读书，我发现他有时早出晚归，行动很反常，有时和一些同学们似乎在研究什么，实际上那时他已经参加了抗日组织，只是瞒着我，我的身份也瞒着他。但是，杨孝曾发现有人来找我接头，他心里也很明白，但彼此都不说破，这是当时搞地下工作的纪律。

那一年，依兰城内非常混乱，日本兵，特务满街窜，稍有

※一料药为二十五包、每包为一副。

嫌疑的就以“反满抗日”的罪名抓起来坐牢杀头。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杨孝突然离家出走了。那是一个夜晚，杨孝从外面回来后，来到自己的妈妈面前，说：“妈，我要走了，什么时候回来不一定，由我哥哥抚养您，您不要想我！”这突然的消息叫老太太怎么受得了，顿时老太太就哭晕了，杨孝与他哥哥以及我妈一一告别，然后离开了家。一切都来的突然，我母亲和杨孝的母亲泪眼相对，咒骂那个万恶的社会和日本人。

杨孝走后的第二年春天，我接到一个通知，说依兰南东三家子有人要找我去接头。我以为是父亲那边来人了，连忙赶到那里。想不到竟是杨孝兄弟。我惊喜万分，说：“你……”他一摆手，说：“什么都明白了就不要说了，我这次路过这里，怕回家叫妈伤心，打听一下家里的情况。”我把家中的情况告诉给他，他又问我，“你爹和哥哥现在怎样？”我说：“他们还在大罗勒密。哥哥跟着李延禄的部队走。”他沉吟了一下说：“你现在还干那个么？”他指的是送药品。我点点头，他说：“往后的形势紧了，可千万得注意。”我告诉他：“那边早就把你家里做为地下联络站了，我早没和你说。”他笑了，“我很早就明白，不该问的我也不问。”

这次与杨孝见面很匆忙，我们又互相叮嘱了一番就分手了。

兄 妹 相 逢

1935年春季，父亲派人通知我按老地点送药。我携带了二十料药，上面盖着野菜。这回我由北门出去，一到江边儿就发现身后有两个人跟着我，我急中生智，顺着江沿往上

走，蹲下来把筐沉在江水里，装做洗菜。两个家伙到我跟前看看我就走了。

丢了药，我心疼地流了泪，心想父亲还不知怎么着急哩。回家后一打听，才知道那俩家伙是依兰出名的日本特务，一个叫宋有，另一个叫王秀峰。

阴历五月，嫂嫂病故了，扔下一个三岁的女儿，我和母亲哭的象泪人。多惨哪！嫂嫂临走的时候不停地呼唤哥哥的名字。

七月，哥哥派人来了，叫我明天早带着药到江西西甸子老李家，说有个手缠纸条的人接应你。听说哥哥来了，我们母女又悲伤又高兴。第二天一大早，我腰里缠着药渡过了小江子，刚上岸，只见一个手缠纸条的人向我走来，见暗号我知道是自己人，一说话，才知道他是朝鲜族人，汉话说的不太流利。他自我介绍道。"我的姓索，是参谋。"

他领着我往西走了大约七、八里地，在公路南一里多地有几户人家，把我领进一个大院，进门一看，院里多是十四、五岁的小孩子，手里都有枪。其中两个孩子顶多有十来岁，还流鼻涕哩。这时哥哥从屋里出来了，哥俩见面，想起我父亲身边无人，想起嫂嫂的惨死，我扑在哥哥怀里哭了起来。哥哥半天没说话，把我领进屋里后，开始询问母亲、嫂嫂和孩子的情况，我一一哭诉了一遍。我哀求道："妈想你和爹，要见见你。孩子会说话了，可是还没叫你一声爹呢！"哥哥的眼圈红了，说："好妹妹，我也想妈和孩子，可眼下任务在身，一刻也离不开。等赶走了小日本，咱们再团聚吧！"

我指着院里的孩子问："这些孩子是怎么回事？"

哥哥说："这是从大黑背学校领出来的，新成立起来的

青年团※，准备从这里过江集训。”

我把药品交给哥哥后，说：“我想回大罗勒密看看爹。”哥哥说：“你不要回去了，爹在山里，你找不到，再说妈也离不开你，你的身份和任务不允许你离开依兰。”

我忽然想起四胖子来了，问哥哥：“四胖子现在不知怎么样啦？你给弄到枪了吗？”

哥哥说：“四胖子参加了队伍，出息啦。”我一听，不服气地说：“早晚我要找首长，在这干没意思，再不你把我的枪还给我。”

哥哥生气了，说：“你的工作不需要武器，等以后归队给你支好枪。”

我不再说什么了，告别哥哥以后，向西小江沿儿走去。我登上高处想休息一会儿，忽然看到城西的鬼子兵营开出来七、八十个鬼子，再往南一看，神庙寺南面停着几条船。我知道情况不妙，连忙往回跑，见到哥哥后报告了这个情况。哥哥一听，马上集合起队伍，向南山撤走了。我随后也离开了那里。

后来才听说，就在哥哥他们离开不久，日本兵果然扑向那里，结果连个人影也没看着，就把那家的房子给烧了，在回来的路上把一个卖豆腐的老头给抓住了，说他是“胡子”的密探，杀死在小江西沿儿的西坡上。

对青山报信

七月将了的时候，有一天的夜里，杨家突然来了一个人，没留姓名，是个大高个儿，三十多岁。他通知我：你父

※ 黑背，地名，在桦川县，是金矿。有大小黑背。

亲带着队伍过来了，驻对青山一带，要你明天去老 地 点 接头。

第二天我腰里缠了些药品，又去肖石嘴子，在那里接头的是郑军叔叔。他对我说："你父亲去西风沟开会去了，准备在这一带活动几天，要你们不要乱动，他要去看你们。"

我心里很高兴，把哥哥的情况告诉了郑军，郑 军 说："我们好长时间没见到他了。"

我交了药品往回走的途中，忽然碰到了老许四叔，他叫许世年，是父亲的老朋友。许世年问我干啥去了，我告诉他父亲来了，驻在对青山一带。许世年一听，连忙说："我得到一个情报，明天日本讨伐队就要到西山一带讨伐，我这是给九军报信去，你马上去对青山找到四军的人，叫他们有个准备。"我听说后，急忙向对青山一带走去，在唐相家里找到了郑军，把许世年的情报转告给他。

第二天，对青山一带发生了一场激战，那是四军与九军联合打的一场歼灭战，毙敌七十余名，得了不少枪支弹药。

我们在家安心等待父亲，结果没有来，我们知道父亲又转移了。

送 子 弹

对青山战斗以后，紧接着又听说靠山屯发生了战斗，满城风雨，说日本军消灭了不少"胡子"。我们担心父亲和哥哥他们，那边也没有信。

一直到了冬天，有一次我去小江子背冰块，忽然遇上了李华堂，他穿着大皮袄，身后不远处有两个人。他见了我很

高兴，叫我的小名说："代小，能不能给我弄几料药来？"因为他那咱也抗日，又和父亲打交道，我很痛快地答应了。第二天我把药送到指定的地点，他亲自收了药，还夸了我几句。我问我父亲和哥哥的情况，他说："摸不太准，日本子太凶了，不一定转移哪去了。"

后来又在孙家船口给李华堂送过一回药，大约是在转年的春天。以后再没见到他。

1936年2月，有一个人在杨家找到了我，自称是我的上级。那人大胡子，有四十来岁，山东口音。他说："在城里弄出一批子弹，明天要运出城去，在肖石嘴子有人接应。"我问："子弹放在什么地方？"他说："放在魁星楼。"魁星楼是座庙，当时庙里有个和尚叫红慧，会治疗毒痈肿，很有名。那人说："庙里有头戴毡帽的人与你接头，暗语是：怎样敬神？答：要心诚。"

接着我们研究了送子弹的具体方法，然后就分头准备去了。

当时住在杨家东厢房有个姓梁的老头，成年赶马车拉破烂和垃圾，外号梁马车，依兰城里都知道有个梁马车。第二天我对梁马车说："昨天我去魁星楼，红和尚攒了不少破烂、垃圾，要你给拉出去，这是给你的工钱。"我把十张一元的绵羊票子递给他。老头很高兴，当时十元绵羊票子两天挣不来。

梁马车把车赶到东门以南的魁星楼，我事先去和那人对上了暗语，接了头，梁马车来到以后，那人帮着把一堆臭哄哄的垃圾装上车，然后将一个破麻袋包塞到了底下，梁看了一眼，也没说什么，就赶着车走了。

我让梁马车赶着车出西门，梁问为什么出西门，我说只

出管赶就得了。谁都认识梁马车，所以无人盘查。我们俩人远远地随着，就这样把八百来粒子弹送了出去。出城以后，西江沿儿早有人接应，很快就将破麻包取走了。

回来的路上，梁马车问我麻包里是什么，我说是子弹，老头一听，当时就把脸吓白了。

码 头 送 药

四月，那个自称是我上级的人又找到了我，他夸我干的不错。他告诉我：他叫刘镇东，是四军安排在依兰的交通员。他不准我找他，有事他来找我。他将一笔经费交给我，说是四军转交的药费。

后来，我与刘镇东又在火神庙、神社寺接过两回头，交换过工作情况，他从我手里又拿出去二料药，此后就再也没见到他。

1937年的7月间，我们终于盼到父亲的人来了。来人是广祥哥，我们母女一见到他，恨不得要他一口气讲完我父亲和哥哥这段时间的情况。广祥告诉我们：父亲是营长了，哥哥在大部队。父亲这段时间和日本人打得很凶，日本人拿他没办法，就花钱买他的人头。我们仔细询问了大罗勒密亲属的情况，和父亲一次次打仗的细节。广祥说："日本子进山都靠中国人领着，那些山林部队都怕老连长的枪头，枪一响他们先跑，结果还是日本人吃亏。"

广祥哥这次来给我们带来了喜气，母亲打算秋天回去看看，我也打算参加部队去。广祥哥最后告诉我："明天码头有人和你接头，还给你们带来一笔经费。这人是个女的，手脖子系块手巾。"接着他告诉了我接头暗语。广祥哥没有停

留，说是有别的任务，就匆匆地走了。

第二天，我腰缠七料药，装成送人的样子，来到依兰码头。在人群里，我果然发现一个年轻的圆脸妇女，手上系着一条白手巾。我凑了过去，悄声问："大姐，今个儿是七月几？"只见她眼睛一亮，仔细地打量了我一下，轻声说："七月初七。"说着就向厕所那边走去，我跟过去，高兴得不知怎么才好。她转过身，笑着对我说："我和你父亲在一起，你就叫我安大姐吧！"，接着她将一笔钱交给了我，我将药品交给了她，我们俩人亲热的了不得，最后她说："咱们以后还会见面的。那边的伤员要我感谢你！"我激动得一把抱住了她，流出了眼泪。

我们从厕所出来后就分手了，从此我盼望还与她见面，结果再也没有见着。

与父亲最后一次相见

1938年，几乎一年都是在恐怖中度日，没有消息，没人接头，母亲又在这一年患了重病。

五月，母亲病重，日夜念叨我父亲和哥哥。六月，张文修来了，母亲见到他象见到了亲人，拉着他的手流泪不止。张文修告诉我们，现在形势比头几年不同了，日本人加了兵，天天进山讨伐，有不少队伍往边界转移了，犴子也走了。老连长走不走还拿不准，要我来看看，要你们安心等着。他想要代小跟我去一趟，爷俩见见面。母亲听了张文修的话，点点头叫我去。我是在小罗勒密一家姓李的老太太家与父亲见的面。和父亲多年不见，冷丁一见说不出是悲是喜。想起这么多年父兄、母女分离，含辛茹苦，东奔西逃，想起嫂嫂的

惨死，幼小的侄女，病重的母亲，我一头扎进父亲怀里痛哭失声。父亲用手抚摸着我的脑袋，眼泪吧嗒吧嗒往我脖上掉。

我向父亲述说了这许多年的母女遭遇，父亲默默地听着，最后父亲对我说："你是好孩子，为抗联办了不少事，你要知道，不打走小日本，没咱的好日子过呀。回去好好侍候你妈，耐心等着吧。"

匆匆见面，又要匆匆分手了，老李奶奶为我煮了八个鸡蛋，含着泪装进了我的怀里。

与父亲就要分手了，我看到父亲那苍老的脸，心都要碎了。我万万没有想到，那次与父亲分手，竟是永远地离别了。

回到依兰以后，母亲日益病重，于六月尾去逝了。死前不住地呼唤父亲和哥哥。

隐蔽待命

八月，我忽然接到大罗勒密张文修的通知，要我立即转移，说李华堂叛变了，依兰杨家的联络站停止使用，要我等组织通知。

接到这个通知以后，我只好带着侄女转移到乡下，1939年的七月又返回依兰。九月，听说父亲在那边也牺牲了，由于没接到组织通知，不敢确信。一直熬到第二年的春天，仍然没有人来接头。我将侄女安排到杨嫂子家里，独自来到了大罗勒密。

回到大罗勒密以后，夜间摸到张文修的家，与广祥，国臣等人都见面了。那时，我确知父亲由于叛徒张永太出卖而牺

牲了。

我下了决心，一定要留在大罗勒密为父亲报仇，张文修对我说："你是老连长的亲女儿，敌人想抓还抓不到呢，仇我们一定要报，现在还不行。"在张家我们开了个会，研究了一下今后的工作，张文修本来就是我们领导，由他拿主意。他说："现在山里抗联都转移了，敌人的势力正强大，大罗勒密地下组织都不存在了，我们这些交通能保存下来就是力量，我们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隐蔽下来，等待上级组织与我们联系，只要咱们的队伍存在，组织上就不会忘了我们。"

根据那次会议决定，我还是回依兰隐蔽待命，一旦组织来人，由张文修通知我。

我在依兰一直隐蔽到1943年，一直听不到组织消息。夏天，忽然接到张文修的两次通知，说李华堂要在依兰抓人，要我快速转移，我只好领着侄女转移到哈尔滨舅舅家里，一直隐蔽到祖国光复才返回依兰，谁知祖国光复了，到处叛军闹事，我潜回大罗勒密与张文修联系上，研究的结果是：要继续隐蔽寻找组织。

回依兰后，我开始打听四军的情形，可谁也不知晓。那时又不敢公开暴露身份，只能是打听可靠的人，还不能特意问，象说闲话那样地试探。结果是一无所获，我彻底失望了，便转回了乡下，所寄托的一线希望是：接到张文修他们找到组织的通知。

捍卫新生政权

1946年，依兰正是民主建政时期，我们的政权在剿匪的步步胜利中建立了。在依兰城，我见到了离别多年的杨孝兄

弟，叙述了别后离情。在欢庆的日子里，我想起牺牲的父亲，那时不知哥哥也牺牲了，还盼着他回来。我们的鲜血没有白流，我们的工作没有白干，虽然找不到原来的老组织，共产党不就是我的上级，我的组织吗？

这年的六月，我由依兰返回江北，在横江的摆渡船上忽然认出了一个人，此人姓于，原是“九江”队的土匪。姓于的在船上正对一个姓赵的密议，（姓赵的我认识，他是八路军三连驻宏克利的一个机枪手），于说：“这边都妥了，就等你把这个（于比划抱机枪姿式）带出来了。”姓赵的低声说：“好吧，五天以后。”我当时吃了一惊，心想：我们的政权刚刚建立，人民刚刚要安定，这该死的土匪怎么老不死心呢？我怕他们认出我来，扭过脸去看江，待船拢岸以后，我二次坐船返回江南，赶到依兰政治处，把这一可疑的情况报告给任我军依兰队的政委的杨孝兄弟，杨孝当即采取了措施，抓获了“九江”队的土匪和宏克利那个姓赵的机枪手，使我们的新政权和人民免受了一场土匪叛乱。

历史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父亲和哥哥的鲜血没有白流，换来了幸福的今天。我为能在那个出生入死的时代做点工作而感到自豪。

（郭相声　整理）

“万昌队”战斗纪历

郑广居

编者按：郑广居，方正县德善乡莲花村人，曾任抗联团长郑万昌的警卫员。“万昌队”是郑万昌队参加抗联前的称呼。

1932年春，老连长带我们打大罗勒密。当时，大罗勒密的北大营驻守的日伪军有200余人，总指挥是日本指导官时毛。我们的部署是：刘营长带队从南进攻，引开了敌人火力之后，老连长便率队从东北打进去，从背后捣毁北大营。

战斗从半夜开始，部队一进攻，敌人就毛了。当我们冲进街里，敌人龟缩在北大营，用强火力阻止我们进街。由于刘营长没有冲进南门没有把火力引开，战斗持续到第二天上午，不得不撤出街里。这次战斗很失利，我们有十几人负伤，还有少数死亡。

1932年7月，在山里整休。接到山外来信，说日本子讨伐队向三道沟开去了，当时我们在一起有三个队头，100余人，我们“万昌队”40多人。我们决定伏击敌人，“万昌队”担任主攻。

我们抢先敌人一步到达三道沟。老连长变量了一下地形后，把队伍摆到山上，留一分部守山口。九点多钟敌人来了150余人，摆了三个梯队。我们以老连长响枪为准，他不开枪谁也不准乱动，让过敌人的先头部队，中间就是日本队，老连长最恨日本人，当即鸣枪为号，我们的全部火力一下子就集中到日本人队里去了，前后两股山林队连同日本人一下子炸了营。敌人很快组织起进攻部队向我们猛扑，我们居高临下，连连击退敌人两次冲击，把守沟口的部队也向进攻的敌人

开枪了，敌人将部队撤出沟子，临时占居了一个较高地形，与我们相持，战斗一直进行到下午，我们的侦察员回来告诉老连长，敌人的援队已经出发了，为了避免部队受损失，我们打了一阵排枪后便拉下山撤走了。

事后了解到，我们击毙日本人数人，山林队七、八人，打了一场漂亮仗。

1932年8月，交通员张文修来信，说方正来了治安队，与日军加在一起，约有50余人，正准备进山"剿匪"。当时部队到别的地方执行任务去了，家里只剩下十六七个人。对于这股子敌人打不打，心里没有底。老连长说："你不打他，他打你！"于是我们拉下了山。下山后，得知敌人坐小火车进山，我们便绕到大罗勒密南边的转山子西坡，准备伏击。

这个地方居高临下，山下就是一条火车道。9点多钟，小火车开过来了，见上面有敌人，老连长便开了第一枪。枪响见物，一个鬼子从车上滚下来。接着我们打开了排子枪。车上敌人嚎叫着，纷纷滚下车，伏在路基上向我们还击。老连长一看敌人火力挺猛，命我们撤退。这次战斗打死治安队4名，日本鬼子1名，我们没有伤亡。

时隔不久，老连长带着郑生和我，到大罗勒密去上"饷"。

那天我们化了妆，进大罗勒密在交通员张文修家里隐蔽。天黑以后，我们摸到大罗勒密东西两门，同时向街里开枪。街里的治安军、山林队同时涌到街外，向我们射击。他们把枪口抬得高高的，那里能打着我们，我又打了一阵，便撤回山里。

这是我们与治安军、山林队事先约好的，他们打枪是向日本人多报子弹数，与多的部分给我们，我们给他们钱，这就叫上饷。

果然，没出几天，张文修给我们送来了大批子弹。

1935年初冬。打大罗勒密。

我们四军游击连在沟里，与三军一师会合。一师师长常有钧，当时有50多人，都是打出来的硬手。当时我们连到外地去执行任务，军里还剩下20余人。常师长非常敬重老连长。老连长说：在三军这块地盘上，就和在家一样。常师长和郑连长核计了一下，就带着我们两支部队，约70余人下山了。

好象这次战斗很突然，下山部队直接插入大罗勒密东门，常师长和郑连长对我们作了战斗部署，要我们进街后从两路突击日军守备营，给他们来个奇袭。东门守敌只是几个当地兵，枪一响他们就跑了。我们与70来人在老连长的带领下一下冲了进去。随后常师长带一部分从东北角直插向日本军营，我们则从正面进攻。好象日本人早有防备似的，机枪火力交叉形成一道火网。街里的警察队，还有乱七八糟的兵打过来增援。战斗对我们不利了，为了避免伤亡，我们很快撤出战斗。这次冲击大罗勒密对敌人的打击很大，不久大罗勒密又增加了守卫部队。

同年，我们在山里接到了四军的命令，火速向依兰集结。郑万昌选了40余人拉下山奔向依兰。集结依兰的有三军、四军、七军、李华堂部等好几支部队。攻打依兰城的战斗打响了，我们连的任务是：在战斗打响以后，阻击守依兰县东大营日军守卫队，使其无法向城里增援。那次战斗从半夜开

始，第二天中午大部队攻进了依兰。在战斗中，东大营日军守卫队出击三次都被我们击退，我们也不进攻，敌军也休想出援，自大部队出城以后，我们与这股日军始终是相持状态。后来，听说日军驻通河、汤原的守敌派出了两股马队增援依兰，我们才撤出战斗返回大罗勒密沟里。

攻打依兰不久，我们连又奉命开到依兰马大屯整顿。当时在那里的有七军的一个连，三军一个营，我们四军一个连，总计有90余人，其中，我们连40余人。在马大屯刚刚汇合，就接到密报，说日军一个讨伐队由依兰向靠山屯一带出发。我们三支队伍火速赶到靠山屯。这个屯在马大屯以南、屯后是山，山脚下就是公路。我们把队伍摆在山上，决定给这股日军一个伏击。这次战斗以我们连为主，由郑万昌担任总指挥。等了很长时间，这支足有150人的日、伪军讨伐队终于开过来了，我们伏在山上静等郑万昌的枪响。敌人很狡猾，接近山下以后，就将队伍拉开了散兵线。郑万昌让过尖兵班，当队伍行走一半的时候突然开了枪，一阵排枪就打倒了20多人。敌人乱了一下子又很快组织了队伍，用机枪掩护向山上冲击。我们占据有利地形等敌人靠近了再打。击退了敌人第二次冲击的同时，我们突然来了个反击，把敌人压下山去。随后将敌人丢掉的枪支拣回山上。这样打了三、四次以后，最后敌人突然撤走了，我们怕中了敌人计谋，也把队伍撤走了。

靠山屯一战我们大胜，毙敌30余人，得枪30余支，打死日寇一个小官。

依兰战斗后，我们又参加了方正县南尤家屯的战役。

尤家战役是三、四、八军联合举行的，总指挥是三军师

长常有钧。

我们三支部队总人数大约为150人，尤家屯的日军大约200多人。

战斗首先由我们发起，从屯后冲进屯里，进行巷战。敌军在我突然袭击下，仓猝应战，为我击溃。

1938年，是抗联最困难的时期。各部队经由大罗勒密，或东或西进行运动。四军领导命令我们在此坚持斗争。大罗勒密的局势愈来愈严酷。敌人成立了自卫团，又搞了归屯并户，用以切断群众与抗联的联系。

7月，老连长带我们到三道通打警察分驻所，完成任务后，8月返回干饭锅，敌人还将干饭锅被服厂破坏，杀我一名战士，俘虏我三名女战士。老连长叫我去筹款营救同志，当我和郑广禄回来时，大约是冬天，走到得莫利，就听说老连长被敌人杀害了。

（郭相声整理）

大罗勒密沟里设卡歼敌

徐　春　林

1935年4月，抗联三军一团一连，驻方正县大罗勒密沟里。一天我们的密探得到消息，日伪军500余人，要来围剿我们。为了以少胜多消灭敌人，当晚就准备在长达五、六里的山沟里，放四道卡子，堵截消灭敌人，其中最后一道卡子是专门引诱敌人进沟，其中三道卡子随敌人进退情况而进退。

第二天拂晓，不出所料，日伪军直奔我们而来，黄呼呼的一片看去约是500余人。当敌人前哨部队发现我们明卡子时，双方就打起来了。为诱敌人入山，我们的明卡子就边打边退，敌人穷追不放，当敌人到了预定地点时，二、三道卡子集合起来，向敌人发起猛烈地冲锋。敌人知道中了计，就调转头向沟外撤，走出不远，又遇到沟口的卡子，一阵排子枪打得敌人蒙头转向，死的死逃的逃。敌人大部队往回打，我们的沟里卡子又堵上来，敌人乱成一团，这次打死日伪军100余人。随后，我们的队伍就转移了。

在抗日战争的岁月里

李 财

转战南北

我1912年9月19日出生在河北省永平府迁安县。八岁时，因家乡连年灾荒，随父母和三弟逃荒到东北九千五（现宾县胜利）、方正李家屯、达莲河长岭子落脚种地。“九一八”事变以后，庄稼人的日子更不好过。那时，我年轻气盛，受不了当亡国奴的窝囊气。1934年初沟里来了专打日本鬼子的队伍，我与弟弟李银离家出走，进山去找，在沟里跋涉了两天两宿找到了李延禄领导的抗日救国游击队，在金根团当了兵。1935年在四军一团一连当连长，跟随部队转战在勃利、林口、宁安、依兰、通河、方正等地，经历大小战斗数十次。

刁翎、林口战役。1935年7月初，我们四军与三军一团刘海涛部在方正大罗勒密会师，谢文东、李华堂等抗日队伍也相继到达。为庆祝四军与三军会师，军部商议进攻依兰县刁翎城与林口。会战决定兵分三路进军，四军在东北，三军在西南，李华堂部在南面，将刁翎城包围起来，谢文东为后援队。十六日上午十点钟左右兵临城下，敌哨兵发现后，便向我军开枪射击。军指挥部当即下达了总攻击令。只听一声枪响，我军四面出击一齐攻城。很快突破了敌人防

线，迅速占领了刁翎城，缴获枪支40余条，毙敌30多人，活命的鬼子向依兰逃窜。这次战斗后，我们挥师绕道南下进攻林口。我军到达林口时，林口驻军已于前日调援依兰救援刁翎去了，于是我军毫不费力的攻下林口，占领火车站。待日寇闻讯，调回林口驻军时，我们早已安全转移。

团山子战役。1935年冬，我四军在团山子屯宿营，接到日伪军要来进攻的情报。我们便与三军、八军联系，事先在三姓（现依兰）团山子给敌人布下了伏击圈。拂晓，敌人进入我埋伏圈，双方激战二个多小时，我军将士沉着勇敢，擒贼先擒王，击毙日军三个军官。于是敌人乱了阵脚，仓皇溃退。我骑兵乘胜追击，敌人狼狈逃至八棵树屯（去依兰团山屯约10华里）。我军接到抗日群众送信，败退日伪军大约有300—400人，准备在该屯吃午饭。为了全歼敌人，我军急行军绕道抢占东西山头，迂回包围。不久发起冲锋，很快解决战斗。我军获胜，敌人死伤10余名，缴获枪支、子弹甚多。

稗子沟战役。团山子战役不久，日寇西山大尉带领大批日伪军，拂晓从依兰出发，早上八点左右追到稗子沟，妄图和我四军决战。我军抢占山头，当日军进入沟中，遭我伏兵猛烈射击，当场击毙西山大尉。群敌无首，四处溃逃。我军缴获轻机1挺，三八式步枪30支，战马20多匹，子弹数千发。

依兰城战役。1936年初春，我军会同三军，拂晓由依兰南门进城，打死守门警察多人，在伪守备司令部那副官的配合下，很快包围了伪守备司令部，当场击毙敌人7人，其余全部俘虏，缴获全部武器弹药。战斗结束后我军与三军部队撤往江西马大南山，连夜过江，在北通河沟里道班岭整休。

道班岭伏击战。依兰城战役不久，我四军在道班岭整休期间，接到通河伪警察大队内线情报，日寇次日要讨伐沟里

抗日联军。郭海涛团长召集连以上干部开会决定，坚决回击敌人。我一团及三军一部分，埋伏在道班岭两侧山头，当日伪讨伐队进入埋伏圈后，我们放过警察伪军，郭团长一声呐喊，道班岭下枪弹、手榴弹四处爆炸，敌人血肉横飞，当场击毙日寇百余人，俘获80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战斗结束后，我军向通河老龙口转移。经老龙口时我军与日寇讨伐队相遇，拂晓开仗，一直打到中午十二点，双方死伤都很大，获敌100余人，我军一团阵亡10名，三军阵亡15名，其中我三弟李银战死在老龙口疆场上。

大罗勒密围剿自卫团。1936年春，我军由江北路家林子过江到方正大罗勒密开拓红地盘，在三军配合下，将大罗勒密自卫团孙凤和部70余人全部俘获，枪支弹药作了部队补充为进一步扩大根据地，我军一团与三军又进击方正得莫利自卫团，经半宿激烈巷战击毙敌人7人，其余全俘。

三道岗战役。1936年五、六月间，伪军贺团与日寇一个团共500多人，从依兰老集出兵，妄图在三道岗一线追歼我军。此时敌众我寡。司令李延禄率我四军迎敌。经一番激战后，敌人退回依兰。我转移到达连河。敌闻讯，又调集兵马，从依兰出兵追击我军。我们又在达连河伏击，打死敌人30多人，我军阵亡10人。

方正被捕

1935年，我军到依兰、勃利、方正开辟抗日游击区。我在郭德福五支队任连长。

1937年冬，日寇加紧对游击区根据地队伍进行讨伐，并将山沟里分散庄院、地窝棚全部烧毁，归并大屯，以割断我

抗联与群众联系。1938年初，抗联大部队化整为零在恶劣的环境中坚持斗争。我带领连队在方正县境内大、小罗勒密一带活动。由于没有给养、枪支弹药也得不到补充、我们连续几次派人去游击根据地联系军需，但派出的人都一去不复返。为了扭转危机使连队能坚持战斗下去，我决定亲自下山去找关系。

那是四月末，我把连队工作安排给副连长韩发，带了一支匣枪，奔抗日游击区，在元字号——伊汉通落脚，住在农民朱财家里。为了不暴露身份，我在出外活动时，把匣枪"插"在朱家。可是我"插"在朱家的枪被他西屋邻居、外号叫"蔡柳罐蛋子"的大烟鬼发现了，他向方正县警察署告了密。一天，我从百家长李万银家接关系回来，刚迈进朱家的门，就被敌人逮捕了。

朱财也和我一起被捕。我们共同被押在方正县警察署，分别关在象鸟笼子似的小黑屋里。我想敌人很快会进行审讯的，所以我就把当天发生的事情前前后后琢磨了一遍。我想，枪已落到敌人手里，这如何也否认不了，同时，我以前经常在这一带的游击区活动，引起过敌人的注意，看来身份不易隐瞒，尤其是在德莫利沟住过的昌莫星当了特务，他知道我的身份。我想既然落到敌人手里，就豁出来了。可是革命群众朱财因为我坐了牢，一想到这，我心里象刀割似的难受。于是，我决心兜揽一切"罪过"，拚死也要救朱财出狱。我开始推测敌人在审讯中可能要问些什么，盘算着应该如何回答。

第二天我被带进审讯室。刚进门就被按倒在地，扒下鞋，光着两只脚又被人架着。这是一间不大的屋子，房间一头放着木棒、皮鞭、水桶、老虎凳、手指粗的钢丝鞭等

刑具，墙上血迹斑斑，有些地方还粘着被钢丝鞭抽下来的人肉丝。一张方桌四个警察分立两边——都是警尉补，其中一个叫李海波，一个叫张瑞新，去朱家抓人就是他俩，他俩丁字步叉着，脱去了上衣，其中一个一手叉着腰，一只手里掐着皮带，另一个把脚蹬在凳子上。开始审问，两个警察装腔作势地问我：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地方住、什么职业等等。接着问，"枪是不是你的？"我坦然地承认了枪是我的。可是警察挑衅地问，你有枪是不是"红胡子"？我听了这个字眼非常生气，就一字一板地回答，我是抗日联军，是专打日本鬼子的！敌人本来就想给我个下马威，便气势汹汹地抡起皮鞭向我抽来。开始觉得头上、臂上、前胸、后背剧烈地疼痛，过一会儿，胸、背象撒上火炭似的难以忍受，我咬紧牙关挺着。开始还能听到两个警察呼呼地喘息声，接着感到头晕，好象在云雾中，声音离我渐渐远了，我牙关一松，就忽忽悠悠地晕过去了。

我从昏迷中醒过来，敌人接着审问，审问的内容更深入一步，问部队情况和部队在游击区的关系。如：部队组织情况、上级领导、部下成员、人员下落，我到伊汉通和谁联系、以前伊汉通的人谁和部队有联系等等。敌人够狠毒的了，用这种叫"爬蔓子"的招子，意思是顺蔓摸瓜，敌人想以我为线索捕捉抗联战士和抗日群众，从而扑灭抗日火焰。这些情况我知道，可是我不能说，我不能出卖组织和革命群众。所以就干脆一句话："不知道！"怎么问，我也说不知道。敌人看我什么也不说，阴险地看了看刑具说："你不说，我们有办法叫你开口！"说着就把我按倒在一条长凳子上，手和脚都绑在凳子上，又用一条毛巾敷在嘴上，然后往毛巾上倒辣椒水。我喘一口气就吸进一口辣椒水，这滋味是

我有生以来没有尝过的。一桶水很快地灌进肚里，凶狠的敌人用手按住我的小腹用力往上推，又用脚踩，顿时从口里、鼻子里流出水来，连眼角、耳朵、头发根都往外冒血水。我感到周身骨节剧痛，头晕眼黑，浑身有如火烧一般。就这样，敌人把辣椒水灌进我肚里，踩出来再灌，我昏过去又醒过来，再昏过去，整整折腾了一天，我不知道后来敌人是怎样把我弄回牢房的。

一夜过去，我从昏迷中醒来。我试着活动身体，忍着疼痛检查刑伤。这时我的前胸变成黑色，皮肤毛孔都苍起来了，手摸上去已无知觉，后背也无知觉。头上、脸上、胳膊上一条一块的血肿，有些地方皮肉绽开往外渗着血水。

两三天后，过第二堂，又是“爬蔓子”。这次审讯，敌人为达到目的，先进行攻心和威逼，软硬兼施叫我供出上司、下级人员和他们的下落，供出我到伊汉通要联络的人和伊汉通给抗联办过事的人。并引诱威胁说，说出来就放我出去，别自找受苦。我明白地回复敌人，即然落到你们手里，要杀、要剐，随你们便，我还是一句话“不知道！”残暴凶狠的敌人扒光了我的上衣，用鞭子抽，用木板打，用香烟头烧，又给我灌掺煤油的凉水，又折腾了一天，敌人还是一无所获。

方正警察署的拘留所条件非常恶劣。屋子又小又黑，空气污浊，墙壁和地面湿漉漉的，我受了重伤被扔在发了霉的烂草上。此刻，我心中惦念着部队，想念着战友，想到受自己牵累入狱受折磨的朱财。心里一再盘算着如何兜揽责任，让朱财出狱。所以在以后的审讯中，我一直坚持：是我用枪逼着朱财留宿和插枪的，如朱财不答应，我就杀他全家。由于我的供词，敌人又没抓住朱财的把柄，只好将朱财放

了。

我在方正警察署押了40多天后，被解到通河。

到通河不久，我被通河法院判有期徒刑十年，解到依兰监狱监押。

铁 窗 八 年

依兰监狱是伪满第五模范监狱，是一座典型的人间地狱。

我被囚禁的牢房，四周是青砖砌成二尺厚、一丈二尺高的围墙。向西开的厚重的铁门旁狱警的刺刀在阳光下闪着寒光。往里走一段路程，又是一处高墙，黑森森的大铁门用一个铁栓穿着，由一个看守看管。此门称作“二门”，通向牢房。牢房中央是十五、六米的中央楼，中央楼下层是六角形的大厅，六角形的每一边都有门。其中一个门是进牢房的便门，从此门去犯人的伙房和操场，其余五个门呈辐射形延伸，各连一条长长的胡同，胡同两侧是并排的十二个小牢房——组成一个大牢房。大牢房分恭、宽、信、敏、惠五个字号。每个胡同都一样，每扇牢门也都一样，每个胡同尽头都是厕所，其中唯惠字号牢房的通道尽头是监狱二门。这就是人们谈虎色变的依兰八卦形的监狱。

监狱当局对犯人看管极其严酷。夏天，每天只放一次风，犯人在操场上活动。冬天，也是每天放一次风，但不准犯人走出牢房，让犯人在大牢房内厕所轮流大小便。在牢房里，犯人不准起立活动，不备互相说话，不准吸烟。看守不时地从牢门上小窗口窥视，犯人如一稍犯牢规就会遭到看守的谩骂、训斥，甚至欧打。可恶的狱警对政治犯倍加虐待。

一次，看守王仁民看见我在牢房里补鞋，以我把锥子带进牢房违反狱规为借口而毒打我，竟残忍地用锥子在我头上乱扎，扎得我鲜血顺脸往下淌。

监狱非人生活折磨着犯人。饥饿难忍，吃的是发霉的玉米面窝头，绿色的发霉高粮米粥，里面还掺着砂子。夏天有时能吃到生西葫芦菜片和小白菜汤，但没有油。冬天没有菜，只能喝到有几个黄豆粒的豆子汤，很少尝到盐味。平时不准家属探监，家属按规定的时间探监又不许送吃的东西，即或打通狱警送些吃的东西，也要受到监狱多方刁难。我和弟弟李银参加抗联后，因父亲早已去世，家中只有母亲带着我的一个年小的弟弟和一个妹妹过着苦日子，哪里有钱打通狱警，母亲只能按着探监的日子来看我，每次都哭着回家。监狱认为危险的犯人都给带上脚镣，由于案情不同脚镣轻重不一。我带着十八斤的最重的铁镣，两脚踝骨上卡着两个粗铁环，中间用三个鸡蛋粗的铁环连着，走路抬不动脚迈不开步，只能两脚错着挪动。穿着裤裆开缝、系着布条的裤子。铁镣的铁环卡进踝骨上端的皮肉，汗毛憋在皮肤里成了一个黑窟窿。脚脖到膝盖之间皮包骨头，不过血，不论冬天夏天都象冰块一样凉。

犯人在这种的折磨下，身体衰弱极了，因此抵抗疾病的能力很弱，牢中流行着各种传染病和各种慢性疾病，夺去了无数犯人的生命，判重刑的大多数被送到千山、本溪等地去服苦役，也大多死在矿山的万人坑。抗联三军团长王座山被判十五年徒刑，不到三年就患胖肿病死在牢中。我从通河押解来依兰监狱时带着满身刑伤不能行动，由狱警抬着扔进牢房，没有送去服苦役，我是服长刑极少的幸存者之一。但是依兰监狱那种地狱般的生活使我得了肺结核、气管炎和

严重的胃病，苍老瘦弱得让人难以辨认，严重的风湿症一直在折磨着我。

入狱两年后，我的刑伤才基本好转，能较正常的活动。我多么希望能回到抗日部队参加火热的抗日斗争啊！一九四四年希特勒在第二次大战中失利，伪警察对我的态度有了明显的改变。我抓住狱警的这种心里，借金典狱长转勤之际提出了去掉脚镣，到伙房做饭的要求。金典狱长乐得做个人情，就向看守长徐忠海打听我的表现，徐忠海也借机做人情，说我表现老实。虽然小个子看守王仁民说我是“红胡子”不能做饭，可是大个子王看守等却从中说情。这差事总算定砣了。从此，我便在伙房做饭，虽然出不了牢房，但是不带脚镣，在牢内可以自由走动，并且能用做饭的机会尽些保护难友的责任。做饭时，我尽量偷偷地多下米，把饭煮熟煮烂，让难友们少遭点罪。我把从看守口中得到的日本鬼子在战场上失利、当地群众流传“满洲国”要跨台了等振奋人心的消息秘密地告诉大家，叫大家增强斗争信心，鼓励大家坚持活下去，度过黑夜等待黎明。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九日开始出兵东北。苏联飞机轰炸依兰后，伪政府瓦解，敌伪人员开始撤退，监狱看守也大都逃往各地躲避，只有少数狱卒留守在狱中。这时，我就组织动员狱中难友狱中暴动，砸开各牢门，关押了看守，砸开手铐脚镣，冲出监牢，迎接祖国光复。

（李有富整理）

忆钟伯圃

孙玉清

钟伯圃，原名钟怀远，山东省钟家楼人。抗联四军参谋，1936年牺牲在刁翎。我们于1935年相识，钟大哥离开我们已经50多年了。

那年我在小罗勒密河上游的阜济木材公司当把头。公司的业务，是采伐木头。经理叫朱坤，他是抗联的地下工作者，后为日本抓进监狱。我的工作地点是木场，即现在的曙光林场。木营从外地招来很多工人。

有天，朱坤给我送来一个人。此人大高个子，黑皮肤，大眼睛，说话一口山东腔。朱坤说："他叫钟伯圃。山东老家闹粮荒，活不了啦，到咱们这儿混碗饭吃，你就多照应点吧。"

从朱坤的话里，我感到他们中间有种特殊关系。我说："请经理放心好了。"

因为朱经理的关照，我叫他和我住在一起。白天一起干活，晚间一块唠嗑。他很有学问，什么秦始皇呀，万里长城啊，他都知道，我很佩服他。可是，我的帐房先生却不喜欢他。他说："把头这人挺大个子，抬木头，净抬小头。还压得里倒外斜的呢！打发他走算了。"

对老钟的看法不好，不但帐房先生，个别工人也对我反映过。不过，我不能撵他走。晚间，我对他说："大哥，我

们做木头的，全凭气力，靠嘴皮子不行呵！”

老钟一听，冷笑说：“你是不是要撵我走？老弟，别光听个别人的流言，你去听听大家咋说吧！”

我第二天到现场去，找一些工人唠这件事。他们都说老钟好，愿意叫他抬小头。帐房先生见我没听他的，以后再也不说咸道淡的了。

有天晚间，我悄悄问他：“钟大哥，我看你好象是抗联。”

他摇着头说：“不是，不是！”

尽管他否认他是抗联，可是从他对我的谈话中，什么生死事小，亡国事大，抗日救国，匹夫有责之类的话，我觉得他是抗联。我虽然是个粗人，耳闻目睹鬼子汉奸干的坏事，早就恨透了满洲国。所以，我们俩的关系一天比一天密切起来。有天，钟伯圃对我说：“我在关东孤苦伶仃，我看你挺好，咱们拜个干兄弟吧。”

我当然同意，于是我们拜了把子，他为兄，我为弟。从那以后我们就无话不说了。

他告诉我，他是山东省阳谷县钟家楼人，保定府军官学校学生。“九一八”后，他参加反满抗日斗争。1935年党派他到抗联四军工作，职务是参谋。至于他到大罗勒密来是什么任务，他没有对我说，我也不便问。

一天，他悄悄与我商量：“老弟咱们出去一趟不好吗？”我问他上哪儿去？他说上哈尔滨。我想一定有大事，就满口答应了。

我们到哈尔滨，住在临兴客栈。在那儿住了半个多月，我要回来，他说：“事没办完，怎么能回家？”这时，我才问他：“大哥，我们到哈尔滨来到底干啥呀？”

他说："找省委，通报满洲省委出了叛徒。"

至于谁是叛徒，他没说。

我在客栈呆着，他出去接关系。

这天，他兴致勃勃地从外边回来，对我说："好了。今晚6点半，去接头，你要老老实实在客栈等我，千万不要动，接完关系，就来找你！"

晚5点多钟，他去接关系，9点多钟，他回来了。没等我开口，他把我拉到一边说："快走！"样子很焦急。原来，在他接关系时，碰见了那个叛徒。他俩正走个照面，钟大哥很机灵，忙夺岔道跑回来。

在大街上，钟大哥郑重其事地嘱咐我："你回去告诉掌柜的，房间留着，咱们还住，晚上叫他给留门。"

我回到客栈，照钟大哥的话与掌柜的说了。

钟大哥领我进戏院子看戏，戏名《玉堂春》。戏演到12点才散。钟大哥说："这回我们回去吧。"

到临兴客栈，掌柜的告诉我们，10点多钟警察来查过夜。这时，我才明白，钟大哥为什么领我看戏。

从哈尔滨回到家，我问钟大哥："你说那个叛徒叫啥名子？"钟大哥说："叫朱善亭。"

朱善亭，我认得。他曾经在我们木营住过。

从哈尔滨回来，大约20来天，方正县伪县长景阳春，领哈尔滨警备司令部的警察，到我们这里抓抗联，我看到其中有个人，穿一身日本军服，大口罩把脸遮得严严的，只露两只眼睛。但我还是认出他正是朱善亭。我忙告诉老钟赶快走。他说他不能跑，要斗争下去。

这些警察在叛徒的出卖下，把一些地下工作者和抗日积极分子抓去了。其中有张景龙、孙耀武、吕公新、张焕然、

陈铁脚、老于头、钱贵彬等人。

事隔不久，朱善亭领两个警察，到我们住的棚子来。警察问钟大哥："你是不是叫钟怀远？"钟大哥很自然，慢声慢气地说："我叫钟伯圃！你们可能认错了。"

两个警察看看朱善亭，朱善亭好一会才含混其词地说："可能看错了。"

钟大哥这次侥幸。

特务走之后，钟大哥对我说："我得走了。"我舍不得他，但又有什么办法呢。他走的头一天，我们哥俩痛饮一顿，他说："现在要分别了，无物可赠，赠你诗一首。你要想我，就念一遍。"

那诗是：

男儿立志出乡关
事业不成不回还
白骨何幸埋故土
到处皆有葬人山

从那以后，他归队了，再也没有看见过他。

一九四六年光复之后，碰见曾在抗联的一个熟人，我向他打听钟大哥的下落。这人说，在一次战斗中，钟大哥率10几名战士与鬼子遭遇，退到刁翎一个土窑里，中了敌人埋伏，全部壮烈牺牲。

我现在都80多的人了，想起钟大哥总要掉泪。

（玄熙发整理）

孙玉清：1905年生。大罗勒密镇西南村老人。

范老在福德屯

葛 祥

我出生在延寿县太安乡，后搬到方正县永建乡张家床子北沟。1937年，鬼子并屯，把我并到福德屯。

我家东院住个烧炭的，名叫张殿有。他的几处炭窑在老许家西南山。雇了不少工人。工人中有个姓郑的，外号郑饭勺子，张殿有管他叫干老儿。

这郑饭勺子就是范景海，当时用郑子恩这个化名。他家4口人，老两口子，两个儿子，4口人4个姓，他姓郑，老伴儿姓齐，大儿子姓李，小儿子姓范。他到张殿有窑上来的时候没往福德搬，只在窑旁挖个地窨子住。以后才搬到屯子里。我当时很小，但记事儿了。郑老太太可厉害了，别看是个“民装脚”走道慢悠悠地。对两个儿子管得可严了。大儿子当年30来岁，小儿子和我同岁。十三四岁。大儿子好赌钱，赢了还可以，输了，小儿子就告诉老太太。老太太抄起棍子打，大儿子也不辩别，撒腿就跑。常了人们问大儿子：“她是你亲妈吗？”他说是干妈。人们说，亲妈哪能这么蝎虎？

老郑头儿爱说爱笑，还会唱歌儿。他冬天烧炭，夏天卖小工。铲地的时候，他给人讲故事，在他后边总是跟着一帮人。他乘机还给大家讲反满抗日的道理。人们背后都说郑饭勺子不简单。他还教大家唱《抗日四季歌》，我还记得几句：“春季里来百花香，中国人民遭了殃，日本鬼子进中国，蒋

介石下令不抵抗”。他人很好，人们大事小情都找他，打架，也找他劝。

会发警察署特务张洪福和金广恩经常到我们屯转转。大家背地里都猜是奔老郑饭勺子来的。不久，日本鬼子将老郑抓走了。

那天早晨，我们屯来了一辆汽车，只见老郑五花大绑，被拉走了。

他走后，许占春对大家说，老郑正在睡觉，警察把他堵在被窝子里。问他是不是抗联，他说他不是，警察没容分说，叫他穿上衣服就绑上了。警察又在他们屋里翻一阵，也没翻到什么。许占春告诉大家，这伙警察是三江省的，这老郑不姓郑而姓范，是共产党的大干部。

解放后，我的老师杜仙洲告诉我，老郑就是范景海。当年是地下党的宣传部长。杜老师还根据他的事迹编了大鼓书演唱。时间太久了，大鼓书的词全忘了，只记得开头是：“范景海蹲大狱八年有零。”

1946年冬，范老领着他的小儿子到福德屯来过一次。父子俩都有枪，范老带支匣子，小范背支三八。他们在刘顺家住一宿，第二天就走了。

（玄熙发整理）

葛祥：方正县饮食服务公司退休干部。

风 凶 浪 险

谭文元

我说的是1936年的事。

我当时30刚出头，家住大罗勒密，在松花江上摆江。

当时在大罗勒密摆江的有两个，一个是张丫头，一个是我。张丫头是明的，我是暗的。就是说，他摆江是经过伪大罗勒密警察署批准的，我的摆江都是偷偷摸摸 地 干，是 私的。所以干这件事，总是提心吊胆的，怕叫警察狗子堵着。可不干这个，我一家3口靠什么活呀？

一天，我被两个警察抓到警察署。他们不说长不道短，进院就是一顿毒打，打得我鼻青脸肿。打完后，他们问我：你知不知道私自摆江犯国法？”我说：“我一家3口，不摆江活不了啊！”警察又说：“你摆的不是平民百姓，都是马胡子！”

我说：“我只为挣几个钱养家糊口，没摆 什 么“马 胡子”呀！”

我回家整整躺了两个月，起炕不几天，警察署 又 来 叫我。这回来和上回不一样，不但没打我，还叫我坐下。署长姓关，是新调来的，名字叫关玉芳。他说：“听说你摆江有两下子。”我一听连连摆手说：“我饿死也不摆了。”他立立眼睛说：“摆也是你，不摆也是你。牵着不 走，打 着 倒退！”原来那个张丫头，山东人脾气倔，受不了鬼子汉奸的

凌侮，辞活不干了。他们看我老实好欺负，叫我干。为了一家人的生活，我只好干了。从8月开始，在松花江上正式摆江了。

从大罗勒密到通河的南六方，摆江的时间是每天上午点，下午两点到3点，一天是3趟。渡江的鬼子、汉奸不但不给钱，还常挨辱骂，但为了生活，也只好忍气吞声。

9月的一天夜里，我与妻子都躺下来半天了。有个人在窗外轻轻地叫门："老乡，睡了么？"我忙披衣坐起来问："谁呀？"那人说："我是韩大叔打发来的？"

听说是韩大叔打发来的，我叫妻子点着麻油灯，给来人开门，把他让进屋来。

这人，30来岁，四方脸，大眼睛。身穿灰布夹袄，上面补着补丁。腰上扎条皮带，一把手枪斜插在上面。

我问他："韩大叔可好？"

他说："他老人家很好。"

韩大叔是我的救命恩人。

去年冬天，日本鬼子进山打抗联。深山老林进不去汽车，子弹给养运不进去，便抓中国百姓给他们当民工。我自然也不例外，被他们抓去背米、背子弹和炮弹。我背的是六零炮的炮弹。

我们由王翻译领两个特务押着。路很不好走，一走一滑，直栽跟斗。整整走一夜，太阳冒红才到陈家亮子。

又累又饿，坐在雪地上都不会动弹了。王翻译叫大家吃饭，吃完饭继续赶路。王翻译说："皇军已经和马胡子打上了，给养供不上要杀头的。"

人们开始啃冻透了的干粮。我走的时候，来不及做干粮，以为挺一夜就回来了，那成想走了一夜还要走。王翻译

见我没吃干粮，问我："你乍还不吃呢？"我说我没带干粮。他听了踢我两脚，骂道："饿死一个少一个。"

不大一会儿，王翻译扔给我两块冻得帮硬的大饼子，"吃吧！快点。"我明白了，他不是为了可怜我，而是怕我饿倒了，炮弹没人背。

啃完干粮，王翻译又逼着我们上路。又走了大半天，前边传来了爆豆似的枪声。王翻译喊："站下，站下！"

我们停在山坡上。

王翻译说："原地休息，听候命令，谁要是开小差，我毙了他！"

我们在雪地里坐到太阳偏西。这时候，日本兵和自卫团冒面似地从东窑那面败下来。后来听说，这仗叫抗联消灭200多日本鬼子，和50多自卫团的人。

我把背的六零炮炮弹掷到山沟里，我以为非爆炸不可，但没爆炸。不过叫鬼子看见了，惹出了杀身之祸。

两个日本鬼子兵，把我按倒在地，一顿皮鞋脚将我踢昏。当我醒过来的时候，鬼子已经走了。

我想站起来走，可是连坐都坐不起来，我只好一点一点往前爬，爬了很久，爬不动了。随着，失去了知觉。

当我醒来的时候，一位60来岁的老头儿，给我用雪搓手搓脚。这人就是韩大叔。在韩大叔的照料下，我一点点好起来了。他告诉我，他是抗联的地下工作人员。

我在他家养了三天。临走，韩大叔说："每个中国人都要站起来和鬼子斗争。"我说："大叔，我的命是抗联给的有用着我的时候，只管说话。"

我回来将近9个来月，韩大叔一直没有来找我。没想到今天，韩大叔派这个人来了。

这个人很和气，他自我介绍说："我姓李，是军需处的的。你叫我老李好了。"

我说："老李，你有啥事，说好了。"

老李说："有两位首长要过江。时间是在明天夜里12点，地点在西山头。"

我说："好吧！"

老李从兜里掏出一把钱，塞到我女儿的枕头下。这我哪能要？忙给也塞回去。他说："这是我军的纪律，用你船给工钱。这钱留给大侄女买点啥吧。"

不管咋说，这钱我不要。老李见我态度坚决，也就作罢。

第二天半夜，我把船摆到西山头，正好老李等着我。与他同来的还有四个人。

这夜，风很大，船在江面上摇晃得很厉害。这四人中，用眼睛一看就看得出，两个是官儿，两个是兵。那两个官儿30来岁，两个小鬼20上下。两个官，一高一矮。高的我认识，是李延禄，那几年常到大罗勒密来。那矮的没见过，不过我想，他不会比李军长小多少。他们都没说话。

摆到南六方，有辆花轱辘车，等在岸上。他们下了船，坐车走了。老李同我坐船回江南。我问老李："那个小个儿官儿是谁？""老李说："赵尚志！"哎呀，我送的是大名鼎鼎的赵尚志呀！

从此以后，老李经常来找我，为抗联接送人。

阴历九月，天凉了。老李叫我送两个人上江北。那天也是半夜，把那两个人送过江之后，又从江北装了一船衣服。送到西山头，卸了，我回到了家。

第二天，傍晌午，警察署把我叫去。一个姓张的警尉，

拽着我的领子，把我毒打了一顿。脸肿得象个馒头，嘴丫子血直流。然后，又把我按倒，踢了一顿窝心脚。

打罢，张警长问我："昨晚干啥去了？"

我一口咬定"睡觉"

他又问"白天干啥去了？"

我说："摆江！"

他说："有人报告说，你昨晚给'马胡子'摆江了。"

我自然不承认。我坚决地说："我要是给马胡子摆江，杀我一家3口。"

张警尉不搭理我了，叫了一个警察把我押进监房里。

午间，看守给我送来两个苞米面窝头儿，一碗萝卜汤。吃完，赵寓长来了。他说："有人举报你摆了"马胡子"。我已经和署长说了，即或是摆了，也是被迫的。摆了就承认呗"。

他是来套我的。我说，我在你手底下长这么大，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老实巴脚地，我长几个脑袋敢摆"马胡子"。

赵寓长被顶回去了，只好说："不知是什么人举报的，太缺德了。"

下午两点多钟，我正在监房里躺着。看守喊我："老谭快起来吧！署长说放你回去。"

我到署长的办公室，赵寓长说："是我在署长面前保了你。回家要安分守己，千万别干乱七八糟的事呀！

回家后，妻子告诉我，把我抓去之后，张警尉领人闯到我家。他对妻子呼三吆四，威逼承认我给抗联摆江。妻子百百般不承认。张警尉问她："谭文元昨晚半夜干什么去了？"妻子说："搂我睡觉！"张警尉闹登一阵，弄不出什么名堂走了。

我在家养了七八天，以后照样又为抗联摆江。

（玄照发　整理）

斑斑血泪说劳工

李振清

伪满洲国时，我出了两个半月劳工，经历了日伪反动派刺刀和棍棒的劳工生活；亲眼见到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法西斯暴行。

1942年夏，也就是我16岁那年，珠河乡的表叔王喜福、王喜发一起来找我，说摊上劳工了，他们都身体不好，要我替他们去出劳工。我知道当劳工不是好事，也知道穷人一摊上就别想躲过去。本不愿去，但见两位表叔的可怜样，也就答应了。妈妈知道后就埋怨我“别人躲都躲不过去，你还替人家当劳工，要弄个半死不活的，以后这日子可怎么过？”是啊！父亲去世好几年了，妈妈吃糠咽菜将我拉扯大。我当劳工有个好歹，她可怎么过呀！但已经答应替人家了，也就不能改口了。过了不几天，催劳工的人上门来了，我也只得到离我家二里地的陈家屯出劳工。

日本侵略者为了长期霸占我国东北，在方正县修了三个飞机场。有我们修的陈家屯飞机场，还有方正城西、会发镇北两个飞机场。陈家屯这个飞机场是北至松花江沿，南至天门村北的大排地，东西二里多地。去的劳工有通河县、方正县的共二千人。一个县的劳工为一个大队，大队下辖四个中队，一个中队管四个小队。大、中、小队长大部分是由县青年培训所培训出来的中国人充任。一个中队有一个日本兵监工，

小队长也是监工。驻机场的日本兵有三四十人主要是看管劳工。

当了劳工就等于进了人间地狱，吃的是猪狗食，干的是奴隶活，死了喂狼狗，活下来也是一身病。

劳工每个人一顿饭只给一勺饭——二两多的高粱米拌黄豆，一碗菜汤。吃干粮，也只给二两多一个苞米面窝窝头有时掺橡子面。可干的活却相当重，一天要干10个小时活，7个人一天得打出8方水泥板。（飞机跑道）一方水泥板为16平方米。后来一天增加到10方，劳工们住的是地窝棚式的大棚，平地挖沟，沟上铺炕席。夏天返潮，劳工们身上长疥，霜降后席子底上霜，劳工们都腰腿疼。就这样条件，劳工们每天早上还得出1小时操，跑步跟不上的常得挨监工的拳打脚踢。干活干慢一点，监工的又是一顿藤条棍子，打得你翻翻乱滚。劳工们上场子干活没有穿衣服的，日本子不给发衣服，劳工们来时穿一套衣服还得留着收工穿。无奈干活时，将使过的牛皮纸水泥袋子两头的线拆掉，从脚下套上来，到了腰部用草绳子一扎就干活，收工时脱下水泥袋子换上自己衣服再回工棚。

劳工们吃不饱，又干重活，一个个渴了喝凉水，天长日久，差不多都跑肚。轻病号挺着干，重病号扔恶狗圈里喂狼狗。日本鬼子的狼狗比劳工吃得好，整天吃生肉，吃米饭，一条条胖得溜圆，毛都锃亮。

长期的非人折磨，劳工们累得没招儿了，也就开始胡弄小鬼子了。人们躲着监工的，将地上铺一层沙子，再放些石块，上面铺上水泥，就完成了一方水泥板，监工是日本鬼子的鹰犬，磨洋工也是不易。

残酷的折磨和迫害，激起劳工们的不断反抗。

我们一个中队200多劳工住一个大棚，晚上躺下来谁也不许吱声。一天晚上，大罗勒密的几个劳工说了几句话，被查夜的名叫杨保行发现了，他狗仗人势地大骂起来，这几个人急了，将杨捺在地上好顿揍。打了查夜的，劳工们又解气，又害怕。解气的是对为虎作伥的汉奸进行了报复；害怕的是，如让日本人知道，这几个人没好结果。劳工们一面用大话将杨喝住，一面找中队长讲情，此事才压了下来。

劳工们也想逃出去。可逃得出吗？机场四周是铁丝网、炮楼子，机场中央高架子上还有探照灯。劳工们是在日本兵和监工的刺刀、棍棒下卖命，这样戒备森严，也有逃跑的，我亲眼见到的是一名没有跑出去的劳工。

一天晚上刚睡觉，一阵急促地口哨和吆喝声，将劳工们集中在恶狗圈旁。劳工们站着队下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一会儿，只见一名30来岁的劳工象捆猪那样被扔到大家面前。日本兵当众用藤条棍子将他一顿毒打。一个日本军官走到这名劳工跟前："你的逃跑的不行，死了死了的！"这是日本人是杀鸡给猴看，镇压逃跑的劳工。只见几个日本兵上来将这名劳工工抬起来，扔进了恶狗圈。这个日本军官对劳工们恶狠狠地说："以后谁逃跑就这么办！"

这名劳工被扔进去后，五条狼狗扑了上来，他没好声地叫了几声。这几条恶狗掐嗓子的，撕肉的，将他扯得血乎淋拉，不一会儿，就剩下一付骨头架子，真是令人毛骨悚然，惨不忍睹！

日本人屠杀中国人就象杀小鸡那样容易。一次，我们到方正西的机场装石头，见三丈高的旗杆上吊着一个人。我们看见几个日本兵一松绳子，就将那个人摔到地上，拽上去再摔，这样摔了几次，那个人就被活活摔死。一打听，才知道

那个中国人是因走错路误入机场，被小鬼子诬成奸细而摔死的。

我当劳工干了两个半月，天冷了打不了水泥板，将我放了回来。可有多少劳工没有回来，听说去鸡西、鹤岗修保密工程的劳工没有一名回来的，工程修完了，人也就枪杀了。就是这个不保密的机场修成后，在天门乡齐小山的山坡上也埋着上百具劳工的尸骨。

（李志军　整理）

李振清：天门乡天门村农民。

伪满历闻录

杨青普

编者按： 杨青普，一九〇八年生。方正县德善乡安乐村人，一九三一年哈尔滨法律大学肄业，一九三二年在安乐（南保）当职员，后任保长。一九三四年任伪方正县农会会长。一九三六——一九四五年，任伪方正街长。一九四五年光复后，与伪县长郭福翰一起组织地方治安维持会，任副会长。与赵子遐组织"国民党"，任县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一九四六年逃离方正，一九四七年被国民党东北行辕绥靖公署委任驻哈办事处第四支队少校军需。一九五一年为我政府逮捕，同年处死缓，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宽大释放，现居原籍。

杨青普先生历经伪满洲国一十四年，对方正县日伪统治情况很熟悉，本拟采写一本专辑出版，可是杨青普先生年事已高，记忆减退，大量史料回忆不起来，这不能说不是一个损失。发表在这里的史料，只是一些零星的东西。但管中窥豹，对于我们了解方正县伪满时期的黑暗腐败都是有所裨益的。

步入伪满政界

1930年，我就读于哈尔滨法政大学法律系，一九三一年

日本人占领哈尔滨后，我失学了，回老家安乐村闲呆。这时候，东北抗日义勇军从吉林退到方正。团部设在我家，旅部设在宋家井子宋喜珍家。大汉奸于琛澂在桶子沟与宫、姚旅激战一场，宫、姚退到天门、会发、得莫利，后退到依兰境内。于大头的伪军占领方正。日本兵当时没有跟到方正，转年开江的时候，西山大尉率一百二十多名日军，乘军舰开进方正。

一九三二年五月，西山大尉组织治安维持会。西山任维持会长，景阳春任副会长。委员由四十多头面人物担任。又组成伪县公署，景阳春任县长，日本人度边通为参事官。县公署设三局一科。三局是财政局、内务局和警务局。一科是总务科。财政局长崔景松、内务局长刘少华、警务局长温树润，总务科长李荣久。不久又组建了警察大队，于延彬为大队长，邵裕厚等三人为中队长。方正县分六个区，城南城北为一区，会发为二区，南天门为三区，得莫利为四区，大罗勒密为五区，三道通为六区。各区设警察署。一区警察署长为孟仲辉，二区吴英孚，三区姚星阶，四区王维久。五区丁慎修，六区于国良。

在方正县的常见日军约有一百二十余人。但这些日军并不驻方正，在方正通河来回窜，是给中国人看的。日军还设宪兵先遣分队，分队长叫掘支内。

一九三二年实行保甲制。六个区设六个保，实际七个保。城区分南保北保。南保设在蔡水井子、北保设在孙万林井子。

南保保公所，一共六个人。保长，会计、通讯员、管理员和炊事员。我在这里当了一年文书。

1932年7月，宪兵队翻译，把我找到宪兵队。他问我：

“满洲帝国好不好？”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但也不得不说“好！”尽管我说好，他们还是把我关进一个小黑屋子里。

这间小黑屋子，在宋家床子后院，即现在的农杂商店附近。关在黑屋里的人，不只我一个。还有石宝光、张凤鸣等人。他们都和我一样，都是念过大书的人。在黑屋子呆了三四天，我心中不解，我究竟犯了什么法。家里人给我捎信，叫我安心，他们说：你不几天就会出来的，已经托了白振江。

白振江外号白大杆子，前清当过哨官，官衔相当于营长。当时是方正县的自卫团总团总。白振江的面子大，第三天头上，宪兵队把我们放了。我们从黑屋里出来之后，有的做了县协和会雇员，有的做了小学教师。我回南保当了文书，后来当了保长。从此我走上了伪满的政界。

景　阳　春

伪满洲国第一任方正县县长是景阳春。

景阳春是双城县人，大汉奸于琛澂的同乡。

此人风流放荡。他到方正县来，始终没带家口。他独身住在景兴楼旅馆。伪警察署有个警尉的老婆与其勾搭上了。他将其安排在旅馆当服务员，夜夜相伴。

景阳春是个屠杀抗日志士的刽子手。

一九三一年，他与日本指导官有山，率守备队，警察大队，自卫团共四百余人，在徐士国屯打抗日部队，屠杀了近百名义勇军。

一九三四年农历正月，景阳春率日伪军攻打套环山区，打死抗联战士四十余人，并将这些战士的头颅割下来，挂在

方正县四门示众，还写了一本《环山剿匪记》，吹捧自己的“功劳”。

由于“讨伐”有功，一九三三年被升转依兰县县长。因为土龙山暴动，险些为日本摔死。

谢文东是土龙山的大地主，“九一八”后组织自卫团，自任团总。景阳春去土龙山收税，谢文东不交。景阳春向日本人做了报告，日派饭冢大佐率兵前去弹压。谢文东早有思想准备，景阳春一走，便布置与日本人打仗。当饭冢大佐率兵前来的时候，谢文东正在公路两旁埋伏。日军中了埋伏，有六十余人丧生，饭冢大佐也被击毙。谢文东将自卫团拉上山投了抗联。

日本人为此非常恼怒，将景阳春和警务科长抓去。他们把姓宋的科长装在麻袋里，活活摔死，然后扔到狗圈里喂狗去了。日本人没有弄死景阳春，如果没有于大头，其下场不一定比姓宋的好。后调到锦西去了。

景阳春除了效忠于日本主子外，贪污受贿也有一手。他家生小孩，父母做寿，总要大撒贴子，收到大量礼品。他从方正转走的时候，各街村、各科局都要送礼。当时，大部份都去了，只有友爱村没有到。他在依兰时，忘记了这件事，可到锦西后却想起来了，打发他的儿子，在一九四二年的时候，来向友爱村讨过帐。友爱村村长王毅忱与我商量，给他拿去二百元钱，才算完事。

解放后，景阳春为锦西人民政府镇压。

韩国瑞受贿案

一九三六年，方正县警务科警察韩国瑞，任立珍，被伪

三江省警务厅逮捕，其罪名是受贿。

伪三江省兴农金库有个会计，提出三万元巨款，与一妓女扮做夫妇，从佳木斯乘船，在伊汉通登陆到方正街里，住在闫家店。这晚正是韩国瑞与任立珍查夜。查到他们的房间，发现他们不象夫妇，分别盘查，两人口径不一，便把他当嫌疑犯带到警察署。这个会计，从兜里掏出七千元给他们。韩、任见钱眼开，当场开释。会计又请他们上景兴楼吃饭。这个会计没有继续逃窜，而是掉头回到佳木斯，向警务厅投案自首。在交代中，供出了韩国瑞和任立珍。

在佳木斯的警务厅审讯他们的时候，任立珍百般狡赖，被日本人活活打死。韩国瑞承认了，被判十五年徒刑。

一场风波

1937年我在南保当保长，县公署叫我当采木头的工头。伐木干啥？当时我不十分清楚，后来才知道是修集团部落用。

各屯都打了高墙，四门都安装大门。大门用的都是一色红松。门柱用的木头，小头粗一尺，径长八尺。全县一个一个屯子都修，得很多木头。县公署给我的任务，入冬起到来春开化，采木一万立方米。日本人组织了采伐组合，我与我的好友王毅忱任正副组长。我拿总，王当助手，姜会芳跑外，还用了一个会计。在全县的范围内招收工人二百多人，召募套子二百副。

采伐地点，在二和尚庙，和八里甸子一带。山里没房子，搭大棚。二百工人都分散各个点，我们采伐组合搭了三个大棚，一个是我们住，另一个给保护我们的民团住。那

时，抗日联军在这一带活动挺活跃，所以县里抽民团（即自卫团）一百二十人，又在治安队抽二十人的马队，跟在套子后押运。

腊月二十，抗联三军后勤部给我送来个年纸单子，要年货。上面写白条猪500口，白面100袋。我很为难，给送吧，日本知道了，没有好，不送吧，抗联得罪不起。我和王毅忱商量怎么办？王毅忱说，不如咱们见见抗联当官的，讲讲咱们的苦衷。我一想可也对，就由我带着六个人，坐爬犁去见抗联。

到大沟里，走到一个大棚前，抗联哨兵把我们领进屋里。一个自称参谋的李同志，对我说："我们抗日为人民，你们为日本人办事，拍胸脯想想能对起祖先吗？现在要过年了，叫你们弄点吃的给趴冰卧雪的战士，却迟迟不动，还有中国人的良心吗。"

我本想以我三寸不烂之舌，把这事搪塞过去。看这个架势那是不行了。我忙自我解释地说："我来的目的是想联系一下怎么送。"

李参谋说："叫套子捎！"

我们连夜下了山，偷偷为抗联准备了猪肉、白面、白糖。二十三过小年那天，用套子捎上去。

这件事过了好几年，没人提起，可到我在县里当街长的时侯，却有人告我"通匪"。告状人是李广荣。

我很会处理人事关系。日本人副县长岗本爱吃鸡蛋，我专门给他送鸡蛋，警务股长大召关村好色，我专门为他牵线。特务股长忠原爱占小便宜，我不断给他送礼。可以说，我的后台硬，李广荣告不动我。但是李广荣在县里也有一定势力，警务科不得不办理此案。我白天照常上班，晚间去受

审，其实是走过场。这样，一直过了两个多星期。

这功夫，三江省省长芦元善到方正县来视查。李广荣认为是个机会，他便写个状子递上去。记得县里欢迎省长举行了宴会，芦元善训完话，坐下来吃饭，从兜里掏出纸状递给伪县长刘鸿漠看。芦问刘："这件事，你知道吗？"刘鸿漠没回答，副县长冈本忠雄说："已经结案了。杨青普大大良民，此事绝无，纯属诬告。"芦元善一听火了，问："警察署长何在？"伪警察署长关林甫挺胸直立回答说："卑职在！"

伪省长说："此等刁民，挟官告吏，不严惩怎么能行？"

李广荣因此蹲了四十一天监狱。

色狼大召

日本人大召关村，是伪方正县警务科的警务股长。其权力大于警务科长。大召是个地地道道的色狼。

警察署有个警察张某，是从依兰县调来的。他有个漂亮媳妇，很年轻，才二十四五岁。张某长年执外勤，她孤零零地守在家里。她还有口大烟瘾。大召得知这一情况后，找我说："杨的，买几份大烟，给张的送去。"我买了几份大烟给张某媳妇送去。大召这招是试探，这媳妇要收了，他们的事就成了，不收，与脸面也无碍。我说是大召给她的，她笑眯眯地收下了。我把这情景告诉了大召，大召当夜就去了张家。

有天我有事找大召，警务科找遍了也不见，我想准是在张家。找到院一看，窗帘摺着，大召的马靴在窗外搁着，我悄悄地回到了街公所。后来见着他，我和他开玩笑："马靴

的那里去了？”他拍拍我的肩头说：“杨的，大大的好人！”

兴方校有个女学生王某，那年十八岁，长得很漂亮。穿一件红丹士林布的大衫，剪个短毛英子。特别是她嗓子好，歌儿唱得美。这个女学生被大召相中了。

有天他对我说：“杨的，王的姑娘顶好，你领我到他家去！”

我领着大召到王家去了。

王家就父女俩儿过日子。大召去后将王父撵走，我也躲开，王某被其奸污。

砸李家馆儿

李家馆是李景华兄弟开的。李家兄弟手艺高，利又薄，远近闻名。伪县公署来了客人，都到这里点菜。

日本关东军有个团长，从佳木斯飞抵方正。守备队和县公署在守备队设宴招待，饭菜自然是李家馆子的了。

这个团长多吃了几杯酒，忘记手枪放在哪里了，便大吵大叫说：“枪叫中国人偷去了。”于是守备队长，伪县长下令搜查在场的中国人。在场的除了鬼子，就是汉奸，根本没有别人。给他提食盒送酒菜的小黄倒霉，硬说小黄受李景华指使偷枪。于是把小黄和李景华抓起来，严刑拷打。为了找出枪来，把李家馆的棚、炕全扒了，翻个底朝上，但都无济于事，没有找出手枪。

李景华的弟弟李景埔来找我，我去找大召，大召又去找冈本，经冈本说情，农会商会做保，这件事才算作罢。

但日本人并不甘休，他们把给守备队做木匠活的小木匠

抓去，毙了，硬说偷手枪的就是他。

后来，听大召说，这个团长的手枪并没有丢，放在箱子里当时忘了。

修 机 场

一九三九年，修飞机场，农历五月开始，九月竣工。地点在方正镇西门外。机场南北一公里，东西二公里，占良田十余垧，东从林业苗圃，西到莲花村西，南从丹阳山，北到城北王货郎屯。跑道宽七米，厚二十厘米。均用石子水泥合成的。

民工由各村国兵漏子中抽，起名叫勤劳俸仕队。一共六个中队，每个中队一百二十人，一共七百余人。大队长王守成，一中队长孟昭煜，二中队长张会民，三中队长肖云生，四中队长王洪泰，五中队长徐慕贤，六中队长宫路。大队长王守成是我的亲戚，是我向日本人推荐的。他曾给张作霖当过通讯员，此人个儿大，脑袋好使，但好打人，人送外号王大巴掌。

包工头子是日本工头计司国谷。

机场占地均是熟地，而且有四十多家民房。日本人下令，拆除房屋，将这些人赶走。

俸仕队住在大棚里。守备队怕他们逃跑，派三十多个日本兵看着他们。

我也参加了修机厂，我的任务是车辆总监。每天必须派出一百多台大车拉砂子。拉砂子很苦，每天都得干十几个小时的活。老板不堪劳苦，不少中途跑了。跑了，我就向宪兵报告，宪兵把他们抓回来，不是挨打，就是罚跪。

俸士队的生活很苦。名义上给每人每日发一元五角钱的伙食费，但禁不起层层克扣。首先，日本工头扣一元，然后各小头目一角一角克扣，落到他们头上剩二角都不错。他们吃的是文化米，即把高粱多磨一遍，然后拌上玉米面，后来玉米面也没有了，干脆拌橡子面。这样的伙食怎么能吃饱。所以俸仕队纷纷逃跑。跑的大部份抓不回来，可能当了抗联或土匪，只有少部分人找回来了。对这些人，轻则毒打，重则扔到狗圈喂狼狗。

为了监工方便，从城里到机场中间修条路。这条路是两边挖土往中间垫，上面铺上砂石。修这条路的不是俸仕队，而是从各家各户抓来的民夫。各户对修机场不满，不敢明说，都暗暗反抗。修机场他们大人不来，用小孩子顶替。我与西山大尉、伪县长在路上视查，看到这种情景，为了讨好日本人，我训斥这些孩子："每回派工都来小孩，你家大人都干什么去了？"其中有个孩子，十四五的样子，对我很不满，不知他嘴里嘟哝句什么话，我火了，照着他的屁股踢一脚。后来这个小孩儿，因踢这一脚化脓死了，是老王家的孩子。当时我并不知道，一九五一年判刑的时候才知道。

机场修成后，日军小型飞机总在这里着陆。小型飞机，能乘九人。每星期一次，一直使用到解放。

副县长自杀

河野三郎是伪满洲国最后一任方正县的日本人副县长。一九四五年七月，他感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末路到了，而剖腹自杀。

他自杀的具体日子，我忘记了，大概在七月中旬。那天

夜里，我正在睡觉，电话铃突然没有好声地响。我摘下听筒一听，里面响着急促的声音：“喂！老杨吗？”

当时我正当方正街的伪街长，家里接台电话。从说话的语气上，我听出打电话的这个人是谁，他不是别人，是我的朋友——方正医院院长刘竹林。刘竹林，又叫刘多山，医道很高，在方正很有名。我们经常在一起喝酒打牌，我们也经常通电话。但多咱他都是从容不迫。我想，他们医院里一定出事了，需要我帮助。我说：“竹林吗？什么事这么急？”他只简单地回答：“请你马上到我家来一趟。”说完，把电话撂了。我打着电筒，来到刘竹林的家。他在门口等我，样子很焦急。

他说：“警务科来电话，叫我去抢救河野。”

我很吃惊，忙问：“河野怎么了？”

他说：“他剖腹自杀了。”

我说：“他死他的，你急什么呀？”

他说：“我问你，抢救，我去还是不去？”

我明白了。日本人自杀，当然与别人无关。但与医生的关系可就大了。你去抢救，抢救活，没说的，抢救不活，你负啥责任？我理解了刘竹林的心情。

我说：“还是去吧！，不过，你得立刻给通河医院去电话，报告河野三郎自杀的消息。”

因为通河医院的院长是日本人。

他听了我的话，叫通了通河医院的电话，通报了这里的情况，请求他们马上赶来。

之后，我们来到了河野三郎的家。

河野家在现在二小哪儿。这时已叫宪兵队和警务科的人，围得水泄不通。见我们来了，让开了路。

我们到屋里，屋里灯光明亮。河野三郎赤着臂膀，两手握着战刀，在一把椅子上自杀了。刀柄握在手里，刀尖戳出脊背，鲜血污了一大片。

刘竹林走到跟前，摸摸他的鼻子说："还有气！"

我当时很纳闷，河野活得好好的干吗要自杀？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收日本电台，听裕仁天皇讲话，讲话已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他失望了，决心以身殉国。故他乘去牡丹江开会之机，将妻儿安排在牡丹江市一个好朋友家，只身回到方正。

刘竹林给他注了强心剂，这种药没说的，谁也挑不出毛病。

不久，通河县宪兵队开汽车来了，当然有那个日本人院长。

这个院长，戴眼镜，简单与刘竹林说几句，就奔河野去了。

由于河野肠子已断，和流血过多已无抢救的可能了。

河野死时，天已大亮。

我给牡丹江去电话，报告了河野的情况。他妻子当天午间就回来了。恸哭一场之后，将尸体炼了，捧着骨灰回日本。

计 司 国 谷

在方正街东边有个青砖楼，那就是计司国谷楼。

计司国谷是日本包工头子。凡是沾边的施工，他都要包起来。伪县公署是他包的，飞机场是他包的。他不仅包工，而且经营全县砖窑。他来以前，全县没有红砖，他来后才有

红砖。

他在方正县榨取了大量钱财，修了这座计司国谷大楼。

他利用这座楼，开旅店，可以说不尽财源滚滚来。

计司国谷一生娶了两个老婆。大老婆管钱财，小老婆开旅店。

日本子垮台前夕，佳木斯蒙古利，即大本营给计司国谷下征召令，令其入伍打世界大战去。计司国谷抛不得钱财和妻妾，拒不应召。佳木斯一连下了五次召集票，他没办法了，到佳木斯，叫大本营枪杀了。

一九四五年九月，计司国谷的小老婆仍在开旅店，他的大老婆把计司国谷生前积攒的财物，顾一辆车，准备取道尚志回国。但他们走到方正南，叫土匪宋老八抢去了，计司国谷的小老婆也被打死。

满 洲 末 日

日本帝国主义一投降，我们就成立了地方治安维持会。

为什么成立维持会呢？我们听南京广播电台说，日本政权虽然垮台了，各地方要成立维持会。维持会的作用有两条，一是要保护日伪留下的物资，转交国民党中央政府，二是维护地方治安，等待国民党政府的接收。特别强调，对有功人员，按功论赏。

方正县地方维持会的会长是伪县长郭福翰，副会长是我与郑兴周。

八月十六日，维持会在方正街公所成立了。参加会议的约有四十多人，大多数是县署各科科长，和各街村长。维持会设三部，即总务部、公安部和财经部。总务部长左彩

章、公安部长景志学、财经部长刘醒吾。公安部下辖治安队，由景志学兼任治安队长。

苏军进方正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二日，苏联红军进驻方正。

当时，从佳木斯开来一个日军师团，在方正等待苏军的缴械。司令部设在兴雅俗旅馆。

苏军是坐船从佳木斯来的。他们到伊汉通，给方正县维持会打电话叫我们去接。我们派了两个人，押三匹马，到伊汉通，接来一个少校，一个上尉，一个少尉。我们把他们安排在计司国谷楼上。当晚，郭福翰、韩志云、郑兴周、陈静山、王寿山、李秉正、赵兴文和我去见苏军少校。

八月二十三日，日军集中在二小运动场。他们排成两大溜。师团长向他们训了话，叫他们无条件把枪码在操场中，然后后退三步。日军照他们的首长话办了，缴了武器。苏军用汽车把枪支运走。日军又把随身携带的毡子之类的东西垛在操场上，点着焚烧了。

日本宪兵队大约有50余人，他们集结在景兴楼上，不肯投降。日军师团长到景兴楼下令，宪兵队才交了枪。

八月二十四日，苏军一个排从伊汉通开来。成立方正县卫戍司令部。苏军少校任司令，付国壁、祁连山任副司令。

八月二十五日，日军奔延寿，到哈尔滨集中，到沈阳“日侨遣送站”报到，回日本。

十一月二日，苏军撤出方正。

（玄照发　整理）

气 壮 山 河

玄照发　　杨兴江

刘世武同志，辽宁省海城人，1902年生，学生出身，毕业于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1934年中共满洲省委派往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延方特别支部，先任组织委员，后任支部书记。

刘世武同志中等身材，圆脸微黑，农民打扮，说话和气，谁也看不出他是个有学问的人。当时中共延方特别支部以延寿县中和镇的天台山为据点，向加信子及方正县的永建、宝兴一带开展活动。刘世武同志和其他特别支部的领导刘兴亚、范景海，为便于工作，都住在天台山下陆家屯的地下党员许成富家。

1936年春，桃花水很大，翻浆烂道。刘世武去加信子买薄皮靰鞡。他从西南门进街，走不远就被执勤的自卫团丁孟庆余发现了。

1935年秋，孟庆余曾被派往我军驻地筛子王屯，刺探情报，为我所获。按当时规定，凡抓到日伪特工人员都要处死的。在要处死孟庆余的时候，刘世武赶上了。刘世武问明了孟的身分，感到其身分低下，当团丁为生活所迫，是挽救争取对象。孟庆余又苦苦哀求，发誓重新做人，为抗日出力。刘世武对孟庆余进行了耐心地教育，然后释放了。孟庆余当时以额触地，感激涕零，连称刘世武为再生父母，表示愿为

抗日效力。然而，这是一个忘恩负义，口是心非的家伙。当他发现这位“说了算”的共产党的“大官”之后，马上报告了加信子警察署，并主动带路，捉捕了刘世武。

敌人对这个案子非常重视，伪警察署长齐中山亲自审理。但敌人想也想不到，这位衣不惊人，貌不出众的人，竟是共产党的特支书记！

审讯是在夜间进行的。

刘世武和其他五人，一同被吊在一架大柁上。初审，他肉皮尚且完好，其他人则被打得血肉模糊。这五人当中，他认识3个，其余2人不认识。3人有两个是党员，1个是抗日救国会的会员。

审讯并没有从他开始，而是对那5个人挨个过堂。敌人打他们，骂他们，只让他们讲出一句话：“谁是刘世武？”这5位同志都说：“不知道！”敌人岂肯罢休，继续动用酷刑。这些同志被打得皮开肉绽，气息奄奄。刘世武如万箭钻心，他决定用自己一个人的生命换取5位同志的生命。他抬头高声大叫：“我是刘世武，中共延方特别支部的书记。”

齐中山呼地一声从椅子上弹起来，象中了邪一样，在刘世武的身前身后绕了一阵，从头看到脚，从脚又看到头，他不相信吊在上面的能是刘世武？他摇摇头说：“你说你是刘世武，有何为证？”

刘世武鄙弃地看了齐中山一眼，正气凛然地说：“我是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学生，有毕业证为凭。”

齐中山迫不及待地追问：“快说，毕业证在哪儿？”

刘世武说“你把我放下，就拿给你看。”

齐中山令警察将刘世武放下来，刘世武从棉裤的二层里子里将毕业证掏出，齐中山夺过去一看，欣喜若狂，这才相

信站在他面前的就是他们出重金悬赏的共产党的特支书记。他忙命警察给刘世武手脚铐上。

齐中山想顺藤摸瓜，他向刘世武说："你既然是书记，你领导的党员肯定都认识了？"

刘世武点头说："那当然。"

齐中山很得意，指着吊着的同志们问："他们都是共产党吧？"

刘世武装作认真地样子，对每位同志仔细地看了看，摇头说："没有，没有，一个也没有。"

齐中山听后暴跳起来，挥手对警察们吼道："你们都是饭桶！一群混蛋！没抓到一个正桩！"

于是把那5位同志放了。

时隔两天，对刘世武进行第二次审讯。

齐中山问："你从哪里来？到加信子干什么？"

刘世武缄口不答。

齐中山见他不说，便说："我替你说吧，你从陆家屯许成富家来，到加信子买靰鞡，是吧？"

原来敌人已做了侦察，并把许成富抓来。

刘世武瞪着眼睛说："既然知道了，还问干什么？"

齐中山问："既然你是共产党的大头子，老许家一定是地下交通站，许成富一定是地下交通员了，这个对吧？"

刘世武马上回答："在我投宿之前，根本不认识他。"

齐中山一拍桌子喊："他不认识你，怎肯留你住宿？"

刘世武坦然地说："我昨天走路天黑了，路过许家时又饥又渴，他们便把我留下。吃完早饭我就到加信子来了。他所以留我，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并不是因为我是共产党。共产党的脑袋没贴贴，他怎么知道我是共产党？"

刘世武义正严辞的几句话，把齐中山弄得理屈词穷，于是他恼羞成怒，命警察给刘世武上刑。老虎凳、辣椒水并没有撬开刘世武的嘴。敌人丧心病狂，又把刘世武装在麻袋里，举在空中往地下摔。刘世武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是，他没有泄露我党一点秘密。眼看从刘世武的嘴里掏不出任何东西，敌人又对许成富进行了逼供。许成富镇定地对敌人说："他是不是共产党，他也没事先告诉我，要告诉我，我还不留他呢。我只是可怜一个行路人罢了。你可以打听打听，凡是过路的人都在我家住过。"敌人没办法，只好把许成富放了。

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对刘世武的被捕非常重视。县委和特支通过陆家屯开明地主韩七爷发动全屯联保，并向齐中山行贿。齐中山得贿赂有意开脱。他把孟庆余叫来问："你是不是看错了人？"孟庆余这个民族败类却一口咬定："没错，他肯定是共产党的大头子！"齐中山怕本主子怪罪，不敢放人。

抗联领导决定打加信子，进行武装营救。然而，当部队走到亮珠河的时候，桃花水太大，过不了河。

狡猾奸诈的伪署长齐中山，怕夜长梦多，便用汽车，亲自把刘世武押送到延寿。

他们乘坐的是敞篷汽车。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刘世武，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与敌人作斗争。沿途他高唱抗日歌曲，宣讲反满抗日大道理，揭露日寇罪行，号召人民团结在共产党周围，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每过一村，都被人群围住。尽管齐中山命警察持枪驱赶，人们仍是不走。

刘世武在监狱里，虽然遭受无数次酷刑，但他英勇顽强，组织难友同敌人进行斗争。延寿县警务科黔驴技穷，便

将刘世武解到伪都长春。在伪高级法庭上，刘世武无情地揭露日冠杀光、烧光、抢光政策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怒斥伪政权引狼入室认贼作父的可耻行经。敌人本想从刘世武身上得到我地下党活动重要机密，可他们一无所获，1936年夏，把刘世武解回延寿后杀害了。

临刑前，敌人敲掉了刘世武的牙齿，割断了刘世武的舌头。临刑“游街”时，人们见其满面血污，大嘴圆张，吼着听不清楚的声音，无不摩拳擦掌，泪流满面。至刑场，刘世武面对刑警昂首挺胸，立而不跪，口骂日冠，身中数弹，长啸数声而倒。

碧血丹心是英雄

杨兴江

刘兴亚，辽宁省辽阳县人。1932年秋在珠河县（今尚志县）入党。曾任过珠河铁北区委副书记、中共延方特支书记。1937年2月任中共方正县委第一任县委书记。1938年7月被捕，1943年秋牺牲于伪吉林监狱。

贫贱不能移

刘兴亚任方正县委书记后，把家从珠河县搬到方正县会发村满家屯。当时从事地下活动的党员没有任何补贴和报酬，主要依靠种地、养猪鸡来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准，日子过得十分困苦难艰。一家八口人的全部家当只有一口传了多少年的铁锅，两条薄薄的破被子，几只带豁牙子的饭碗，一条扁担两个筐。就算刘兴亚的由深兰色变成灰白色的补丁摞补丁的大布衫比较完整，因为只有出门才穿它，也体面一些。还有一头猪，3只鸡。即使这样，有时为了需要不得不变卖家产来补充革命活动的经费。有一次，为了解决传单印刷费用，刘兴亚卖掉了仅有的一头近百斤的猪。3个不懂事的孩子紧紧拽住猪尾巴，哇哇大哭，不让父亲卖掉。是呀，一家人长期在贫困中煎熬，盼望这头猪能改善一点生活，可是为了革命，他不得不忍痛割爱。为了给地下交通员置办一套化妆衣物，他含泪将母亲出阁嫁妆银手镯变卖了。这副手镯

在刘兴亚的姥姥家已流传三代了，是他母亲心爱之物。当他向母亲提出卖手镯之事，母亲虽不知道儿子干的是一件伟大的事业，但她却明白儿子干的不是坏事，体谅儿子的难处和心情，便慷慨地把手镯递给了儿子。刘兴亚"扑通"一声跪倒，用颤抖的双手接过手镯。哽咽了好一会才说出了一句话："你是我的好妈妈！"

刘兴亚为了便于工作，不暴露身分，他经常搬家。他在任方正县委书记到被捕之前的不足两年的时间里，曾搬过4次家。从满家屯搬到方正城西丹阳山屯，又搬到方正城北的西候家屯，后来又搬到苗家屯，每次搬家都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向。

团结同路人

当时地下党的主要任务除发展地下党的力量，教育和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救国会进行反满抗日斗争和为抗联部队筹集军需物资外，还有一条很重要的任务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在敌伪军人中间做启发教育策反工作，复苏民族自尊心、爱国心。

有一次，抗联三军缺少弹药衣服。他全面分析了伪满方正县治安队连长邵裕厚的政治情况，认为邵裕厚还不是死心塌地为日冠效忠的分子，是可以争取的对象。他冒着生命危险，到治安队与邵裕厚见面。邵裕厚问刘兴亚来治安队有什么事？刘兴亚回答说："我是中国人（指抗日的），现在缺打的，缺穿的，希望你能给予帮助。"邵裕厚说："你真好大的胆子，敢到这里来要东西？"刘兴亚理直气壮地说："这里不是没有日本人吗？都是中国人有什么怕的？为了救

国救民，我什么都不怕！”邵裕厚为他这种大义凛然的抗日爱国行为所感动，但又犹豫地说；“武器弹药等军需品全控制在日本人手里，想弄出来很不容易，我这里只有点临时用的。再说，这事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我可就……。”刘兴亚知道他下话的内容，接邵裕厚的话茬说：“我知道你现在的处境也很难，说不定什么时候日本子一不高兴就可能对你们下黑手。我看你尽力而为吧！”邵裕厚看刘兴亚如此宽厚大度，真是个好样的中国人，心里很佩服，便挽留他在这里住下。当晚，刘兴亚进一步向邵裕厚做了开导和争取工作。他从中国当前的命运讲到共产党的抗日纲领；从全国各地如火如荼的抗日斗争形势讲到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从南宋岳飞抗击金兵讲到当今的抗日英雄；从秦桧害死岳飞讲到现在的汉奸走狗的丑恶行径。邵裕厚频频点头心中暗暗佩服。刘兴亚坚持正面教育，陈述利害。讲得透彻、生动，入情入理。二人唠到夜阑人静。邵裕厚最后说：“你放心，我也是中国人，要是抗日的碰到我手里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能放过的就放过。”邵裕厚可也真办点好事，那年（1936年）二吉利自卫团团长王俭因暗助抗联的事被日冠知道后要杀他全家，就是邵裕厚给送的信，王俭才率自卫团起义，带领全家夜奔抗联的。第二天一早，邵裕厚暗中给了刘兴亚三箱子弹和一部分衣服、胶鞋等。由交通员刘振江送到了三军营地。

党群鱼水情

中共方正县委建立以后，县委书记刘兴亚带领地下党员冒着生命危险，经过不懈的努力，在方正支部（宝兴）的基础上又建立了会发恒、南天门、得莫利3个党支部。在方正

县的东西南北四个区域都有党的核心。各支部在群众中广泛地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教育，在会发恒、南天门、得莫利、二吉利，南北堡等30多个屯组织建立起反日救国会等群众组织。通过这些组织发动群众，搜集敌人情报，协助抗联三军作战，支援部队衣物，粮食和弹药。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37年一年时间里就给三军筹集粮食3,6000多斤，衣服2,000套，卫生衣2,000套，袜子2,000双，肥皂2,000块，毛衣500件，胶鞋3,300双。坎肩1,100件，棉大衣200件，棉帽子200顶，裹腿200副。这些物资的筹集，转运都是刘兴亚等地下党员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完成的。

在那白色恐怖年代，开展地下工作是非常艰难和危险的，随时都有被捕和杀头的危险。对这些，刘兴亚全然不顾，都置之度外。他常说："干革命哪能没有危险？只要对人民有利，对革命有利，就是死了也心甘。"而在危险的时刻，又是人民群众一次次地保护了他，闯过了一道道险关。

1937年秋的一天、敌人突然扑到候家屯挨户地搜查。快要搜到刘兴亚的家了，形势十分危急，但他非常镇静。不过他最担心的是那些还没有来得及散发出去的传单和那颗"抗日救国方正分会"的大印。此时，韩景龙（抗日救国会会员，刘兴亚的义兄弟）手提一只水筲从他家窗前经过，刘兴亚低声叫住了他。向他说明了发生的紧急情况，问他有什么办法。其实，韩景龙正为此事而来。他说："不要紧，我有办法，你坐在屋里不要动，以防敌人注意。"刘兴亚把屋内墙角扒开，拿出用油布包好的传单和大印，韩景龙随手放在水筲里。他几步跨到道北老候家豆腐房，拿出了大印交给了赵老大。又把事先准备好的豆腐渣扣在水筲里。装模作样地和候老二做起了豆腐。赵老大揣起了大印大模大样地回到

家，把它踹进了早已和好的黄泥里，然后趁没人注意把它抹到了墙缝里。不一会，敌人搜到了刘兴亚家。一个日本鬼子用刺刀指着刘兴亚说："你们的什么的干活？"刘兴亚非常镇静地说："种地的。"日本鬼子又问："你们村的抗日的有？"刘兴亚说"不知道。"那日本鬼子又问："你的知道谁是共产党？"刘兴亚仍说不知道。日本鬼子看刘兴亚一身农民打扮，表情又不慌张，知道再也问不出什么东西来。于是，他命令手下的人狠狠的搜。他又对刘兴亚说："你的良民证的有？"刘兴亚从他破衣服里拿出一个蓝皮的本递给了那日本鬼子，那日本鬼子上下左右前后看了个够，又递给了刘兴亚。那边搜查翻个底朝天，弄得屋子乱七八糟。这些强盗在屋里翻不着又到院子里折腾了一气，也没发现什么破绽。临走时，强盗们又用刺刀挑走了两只鸡。

威武不屈

抗日斗争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发展，同时日伪对我地方党组织的破坏和对抗联部队的围攻也日益加剧。1937年"四一五"哈东特委遭敌人破坏，在方正地区坚持抗战的三军向松花江以北转移。1938年3月，日伪对我下江特委及所属的党组织进行了疯狂地破坏。方正县的抗日斗争进入了最艰苦阶段。1938年5月，在日伪白色恐怖日益猖獗的形势下，中共方正县委按上级指示精神，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将党员分散潜伏各地，待机配合抗联部队消灭日寇，县委同时停止了活动，刘兴亚也回到了延寿县苗家屯。

这年七月，大罗勒密退职伪森林警察倪景财为敌效忠，向方正县警务科司法股股长日寇中岛告密说："方正县城里由

绍伟，韩景海二人知道地下党情况。”日寇逐将曲韩二人逮捕。在审讯中韩景海供出了刘兴亚，范景海等16人。司法股当即出动全体警察，对我地下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进行大逮捕。他们先到刘兴亚经常驻足的会发恒街三和炉，逼问候氏三兄弟说出刘兴亚的去处。候氏三兄弟仇恨敌人，宁死不讲，哥仨被打死两个剩下那个终生残废。后来经过多方侦察，得知刘兴亚在延寿县苗家屯。

9月26日，刘兴亚从老苗家看地回来天已经黑了。他刚刚坐下就听见“叶咚”“叶咚”的脚步声。刘兴亚机警地说：“不好，有人来了！”话音刚落，日伪军的刺刀就从前后窗户刺进来，随后从门外闯进10多个人来，把刘兴亚抓住。刘兴亚的父亲质问这些人为什么抓人？警察蛮横地说：“老东西，不要多嘴！”接着便抄了刘兴亚的家，抄走了刘兴亚的身份证（名字叫刘庆昌），一个本和一支笔。幸亏前两天刘兴亚及时把一捆传单转移到老苗家的柴禾垛底下，要不然不知能有多么严重的后果。临行前，刘兴亚的结义兄弟苗二来看他，刘兴亚对他说：“你们都放心，可我一个人轱辘。”又对妻子妹妹说：“要好好侍候两位老人，拉扯好3个孩子，使他们长大成人。”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刘兴亚被捕后，敌人使用皮鞭抽、钉竹签、火烧等用各种酷刑对其审讯，被折磨到血肉模糊，遍体鳞伤。敌人使用多种毒刑都没有治服刘兴亚，他们又想出了更毒辣的一招。敌人把他绑在凳子上灌辣椒水。魔鬼们捏住了他的鼻子，刘兴亚被迫张开了嘴，鲜红的辣椒水被灌进了肚子里，他顿时觉得五腑六脏象燃烧了一般疼痛，头发扎煞了起来，从头发梢嘀嗒嘀嗒地淌着鲜血和热汗的混合液。他仍然什么也没有说，魔鬼们早已累得精疲力尽，懒洋洋地给他解开了绳子，他翻身坐

起来，冷笑着说："让你们受累了！"弄得这些魔鬼哭笑不得，十分尴尬。

敌人为了得到口供，又施毒计。隆冬腊月，把他拉到大江，指着冰眼说："如果你不说出地下党组织情况，就把你塞进去！"刘兴亚面对死亡的威胁，仍坚贞不屈，还是什么也没有说。敌人恼羞成怒，用刺刀对着他的胸膛，做出马上要刺杀的样子，他昂首挺胸，毫无惧色，并高声地说："你们只能杀害我的身体，而绝杀害不了信仰！刘兴亚死了算不了什么，革命一定能胜利！"敌人被他的凛然正气所震慑，又无更多的证据，无计可施，最后以反满抗日罪名经伪牡丹江法院判处7年徒刑，关押在吉林省监狱。

刘兴亚在狱中受尽了非人的待遇。睡的是水泥地，吃的是霉米饭，喝的是苦涩水，还经常遭到辱骂和毒打。这非但不能使他屈服，反而斗志更坚。他时刻牢记着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想着担负的历史重任，和要完成的革命职责，盼望着美好的共产主义，因此，他在狱中始终未停止过对敌人的斗争。他秘密组织难友绝食，向当局争取合法的待遇；向难友秘密进行抗日宣传，鼓励他们同敌人斗争到底。经过较长时间的极其秘密艰苦的努力工作，他培养了有20多人的骨干，准备夺枪越狱。但由于敌人防守非常严密，无机可乘，与狱外的党组织没有联系上，加之刘兴亚的身体每况愈下，病情日趋严重，力不能支，越狱计划最后失败，刘兴亚也于1943年秋牺牲在吉林伪监狱中，时年42岁。他的革命精神、英雄业绩载入了党的光辉史册。后人这样称赞他：

献身革命意志诚，
千挫万折铁铮铮，
粉身碎骨豪气在，
碧血丹心是英雄。

郑万昌烈士死难记

玄照发

一九三八年，隆冬，

北风呼啸，雪卷山野。

在方正县大罗勒密的城头上，高悬一颗四方大脸、二目圆睁的血淋淋人头。

人们不禁要问：此人是谁？为什么将头高悬于此？他，不是别人，他就是深受人民爱戴的、日寇痛恨的民族英雄，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二师三团团长郑万昌同志。

郑万昌同志生于1880年，河北省建成县人，后迁至方正县大罗勒密居住。出身猎户，枪法好，枪响见物，人称郑炮。他性情豪放耿直，心高气傲，是条宁折不弯的硬汉子。他不想老死山林，常存报国之志。1929年投东北军依兰县镇守使李杜部下，李杜赏识他的人品和枪法，委其为部下军官。“九一八”事变后，李杜高举抗日大旗，郑万昌随军抗击日寇，浴血奋战。李杜失败后退居苏联，郑万昌只身返回大罗勒密，发动群众，再举抗日大旗。不久即组成了一支群众自发的抗日武装。人们推郑万昌为队长。从此之后，便有一支专门打鬼子的“万昌队”活跃在大罗勒密一带山区。

“万昌队”人数不多，战斗力却很强。1932年9月，在新四棚与日伪军一仗，敌众我寡，敌人八十余人，“万昌队”不满四十。郑万昌出奇不意地在路边设伏，歼敌二十余

人；1933年春，“万昌队”联合另一抗日群众武装“银河队”，袭击驻在大罗勒密日军。1933年7月，与日军在三道沟作战，歼敌三十余人，获枪三十余支，击毙一名日军军官。

1934年，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来到大罗勒密，这时的郑万昌同志已经是五十七岁的人了。四军领导同志早知有个“万昌队”，并对其进行考察，有意吸收其参加四军。郑万昌也深感孤军作战前途渺茫，便主动地与四军接触。接触中，他发现四军抗日坚决，军纪严明。他认为抗联是中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希望，所以他主动要求加入四军。四军领导同志将“万昌队”编入三师二团游击连，郑万昌同志任连长。他在党的教育下，进步很快，先后任营长、团军需处长，1937年下半年被提拔为二团团长。

在四军的战斗岁月里，他指挥过大小战斗几十次，战功卓著，威慑敌胆。

对于这位抗日英雄，敌人当然恨之入骨。伪方正县大罗勒密警察署日本指导官时毛发恨说："抓住郑万昌，剥他皮，抽他筋！"

1937年秋，四军大部队撤离大罗勒密地区，向松花江下游转移，郑万昌奉命留在大罗勒密地区坚持敌后斗争。日伪军乘大部队撤离之机，组织日伪军、自卫团、山林警察队进山讨伐。郑团每日几乎都要与敌人遭遇。由于子弹不足，粮食缺乏，死、伤、病、逃的人数逐渐增多，到1938年春，郑团剩几十人了。到秋季，形势更加险恶，全团只剩十几个人了。在这生死关头，留下来的战士都决心战斗到最后一息。但也有些贪生怕死之徒，如张永太、左洪亮等人，竟做了可耻的叛徒。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指导官时毛便加紧筹划捕杀

郑万昌，想一举消灭郑团。

1938年春，时毛令叛徒张永太给郑万昌同志捎信，骗郑亲自到小罗勒密河西取给养。因当时张的面目没有暴露，郑领人来了，当接近小罗勒密河畔发现了敌人的伏动哨，郑万昌同志当机立断撤出阵地，免遇不幸。1938年夏，时毛令左洪亮骗郑万昌亲赴大罗勒密到地下交通员杨三爷家取子弹，由于郑万昌同志识破敌人诡计没有上当。1938年秋，时毛令伪警察署长宋维堂，带领二十余警察，由叛徒左洪亮带路，到干饭锅捕杀郑万昌同志。当时郑万昌同志率队去打三道通警察分驻所，没在干饭锅，敌人落了空，但却把留在干饭锅的四位抗联战士的妻子当场杀死一个，其余生俘到大罗勒密警察署。于是时毛想以此为诱饵，阴谋捕杀郑万昌同志。

郑万昌同志从三道通归来后，发现了这种情况，心急如焚。他向失去妻子的战士表示："只要我郑万昌有口气在，定叫你们夫妻团圆。"于是大家决定营救家属，然后找大部队去。对于营救家属问题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是偷袭大罗勒密警察署，武装劫狱；另一种意见是花钱赎人，因为伪警署察长宋维堂爱财如命。对于这两种意见，郑万昌同志进行了认真地分析。他认为大罗勒密街里警察队、自卫队加日军，能有三百多人，偷袭是鸡蛋往石头上撞。只有后一条路较为稳妥：他便派人把"活人"焦芳找来，托他活动宋维堂。焦芳一听面有难色，不去吧，郑万昌不好惹，去吧，是把手往磨眼里插。他想了半天，还是硬着头皮去了。

焦芳见到宋维堂后说明了来意，宋维堂不但没有难为他，反而把他介绍给了时毛。时毛说："赎人，钱的不要，只要五十两大烟土。"

焦芳把时毛的意见转告给郑万昌，郑万昌即凑足了款

项，托人买回烟土，叫焦芳和宋维堂商量放人的事。

时毛老谋深算，不说不放人，只是说向县里请示其实是拖，这样，一直拖了两个多月。农历腊月初，时毛把焦芳叫去，他对焦芳说："你告诉郑万昌，明晚在胡家沟郭碴子家接头，一手交烟土，一手交人。不过有个条件，得郑万昌亲身前来。"焦芳明知敌人摆下圈套，但不得不说："指导官可要保证郑炮的安全啊。他要有个三长两短，我焦芳可对不起朋友啊！"时毛说："你放心好了，大日本皇军言而有信。"

于是焦芳把接头地点、时间转告了郑万昌同志。郑万昌同志当时没有丝毫犹豫，立即答复焦芳："我一定按时赴约。"

郑万昌同志亲赴胡家沟一事，引起战士们的担心。大家纷纷阻止说："团长，不能去呀！时毛这小子是黄鼠狼给小鸡拜年——没安好心啊！"

可郑万昌同志却说："我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死何所惧？我要不去叫时毛笑话咱中国人胆小。何况我手中有枪，平打也能对付他十个八个的。既或遭到不幸，中国人民迟早要和他们算回这笔帐的。我向你们嘱付几句话：我去凶多吉少，万一不测不要悲伤，尽快找大部队。找不到，把枪插起来，中国迟早是要解放的。"

战士们为郑万昌同志的话，感动得热泪盈眶。大家心里，都盼望着他们的老团长顺利归来。

当日时毛召集了紧急会议，密令张胜，隋杰清带二十余自卫团丁，到胡家沟郭碴子家四周埋伏，等郑万昌进屋后捕杀。

郑万昌如约前来。

他腰扎皮带，头戴狗皮帽子。两把匣枪，斜插腰间。威风凛凛，旁若无人。

郭家空无一人，只有“活人”焦芳受命等在门口。郑万昌同志猫腰进屋一看愣了，这里并没有时毛派来的人以及三个战士的妻子。炕上放张桌子，桌子上摆盏麻油灯，还有酒菜，似乎是待客。看到此处，身经百战的郑万昌明白了，这是焦芳给他的饯行酒。他不由双手紧按匣枪，二目四下瞥视。

焦芳手端酒杯，眼含热泪，哽咽地说：“郑团长！咱们共事一场，老朋友了。我焦芳一生没办了对不起朋友的事，可现在由不得我了。现在兄弟敬你一杯，算是尽朋友之情了。”

说着把酒一搿，潸然泪下。

郑万昌已感到处境危险，可他临危不惧，视死如归。他连连干了三杯，然后他开怀大笑：“老郑死不足惜，可惜没把鬼子杀光。”

说罢拽出手枪，虎视焦芳。

这时，从门口飞来一弹，正中郑万昌同志的腹部。郑万昌同志中弹后，一头栽在地上，肠子从伤口处流了出来，鲜血淌了一大堆。他忍着剧痛从地上爬起来，右手拿枪，左手把流出的肠子塞进腹内，用胳膊压着，连连向外面射击。他一口气打了六十多发子弹，门口的帘子打飞了，窗棂打碎了。在他强大的火力压迫下，敌人递不过枪来，但时间一长，伤势过重，流血过多，郑万昌终于昏死过去。

敌人见郑万昌同志卧地不起，便涌进屋来。不知过了多久，郑万昌同志苏醒过来。当他看到张永太站在他身边的时候，不由愤怒满胸，他指着张永太破口大骂：“中国人的事都

坏在你们手里了。快拿我的头向你们的主子请功吧！”骂了好久，口吐白沫，又昏死过去。

这时，隋杰清命张永太给郑万昌添枪。这个丧尽天良的该死叛徒，向待他如父亲的郑万昌同志打了一枪。

隋杰清当即令团丁把郑万昌的尸体捞到外面，用铡刀剁下头颅，由张永太拿着回大罗勒密报功去了。

不久城头上郑万昌的头不见了，胡家沟的尸体也不见了。敌人慌作一团，到处抓共产党。他们搜查了好几个月，什么也没查到。原来是当地爱国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偷偷把郑万昌的尸体运到深山老林掩埋了。

1988年7月，方正县人民政府将其尸骨迁到革命烈士陵园。

郑万昌同志离开我们虽然五十多年了，但他出生入死与日寇拼搏的英雄事迹，广泛地在方正大地上流传。他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永远激励后人前进。

附：关于郑万昌同志职务问题，原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同志给方正县公安局长于占江同志的复信。

占江同志：

来信收到，关于所问郑万昌，是我们游击连长。后来编为第二团第三连连长。其子郑国志同志是第二团的政治委员。第二团张奎同志牺牲后，提升郑万昌同志为第二团长职务。“九三”后始终未能寻问出其人等之下落，请你们认真负责侦察这个线索或能得到收获。

大罗勒密南山干饭锅被服厂长事，前由政治部保安连长杜青山同志负责管理营中一切事宜。至于被服厂长是谁人，我

※※活人：群众称能在日伪军和抗联中间活动开的人。

现在想不起来了。况这些事，归政治部管理，但杜青山同志又叫杜六，大罗勒密差不多老乡们都认识他，特别是靠山边子住户，但其人亦无踪迹，虽有来人提过，也是其说不一。此复

致　　敬礼

李延禄

九月十六日

按：此信写于1952年。此件存于方正县人民法院隋杰清卷中。

血洒热土　魂绕青山

杨兴江

沿着哈同公路东行，第196个里程碑处，方正县伊汉通乡得莫利村的东岗上有一座墓碑，碑身的正中雕刻着：王俭同志牺牲地纪念碑。

王俭，1914年生于方正县二吉利村，读过私塾，粗通文墨。他性情倔强刚烈，办事豪爽利落，在村民中威信较高。1934年被推选为二吉利村自卫团团总。当时各村的自卫团是由地主出资和向农民摊派组建的地主武装，其主要目的是为防止抗联的袭击和土匪的侵扰，保护地主的利益，反动的居多，进步的很少。王俭领导的自卫团只打土匪，不和抗联作对。

明效日寇暗助抗联

1936年春，东北抗日联军三军一师在常有钧师长的率领下从松花江北返回方正县，和当地人民群众一起进行抗日斗争。常师长经常派人利用各种形式与王俭等自卫团团总接触，探问虚实，摸清底细，掌握他们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动向。经过多次地接触和观察，常师长认为王俭并不是死心塌地的为日寇效忠，还不失民族气节，于是，向他逐渐渗透抗

日救国的道理，唤起其民族自尊心，在不失时机的得力地教育和启发下，王俭开始意识到不抗日国家就要灭亡，人民就要遭殃。抗日，国家就有前途，人民就有希望。在增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的同时，深切同情和积极支持抗联的抗日救国的实际行动。

他常常借团总职务之便为抗联筹备各种物资和弹药，晚上秘密地送到山上抗联密营里。当自卫团奉命配合伪军“讨伐”抗联时，他避而不战或临战放空枪，反而谎报战果，欺瞒日寇，领取军需品。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王俭的民族意识逐渐浓厚，他的革命胆量也越来越大。有几次他将日寇进剿抗联的准确情报及时传给一师，使一师迅速转移或设下埋伏给日伪军以痛击，他还常常给他部下讲：“我们是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骨气，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宗，不能为日本鬼子效劳。”

举家起义　投向革命

日寇对王俭的革命行动有所察觉，决心除掉他。

伪治安队连长邵裕厚是王俭的同学和好友，此人有些民族意识，他将这一绝密情报迅速告知王俭，王俭得知后大吃一惊。他万万没有想到事情会来得这么快，深为自己的危险处境和家业担忧，是留是走必须迅速做出抉择。严峻的形势已经逼到了他的面前。不走，凶残的日寇随时随地都可以抓他，杀他。自己死了不算，那白发苍苍的父母，年轻的妻子和不懂事的孩子也免不了做刀下之鬼，就连自卫团的弟兄们也在劫难逃。要走，又谈何容易？王家在这方土地上繁衍生息了几辈子，虽说不上家大业大，但在十里八村中也是数得

着的。俗话说，“故土难离”，况且，王俭的父亲是一个非常固执、倔强、封建家长观念特别强的老人。又如何能劝动父亲？素以稳健果断著称的王俭，这回可犯了难。忽然，他想起了常师长，心里顿时一亮，王俭又一次下了决心，做好了被辱骂和痛打的思想准备，勇敢地向父亲提出了投奔抗联的事。

果然不出所料，话还没有说完，就被父亲连续打了几个耳光，随后便破口大骂。王俭平时在自卫团里一呼百应，但在父亲面前却百依百顺，可是现在却不同了，他必须直言，就是被父亲打坏打昏也要千方百计地做通父亲的工作。王俭最后流着泪说：“你不走，就得让鬼子抓去，严刑拷打你怎能受得了？我怎能忍心？不仅你性命难保，可能还要危及别人……。”王俭苦口婆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成破利害分析个透。王俭父亲非常眷恋地看了看居住了多年的老屋，长叹了一声，说：“也只好这么办了！”于是，在当天夜里王俭忍痛烧了自卫团大院，带领全家7口人及全团400多名团丁起义参加了抗联第三军。一师同志把他们接到南山象鼻岭下密营里。他和他的家属都得到了妥善安排。他父亲年老体弱，不能劳动由部队供养，安度晚年，妻陈家文给被服厂缝制军衣，3个女孩在密营学校里读书。他的自卫团被改编为抗联三军一师三团，他任团长。弟弟王喜当上了抗联战士。

当日寇闻讯赶到二吉利村抓王俭时，扑了个空，日寇军官中岛气得“哇哇”怪叫，两个眼睛要冒出来，高举着指挥刀大骂：“巴格牙路，王俭的良心大大的坏了，抓住了死了死了的干活！”。说完，指挥刀恶狠狠地斜劈下来，把路边的柳树劈为两段。“烧，王俭房子的狠狠的烧！”中岛声嘶力竭地嚎叫着，疯狂的日寇气极败坏地放火烧了王俭家10多间房

子、4匹马及全部家产。

出奇制胜　威慑敌人

王俭到抗联部队后，经常师长的帮助和教育，进步很快，抗日的决心更加坚定，作战更加勇敢。1936年冬，他主动接受了攻打伊汉通警察分驻所的任务。

伊汉通警察分驻所是日寇的鹰犬，和抗联对抗，横行霸道，鱼肉百姓，人民早已恨之入骨，但不能奈其何。这一带王俭人熟地熟，他决心打好这次战斗，以报国恨家仇。

那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夜晚，王俭带领队伍，从大罗勒密一棵松密营出发，乘坐几十张马爬犁，到伊汉通时已经是后半夜了。王俭悄悄地走近了哨兵。哨兵猛然发觉有人走近，粗鲁地喊道："谁？干什么的？"王俭大声说："警察署的，查岗。把你的枪拿过来！"哨兵说"要枪干什么？"王俭说："查枪号，别罗嗦！"哨兵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枪就被王俭夺了过来，又低声说道："把子弹也拿来！"哨兵非常惊诧地问："要子弹干什么？""查数！"哨兵迟疑地将子弹交了出来，缴了哨兵的械后，王俭率队直扑警察所，进屋一看，有睡觉的，有看牌的，有抽大烟的，有唠嗑的……满屋乌烟瘴气，臭气扑鼻，乱七八糟。王俭突然高声断喝："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王俭如天神般地突然出现，使满屋子的伪警察全都惊呆了，睡觉的吓醒了，睁大眼睛在看；打牌的僵住了，捏着牌的手停在了空中；抽大烟的灭了火，嘴角流出了唾液；唠嗑的傻了，张着合不上的嘴……。一个个呆若木鸡，恰似泥像。王俭威严地说道："我们是抗日联军，我们来不是为钱财，是为了枪支弹药，为了打

日本鬼子。我们都是中国人，不要忘了自己的祖宗，谁再与抗日联军作对，与老百姓作对，死心塌地效忠日寇，我们决不放过他！”伪警们被吓得如一摊烂泥，没任何反抗，乖乖地交出了枪弹。这次行动没费一粒子弹。没伤一兵一卒，就缴了20多支长枪，几支短枪，1,000多发子弹，大获全胜。

第二天，伊汉通警警察分驻所的所长被罢官免职，伪警们的反动气焰也大为收敛。

战斗失利　痛心疾首

又是一个漆黑寒冷的夜晚，王俭率队奔袭二吉利自卫团。（王俭起义后，日寇重新拼凑的）。这个自卫团效忠日寇，作恶多端，老百姓恨之入骨，抗联早想把它除掉，只因战事频繁，没有时机，今晚王俭来完成此项任务。

二吉利自卫团有三间草房，四周是土围墙，院子中间有大炮台。王俭远远地看见炮台上的西北角上亮着灯，他叮嘱大家说：“不要随便打枪，要听命令？”部队悄悄地从西边摸了上去。将要接近围墙跟前，被敌人岗哨发现了，喝道：“谁？”没等王俭搭话，不知是谁打了一枪，岗哨应声倒在地上，王俭心里说：“坏了？”但他强忍着愤怒，没有发作，最要紧的是当机立断处理这突然发生的事故，自卫团听到枪响，有人大喊：“胡子来了，快进炮台！”王俭迅速领着队伍攻上围墙，敌人从炮台往外猛烈射击，我抗联战士当即牺牲7、8个，但战士们仍奋不顾身，组织火力强攻炮台。战斗持续半个多小时，仍没有进展，已跳进院子里的战士被封锁在墙角里进退不能，墙外的战士急中生智，从附近居民家找来了几床被子，越墙上房，将醮满煤油的被子扔到

自卫团的房子上点燃。敌人见状，忙分兵扑火，减弱了炮台的火力。乘混乱之机，王俭带着被围困的战士迅速跳出墙外。为了减少更大伤亡，王俭指挥战士边打边撤出战斗，王俭原想待房子大火着起时，再冲进院里一举消灭敌人，但是，由于被点燃的被子和房草之间被厚厚的积雪相隔，加之风大寒冷，所以房子未损坏。王俭只得悻悻地退回了密营。

王俭为这次战斗的失利而深感痛心，没齿不忘。他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整顿了队伍，严肃了纪律，他决心再寻找战机，狠狠打击敌人，更多地消灭鬼子，为死难弟兄报仇。

顽强拼搏　壮烈牺牲

芦沟桥事变后，日寇向我国开展了全面进攻。东北日伪军为了策应关内日军，他们增派兵力，加紧了对抗联部队的围剿。日寇采取梳蓖、拉大网的战术妄图消灭抗联部队。1937年秋的一天，据可靠情报，日寇有一支队伍从佳木斯通过方正前往哈尔滨。王俭主动请求率队80多人在尖山子北“双桥”一带阻击。这天清早，战士们趟着露水埋伏在公路两侧。上午8点多钟，东边传来了汽车的轰鸣声，战士们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只等敌人一来，他们就开火，王俭握紧早已张开机头的手枪，两睛直视前方。他既激动又悲愤，激动的是为战友报仇，消灭日寇的机会到了；悲愤的是眼前又浮现了可爱的战士死后的惨状。他恨不得一下子把日寇全消灭掉，人民彻底翻身得解放，此时此刻他完全沉浸在战斗之前的兴奋而又紧张的气氛中，浑身的胆量和力气陡然倍增，把父母、妻小、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轰鸣声越来越近，汽车

渐渐地来到了。一辆、二辆、三辆，一共是六辆；一百米，五十米……、战士们的枪口对准了汽车轮胎；对准了开车的司机，对准了敌人的脑袋……。“呼！”王俭的枪响了，射出了一颗仇恨的子弹，发出了战斗命令。战士们的子弹、手榴弹象暴风雨一样向敌人泼去。立时血肉横飞鬼哭狼嚎，敌人倒下一片。“打得好，狠狠地打！”王俭欢呼着，鼓励战士们。敌人被这突然的袭击吓得晕头转向，纷乱地跳下汽车，四面散开，但很快便投入了战斗。他们依靠着先进的武器，人多势众向我军扑来。我抗联战士借着熟悉的地形，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顽强地与日寇拼搏。战斗进行得非常艰难，从上午打到下午，双方都有伤亡，我军虽凭借有利的地形，经常变换位置，处于主动地位，但敌人的兵力是我军的4倍多，又有先进的武器，充足的弹药，所以我军打得很吃力。特别是那挺歪把子机枪一直压得我军抬不起头来，王俭几次想扑上去，炸掉它，但都没得手。突然，机枪不叫了，王俭以为敌机枪手被打死。他一跃而起，象猛虎一样奋力向前奔去，想夺下敌人的机枪。但是敌机枪手只被打伤了腿，并没有死，当王俭猫腰跑到离机枪只有10多米远的时候，机枪突然又叫了起来。王俭晃了晃，双眼喷出了仇恨的烈火，踉踉跄跄地向前走了几步，慢慢地倒在了地上。年仅24岁的王俭同为志为了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宝兴地区朝鲜族同志的抗日活动

柴险峰

方正县中南部的宝兴乡，西濒蚂蚁河，南傍亮珠河，境内渠网密布，淡水鱼类资源十分丰富；东部为张广才岭边缘，群山绵延，各种木材及山珍不胜枚举；北部、中部土地平旷、土质肥沃，以盛产稻米而驰名遐迩。是个美丽、富饶的地方。早在30年代初，这里叫宝兴隆，那时，永建乡尚未划分出去，所以，宝兴南接珠河、西邻延寿、为三县交界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了把它从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下解放出来，居住在这里的朝鲜人民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活动，为祖国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就有一批失去祖国的朝鲜人来到柞木台子（位于宝兴隆街南十余里处，今为宝兴乡柞木村）。他们一面开垦土地，种植水稻，一面积极地做着赶走日本侵略者，建设新家园的准备工作。当时，这里一所朝鲜族的东明学校，学生们高唱的一支歌曲，传达了他们的心声。

1

帝国主义、军阀作最后的挣扎，
来了革命，象是沸腾的水。
哎嗨哟，洒出最后一滴血，
建起农村苏维埃。

2

被日本侵略者驱赶的同胞，
邻居苏维埃，拖拉机声高。
哎嗨哟，洒出最后一滴血，
建起农村苏维埃。
……

这支歌，唱出了他们的爱和恨，唱出了他们的理想和愿望，也唱出了他们的信心与力量。在偏僻、落后的方正地区，这极有可能是第一支传唱的革命歌曲，它的意义，确实非比寻常，尽管它用的是朝鲜语。

不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吞并了朝鲜半岛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又在这些朝鲜人寄居的中国东北地区故伎重演，这使他们旧恨之上又添新仇，反抗的烈火越烧越旺。

1933年，赵尚志在珠河一带创建了反日游击队。为发展抗日斗争形势，中共珠河中心县委派共产党员马洪立，具士领、李新茅（后二人为朝鲜族）以种水稻为掩护，到天台山、宝兴隆一带开展活动，建立起了延（寿）方（正）地区反日青年会，反日妇女会等抗日组织，东明学校教师申正浩成为反日青年会的负责人。从此，这一带的朝鲜族的抗日活动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开拓出新局面，并且和我抗日部队建立起鱼水相依，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

赵尚志的游击队里有不少朝鲜族人。有一次，游击队少年队队长李根植③在河东北地区活动，那里离柞木台子很近。柞木台子的几名朝鲜族青年闻讯赶到河东去见李根植。一天晚上，正当李根植等和这几名青年讨论抗日问题时，伪军巡逻队将住房围住，李根植临危不乱，他沉着地指挥几名队员凭窗抵抗，全力保护这几名朝鲜族青年。他自己抓准伪兵射击的空隙，在夜色的掩护下，飞速冲出伪军的包围圈，在敌人的背后打起“掴腚炮”，伪军受两面夹击，见势不妙，抛下几具尸体自顾自逃跑了。这件事对这几名朝鲜族青年鼓舞很大，回到柞木台子后，他们逢人就讲，共产党的队伍是怎样勇敢，怎样爱护穷苦百姓。这里的群众也都受到鼓舞，他们都说，要以游击队为榜样，非干出点名堂来不可。

正在他们跃跃欲试的时候，日伪开始归屯并户。1934年，柞木台子的朝鲜族人被迁居到宝兴。这使宝兴地区的革命力量更加壮大了。这时，我党已在宝兴党小组的基础上建立了方正支部，其他抗日组织也有相应发展。申正浩担任了共青团小组长，又担任了宝兴地区反日会负责人。申南浩、朴喜绪、崔成浩、申东浩（均朝鲜族）成为反日会的骨干力量。党的主张变成了群众的自觉行动。很快他们的抗日活动便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们给抗日游击队送去大量的粮食、布匹以及其它日用品，并用集资购买或用鸦片换取的办法，从旧东北军、地主和伪军那里，弄来不少枪支弹药送给游击队，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

1934年初，具士领、李新芳将3支步枪和700多发子弹交给朴喜绪和崔成浩，他们把这些东西送到方正南山里的牛尾

巴岗，交给了李福林队。这年夏天，他们又把50多瓶枪油和100多双胶鞋送到中和镇南山李福林队上。这次回来时，李政委给他们带回的是油印的传单和漫画，群众一见，如获至宝，争相传看，大家的抗日热情更加高涨了，与游击队的感情更加密切了。快到仲秋节时大家自动凑钱，买了60多斤月饼，几条卷烟，还有其它慰问品让人熟路熟的朴喜绪与崔成浩给队上送去。他俩背上这些东西，还有乡亲们凑的一些旧币，钻山绕岭，在延寿的关门嘴子④找到了哈东支队第九大队的驻地。大队长李福林和队员们都很受感动，非留他俩一起过仲秋节不可。他俩和游击战士们一起过了一个很有意义的仲秋节。

他们把游击队当作亲人，游击队也把他们视为骨肉。

就在朴喜绪、崔成浩从关门嘴子回到宝兴隆的当天晚上，报号“天柱”的一股土匪袭击了村子，并把他们和另外3名抗日会员当做人票掳进山里。

快找游击队去！游击队一定会救他们的——抗日会员们不约而同地想到这一点。于是，他们派申南浩进山去找，他终于在一面坡山里找到了哈东支队。支队司令赵尚志立即写信给这股土匪，令他们马上放人。土匪既害怕能征惯战，威镇哈东的赵尚志，又不愿放弃勒索财物的机会，就带着他们几个人票东躲西藏。几天之后，他们几个正被押在一个小地抢子⑤里，突然闯进一个腰插短枪的人，他威严地对那两个看守说：“快松绑放人！”跟着进来的土匪头目也随声附和。那两个看守乖乖地给他们松了绑。那人带着他们离开了匪巢，走不多远，就到了一个大山崴子里。这是片营地，有几十人在这里，有的操练，有的唱歌。一看到他们，便纷纷前来问长问短。他们走进一个小屋子里，同时进来一个姓金

的翻译，他指着那位带他们来的人说："这是哈东支队副官处的关化新同志。"原来是赵司令派关副官亲自率队来营救他们，他们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关副官还给他们讲了东北抗日斗争形势，宣传哈东支队的主张，招待他们饱餐一顿，才派人送他们下了山。他们回去之后，向具、李做了汇报，并且在群众之中广泛宣传。几天之后，就有李其河和一个姓金的（都是朝鲜族）两个青年到关化新队上当抗日军去了。这样一来，他们与哈东支队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

这年冬天，具士领、李芳、申正浩弄到5枝步枪和500多发子弹，想送到山里去。那时，日伪军和警察盘察得很严。可是，他们毕竟斗不过富有智慧的广大群众。朴喜绪、申东浩还有一个叫"干巴鱼"的汉族会员把这些东西装在一口棺材里，假装迁坟，用牛车拉着，大摇大摆地出了村，一直送到中和镇山里的王八脖子⑥，交给了关化新副官。

哈东支队迅速发展，1935年春，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三军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珠河、延寿、苇河、方正一带的山区，有他们的多处营地。这样一来，宝兴的朝鲜族人支援抗日军的活动范围就扩大了。除了南部山区外，他们还多次向东部的大罗勒密一带送东西。申正浩就几次组织人往大罗密的臭松沟子八一大棚（三军被服厂）送枪枝、弹药、布匹、棉花，还有当时奇缺的食盐和火柴。有一次，申正浩亲自去送了一份地图和一只电筒。那电筒一按就射出一束光，这使大棚里的几个女同志感到十分稀罕。

1935年，申正浩的抗日活动被伪方正县警察署察觉，他被关押起来，敌人用多种酷刑残酷地折磨他，他坚强不屈，只字未吐。后来，在我地下党的营救上，他才脱离虎口。

1936年初，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共青团员朴喜绪当上了

宝兴隆伪自卫团团长。他很快就把这个组织变成一个明里应付日伪，暗里支持抗日的组织。他自己则利用这个合法身份，更加积极地从事抗日工作。他曾单身去南山里穷棒子岗三军执法处给李福林处长送去200发子弹，到宝兴隆东大山头中和镇山东窝棚等地向三军传递日伪军的行动情报。他还多次利用这个身份掩护我抗日人员脱险。有一次，三军中某中队政委金士英路过宝兴隆，被伪警察林成学（朝鲜族）发现，林气势汹汹地要动手搜查，就在这紧张时刻，朴喜绪闻讯赶到，他对林成学说："这个人是我的朋友，有什么事跟我说罢。"林成学碍于朴喜绪的身份，只好暂时做罢，眼看着朴把金领回家去。但林仍不甘心，当晚没回县城，住在宝兴隆继续监视金的行动。朴喜绪立刻把情况告诉给抗日会长申正浩，申立刻把情况告诉了三军交通员金治钟(朝鲜族)，金立即动身进山找到了游击队，游击队星夜派人下山，把这个鲜奸抓获，拉出村外处死。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艰苦阶段，三军大部队转移到松花江下游去了，地工人员具士领等也先后随部队走了。申正浩、朴喜绪等留了下来，利用兴农会长、自卫团长等合法身份，继续担负着组织群众、保护地方抗日力量的工作，使金凤来、郑仁赫等地下党员得以隐蔽下来。

宝兴，一直以一个坚固的抗日堡垒的姿态，屹立在方正大地上，一直到日本侵略者投降的那一天。宝兴的朝鲜族同胞，就这样团结战斗、自强不息，他们的业绩将永存在辉煌的史册里，永存在人们的心坎上。

注：①本文是根据对下述人员的采访录或其有关证言材料写成的：

朴喜绪，中共党员，朝鲜族，生于1908年，1986年时住讷河县城，离休干部。

张学勤，中共党员，汉族，生于一九一二年，离休前任东宁县总工会主席。

赵永夏，朝鲜劳动党党员，生于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九年至一九四五年，先后在柞木台子、天门乡农家屯居住，一九四五年去朝鲜，一九八六年时住平壤市先桥一栋二十一班，同年曾来中国探亲。

②天台山，位于延寿县东部中和镇境内，庆阳农场七队以南。

③李根植，共青团员，朝鲜族，后来成为赵尚志部著名将领，在三岔河之战中，曾徒手夺机枪。

④关门嘴子，山名，在延寿县加信镇与中和镇之间。

⑤地抢子，当地土语，意为半地下式窝棚。

⑥王八脖子，山名。

抗联堡垒户——侯青山

玄照发

抗日战争时期，侯青山同志被誉为抗联堡垒户。

侯青山同志1881年生，辽宁省朝阳人，旧中国时迁入方正县，在四区向阳村为农。

1934年，他去六道河子沟里胡仙堂做木头，遇上赵尚志的抗日游击队。赵尚志同志在胡仙堂给工人们开会，宣传抗日救国的大道理，侯青山听了很受感动。赵尚志说："不能叫鬼子在这里呆长！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们必须拉起队伍．进行反抗！"侯青山同志根据自己的耳闻目睹，决心为抗日斗争做出贡献。

他回到家，就主动送给抗联6双胶鞋，以后又送抗联30套衣服。

1935年初，农历腊月二十四，天刚放亮，三军稽查处来个马爬犁，爬犁上被里裹个伤员。来人把伤员背到侯家，对侯青山说："他是李福林同志的警卫员，在战斗中负了重伤，山里的条件差。李处长叫尽快把他治好。"侯青山说："你放心走吧，转告李处长，我一定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位同志治好。"

侯青山对抗联的信任很受感动，他家住三间房，倒出一头给伤员住。当天请来当地治红伤的名医魏兴武给伤员治病。把打在腿里的子弹拿出，并敷了药。侯青山为了使伤员早日康复，把家里唯一的老母鸡杀了，给伤员补养。这时他

听到方正县警察署要来搜查的消息后，立即将伤员用毯子裹好，枕上绣花枕头，说是他老婆的外甥女，串亲戚小产了送她回家去。人送走后，伪方正警察署警察由广春来到他家，硬说他窝匪，在他家到处翻搜，但一无所获。

伤员没有搜到，可他和抗联来往的事叫特务机关查到了。正月二十六日，将他逮捕入狱。在狱中，他坚强不屈，什么也不说，后来，敌人拿他没办法，在监狱里蹲了66天，才放出来。

他出狱后，没有因此而停止了抗日工作。他仍然早出晚归，为抗联筹集粮食、子弹。1937年8月1日，他又被捕了。这倒不是因为他有了破绽，而是因为战争形势紧张，凡记在伪县公署“要事查人”名薄上的人，全部逮捕，侯青山自然也不例外。

这次侯青山蹲了36天。当他出狱的时候，抗联已经转移。祖国光复后，党和人民没有忘记青山同志。1954年方正县委、县政府合开了抗联人员座谈会，他应邀参加。会上县里领导同志，对他在抗日时期的工作，给予很高评价。

国兵训警察

赵青林

日本鬼子垮台的前三年（1943年），会发恒区警察署有个姓周的警察，在会发恒一带敲诈勒索，欺压百姓，人们恨之入骨。因为他右耳朵上边有一撮白毛，背地都叫他周白毛子。

那年仲秋节刚过，周白毛子身穿警服，腰挎护腚刀，眼睛上架着“二饼”（眼镜），耀武扬威进了福德屯。福德屯在会发恒西十五里，是个土地瘠薄、民不聊生的小山沟。周白毛子到这个穷山沟是找屯长许占春会气来了。仲秋节前，他给许占春捎信，让送去50份大烟（鸦片）。大烟是毒品，十分缺少，就是那些好不错的人抽大烟，也得凭烟帐一天到烟馆只放给一份儿。周白毛子一次就要50份，这不是逼人吗？屯长许占春明知这是“勒大脖子”（勒索）。不给，又得罪不起。那个年月，警察要给屯长小鞋穿，不是太容易了吗。

许占春有4个儿子：大儿子许文太务农，老二许文忠是个木匠，老三哑吧，老四许文涛当伪国兵，在松花江上开巡逻艇，是江上军。这天，正在回家探亲的许文涛，见父亲满面愁容，闷闷不乐的样子，就问：“爸，有什么愁事吧？”许占春打了个咳声，把周白毛子要大烟的事说了。许文涛气得一跺脚：“真他妈的瞎了狗眼，欺负到咱爷们头上了，我明天上警察署找他去！”伪满警察一怕日本人，二怕

国兵。因为国兵有不少是穷人家子弟，他们的亲友常受警察的欺压、勒索。警察见着国兵就象耗子见猫似的。当地流传这样一句话“国兵打警察——白挨！”许占春考虑再三，觉得去找他打骂一顿当时出出气，可后患无穷啊。于是对许文涛说：“先不用理他，以后再说吧。”

又过了几天，周白毛子见许占春还不把大烟送来，很不是心思。他管别的村要东西，谁敢说个“不”字，有的地方不去要，还上赶着往上送呢，许占春的脑袋咋这么难剃呢？分明是没瞧起我姓周的。周白毛子赌气直奔福德屯。还没等进屯，人们离老远就看出是警察来了。小孩子吵吵着“远看一绺绺，近看巡警狗，肩膀贴对子，横批还没有。”（伪警察的肩章是横在肩上的）屯长许占春往东道上一瞅，是周白毛子来了。

许占春急忙回家和儿子许文涛一说，许文涛气愤地说：“真是冤家路窄，他来得正好！”

许占春家住屯子中间路南，是所五间脸朝西、中间开门的厢房。他住在南屋。许占春在屋里听到外边传来“咔咔”的皮靴声和“哗哗啦啦”的刀链子声，知道是周白毛子到了。

周白毛子没等进屋，在房门口就大声吵吵：“许屯长在家吗？”许占春紧走几步，迎上去，面带笑容说：“周警长来了，快屋里请！”

周白毛子满脸不悦，进屋一屁股迫在炕沿上，扶了扶眼镜，问：“许屯长，节前的信儿捎到没有，？”许占春忙说：“捎到了。还差20份没凑齐，真对不起，劳周警长受累。……”

周白毛子头一扬，斜了一眼许占春：“我今天来是告诉

你，轮到你二儿子许文忠出劳工了！”许占春刚要说话，周白毛子手一摆，口气生硬地说：“本来早就该去了，可念你是为皇军办事的屯长，所以上次就缓了，如今，有人举报，我也没办法了。”许占春心里明白，这是上次礼没到，找邪火刁难人来了，便满脸赔笑地说：“请周警长多关照，老二走了，我一大家人割地、干活人手不够，还是缓缓吧？”

“那不行！”周白毛子紧绷着脸，蛮横地说：“今天我就要带人！”

许占春为难地说：“老二下地干活去了。”

周白毛子在屋里走了几个来回，脸一沉：“干活也得找回来。”

“周警长，再宽容几天吧？”

“少费话！”

许占春看周白毛子口气挺硬，知道说什么也没有用，便咳嗽几声，算给正在屋里假装睡觉的许文涛通了信。其实，许文涛早就听得一清二白，气得他两眼冒火，恨不得立时就教训教训这条鱼肉百姓的恶狗。

许占春忙说：“这样吧，周警长，你稍等，我去找老二。说完出了屋。

许文涛听父亲躲出去了，他穿好伪国兵服装，手拎皮带，大步从里屋闯了出来。

周白毛子听到皮鞋声，猛抬头一看，眼前站一个国兵，虎势眈眈的瞪着他。周白毛子立时六神无主，吓得腿肚子直哆嗦，，急忙“咔”的一声，来个立正举手礼，象根棍似的站在那里。许文涛手一指厉声问：“你就是周白毛吧？”周白毛子点头哈腰地说：“是鄙人。不知国军在此，多有冒犯，多有冒犯。许文涛气愤地训斥他：“你们这帮黑了心的

警察狗，在乡里横行霸道，欺压百姓，可知罪？”周白毛子看一眼许文涛手里的皮带，忙连声说：“知罪知罪！”许文涛说：“给你们那个署长捎个信，我明天去找他！”

周白毛子一听要去找署长，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急忙哀求说：“国军长官，小的冒犯之处，请多多担待。”

许文涛本想狠狠地揍周白毛子一顿，出口气，一抬头看窗外站着的父亲在向他点头，周白毛子规规矩矩，紧着认错，气也就消了三分。“告诉你姓周的，我那年都回来，再听你欺压穷苦百姓，别说我不留情面！”周白毛子怕吃眼前亏，紧赔不是：“不敢不敢！”

这些，躲在窗外的许占春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明明白白。原来他根本没去找二儿子，他所以躲在窗外，是怕血气方刚的许文涛动武，许占春看时机已到，便急急忙忙地进了屋，看周白毛子还直挺地站在儿子面前，好气又好笑。他若无其事地说：“老四，你不是上南屯你舅家去了吗，什么时候回来的？”许文涛说：“我睡觉没去。”说完转身进里屋，许占春忙喊：“老四，这是周警长，你们认识认识吧。”

周白毛子手扶着眼镜急忙怯声声地说：“啊，刚认识国军。”

许占春转回身对儿子说：“老四，你倒让周警长坐下呀。”然后装作怒容满面，指桑骂槐地对许文涛：“你太不懂礼节了，周警长是咱家客人。别他妈的穿一身黄皮就狐假虎威，六亲不认！我不信，你能干一辈子，有回来那天！周警长对咱们爷们，对这个屯，都不错，从来也没难为过咱们。”看儿子没说啥，许占春手一指：“老四，别耽误周警长公事，你该干啥就干啥去吧！”

许文涛走后，屋里就剩下许占春和周白毛子了。许占春笑着说："周警长，别往心里去，老四直性，有什么不对，你多担待些吧。"周白毛子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张了几张嘴，呜呜半天也没说出个"子、午、卯、酉"来。这时许占春从兜里掏出30份儿大烟，递给周白毛子。周白毛子急忙站起身，双手推回去："这我能要吗？"许占春就势说："好，那我就以实为实了。"进屋告诉老伴给周警长预备晌午饭。这实质是撵周白毛子滚蛋。周白毛子是王八掉灶坑——窝火又憋气，忙说："临来时，路过东边焦家屯，焦掌柜让务必到他那去。"许占春一听，急忙顺水推舟地说："真是那样地话，周警长公事繁忙，咱以后再聚。"

周白毛子象条丧家犬，夹着尾巴出了房门。许占春乘机说："周警长，我老二……"

周白毛子打了个手势，无可奈何地说："免！"

"以后我们屯子的事，还请周警长多费心。"

周白毛子一句话也没说出，他一边嗯啊的应着，一边慌里慌张地奔焦家屯去了。

打那，屯子传出一句歇后语，"国兵见警察——冤家路窄。"

（根据许文涛等口述撰写）

白大杆子轶事

杨兴江

提起白大杆子，方正县50岁以上的坐地户大都知道。白大杆子本名白振江，字玉凯，因身材高大魁梧，站起来尤如一根旗杆，又姓白，因此，人们送他一个绰号——白大杆子。

“九·一八”之前，白大杆子在依兰任篮旗官。后解甲归田，回到家乡白家屯，置田买马盖房，很快成为这个村的地主，又当上了保长兼自卫团总。

在民间，有过关于白大杆子认日本儿子的传说。人们曾说，白大杆子年轻时曾是商人，经常到佳木斯等地做买卖。在日本妓院里结识了一个日本妓女，相处甚好，来往频繁。后这日本妓女怀孕回国。回国前，这女人向白大杆子要一张照片，说：“若生男孩，长大后一定到中国来找你认爹。”

这日本女人回国后，果然生一男孩，20年后，这男孩随日军来到中国，又多次请求到方正县来任职（方正县警备队司令），寻找亲爹。此人便是当时方正县妇孺皆知的西山大尉。到方正就职后，西山大尉骑着高头大马拿着他妈给他的地址到白家屯去认爹。白大杆子一见西山大尉吓得浑身发抖，嘴唇哆嗦，说不出话，西山大尉见状安慰说：“害怕的不要，我有话的说。”说着从兜里掏出白大杆子年轻时的照片，笑着对白大杆子说：“这个的是你？”白大杆子接过照片

一看正是自己。那时他20多岁，戴着毡帽，穿着长袍，一脸的微笑。这是他特为情人照的，看了照片，白大杆子心头不免掠过一缕喜绪，多年来，情人竟没有忘记他。这喜绪一闪而过，接着又是一惊。难道面前这个人真是那女人说的孩子？白大杆子清楚地知道日本人性情残暴、野蛮。说不定会找自己的麻烦。他战战竞竞地说："是我。"这日本听了，立即跪了下来，口里说："你是我的亲爹的。"又磕了几个头。白大杆子急忙将他拉起，说："不用磕头，不用磕头。"

从此，这"父子"就相识了。以后，又传说他们同在一个桌上吃饭，西山还常把白大杆子接到城里住上几日。

其实，这传说是白大杆子自己编造出来的。他认为日本人洋枪洋炮，大军压境，满州国铁桶一般。有日本人作自己的后盾，对提高自己的声望、地位是大有好处的。

事实是这样的：

西山大尉原是日军天野少将的步兵第十五旅团的一个曹长（班长）。1932年春，随军向方正进攻，行军到桶子沟时，遭东北抗日自卫军冯占海部的猛烈阻击。战斗持续了一昼夜，东北抗日自卫军五战五捷，日伪军大部被歼，只有少数侥幸逃走。西山便是其中一个。

天刚麻麻亮，白大杆子站在大门口向西望着。这时，桶子沟方向的枪声逐渐地稀落，枪弹散发出的硝烟和晨雾混在一起，能见度很低。突然，他听到，由远而近的急促的脚步声和喘息声。白大杆子下意识地退到了院子里，从大门的一条小缝向外看。一条黑影跃到了门前，在东张西望，白大杆子从那人侧身看去，衣服破烂，鞋子丢了一只，满身是血。十分狼狈。只见那人看看没有什么动静，急转身来敲门。忽见门有条缝，手又缩了回去。这时，白大杆子从门里出来，

手里提着门闩。那人见从门里走出一个人来，情知逃跑来不及了，急忙跪下来给白大杆子磕头。白大杆子从衣服上一下子就看出来这是个日本兵。嘴里咕噜咕噜地不知说些什么，脸憋得通红。白大杆子立刻明白：他是想躲藏起来。于是，白大杆子急速把那人领进院内，关上了大门，把他藏到了萝卜窖里，躲过了抗日自卫军的搜查。

白大杆子不但把这个曹长藏了起来，还让他媳妇张大脚给他做饭吃。3天后，这日本曹长来到了方正县警备司令部。由警备司令部护送到了日军部队。

1936年秋，西山大尉从富锦来到方正，任警备司令部司令。这时白大杆子在会发恒任保长，年令已近50岁了。一次到方正办事，碰见了西山大尉。西山大尉见面就说："你的就是我的亲父亲的。"西山大尉的汉话这时已学得差不多了。他去会发恒拜访过白大杆子，有时还把他接到县里来住上几天。

白大杆子救过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鬼子，这是他的罪恶。他也为中国人办了一些事。有的中国人被关押，求到他头上，不几日便放回。兴方学校有个进步教师石宝光，因为在长春特别区高等师范读书时声援中东路工人罢工，受到日寇的秘密监视，又因日本人强迫中国人为其种地，说了几句公道话而被捕，不久，又传出信，说是要转移外地服刑。石宝光爱人潘敬民及其亲友想尽了办法救不出石宝光，最后找到了白大杆子。第二天，白大杆子把石宝光的事和西山大尉说了。西山大尉一口八个不行。白大杆子一连几天都去说，西山大尉由摇头变成了沉默。白大杆子最后说："他的事就是我的事，不管怎样，你一定要把他放出来。"西山大尉叹了口气说："他的事不同于一般的事，是

直接反对日本帝国。但他必须保证以后不反对大日本。”白大杆子替石宝光作了保证，才被放了出来。

在1947年土改中，白大杆子讲出了这段历史真情。

（据张英杰、张庆口述撰写）